國 立 中 央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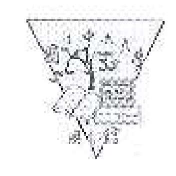
碩士論文

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研究生：楊孟儒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98年4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1說明)，為本人於國立中央大學，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 (立即開放)

( )同意 (一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

( )同意 (二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

( )同意 (三年後開放)，原因是：____________

( )不同意，原因是：_______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公開陳列、與發行，或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楊孟儒　　學號：971305026

論文名稱：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

指導教授姓名：齊茂吉

系所：歷史所　所　□博士班　☑碩士班

日期：民國 99 年 6 月 17 日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15條第3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 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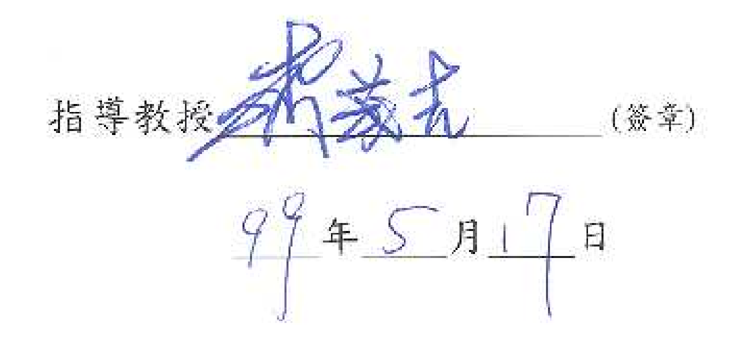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歷史 研究所 楊孟儒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簽章）

99 年 5 月 17 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研究所 楊孟儒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吳振漢

委　　員 [signatures]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五 月 三十一 日

摘要

論文名稱：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
頁數：137 頁
校所：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研究生：楊孟儒　　　　　　指導教授：齊茂吉博士
中文題要內容：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三：第一，文化大革命爆發與延續 10 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之間的密切合作有著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在文革期間是否真如中共黨史著作所提及的那樣，周恩來是「忍辱負重」的，是需要還原其真相。第二，在文革期間，周恩來如何在中共的派系鬥爭中生存，周就算遭受到打壓，自始自終都未被真正打倒，這是值得深入分析討論的。第三，文革當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來在此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將在此作深入探討。

周恩來是位資力相當深與完整的中共高層政治人物，周與毛澤東的關係非常密切，周曾親身經歷毛澤東數不盡的鬥爭中，但從未被鬥到真正打倒的地步，這歸因於周恩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擔任毛命令的主要執行人，整場文革中毛可說是缺周不可 。而在文革期間，周恩來更是平衡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關鍵人物。在中共組織中，周更是影響政局的重要人物，他擅長在中共中央政治和外交各方面，扮演調合的角色，這樣的性格，使他在重大的「九一三事件」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關鍵字：　周恩來、 毛澤東、 林彪 、九一三事件

A Study of Zhou Enlai's Role in the Earlier Period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Abstract

The thesis aims to discuss three issues. Firstly, we need to rediscover the truth: did the beginning and later stag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GPCR) in anyway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Zhou Enlai's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with Mao Zedong? As well as the role Zhou's character played in this power struggle: was Zhou Enlai really as CCP official publication stated, that he "suffering all disgrace and insult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a task" in the period of the GPCR. Secondly, it is also worth to analyze and discuss how Zhou Enlai has survived through the CCP's power struggle during the GPCR. He was prosecuted and oppressed by other party members, and was degraded to periphery at the time, however he was never 'defeated'. Thirdly,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crucial role that Zhou Enlai played in the "13 September Incident".

Zhou Enlai is a high ranking CCP leader with complete experiences and high recognitions. He has experienced numerous political battles staged by Mao Zedong but he was never completely defeated,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his cooperation with Mao Zedong in the GPCR. At the time, Mao 's commends was mainly executed by Zhou Enlai who was so called "a valuable and capable assistant", and did Mao a big favor. In addition,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power balance among the CCP's internal fac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CP, he was so important that he could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al trends. As a negotiator, Zhou Enlai played a good role in dealing with political and diplomacy affairs of CCP. ". This is probab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why he played crucial role in the incident of "13 September Incident".

Keywords: Zhou Enlai, Mao Zedong, Lin Biao, 13 September Incident

謝辭

由於大學時期，並非就讀歷史相關科系，因此對於進入中央歷史所就讀感到些許的惶恐，擔心無法如期完成論文，經過歷史所兩年課程的薰陶，在歷史所諸位師長的指導與教化下，我的論文竟能如期完成，此刻內心中充滿著欣喜和感動，經歷過這段學習歷程，未來也勉勵自己再繼續努力進修和學習。首先，最要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齊茂吉老師，齊老師的專業和治學態度，令人欽佩，這兩年來在學業上老師不厭其煩的指導與砥礪我，使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中有所增長，順利完成本篇論文，於此也感謝吳振漢教授、孫玫教授的指教與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篇論文能更加完整，還有感謝吳學明教授、賴澤涵教授、朱德蘭教授、鄭政誠教授的教導，不管在學業上或為人處事上，都讓我受益匪淺。

另外，感謝同窗兩年的班上同學，和你們一起上課，很快樂也很幸福，也感謝任教學校的同事，有你們對我的加油與打氣，更讓我振奮精神，努力向上。

最後，感謝我摯愛的先生，你對我全力的支持，是我奮發向上最大的原動力，使我在白天忙於教職後，沒有後顧之憂，能專心於學業研究。在此將這份榮耀與忻悅，和大家共同分享。

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

（1966-1971）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動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國務院（1954 年 10 月 25 日前稱政務院）總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並在 1949-1959 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1952 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 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來與毛澤東同屬中國共產黨第一代的領導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紅色江山的那一代。儘管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的家庭出身、生長背景乃至處事方式截然不同，卻同是「身無半文，憂心天下」的失意青年，在五四浪潮的激盪下，懷抱著改造中國的政治理念，齊聚在共產革命的旗幟之下，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一部中共黨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一部毛、周兩人合作的關係史。

將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命運更緊密相繫的「文化大革命」[1]是一場大動亂，要用社會主義的文化、思想、風俗、習慣，取代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2]響應文化大革命絕大多數是由中共共產主義奶水養大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他們成長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社會氛圍中，擁有強烈的理想主義性格，人手一本毛澤東的「毛語錄」，[3]絕大多數是毛澤東的崇拜者，自 1949 年以來，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下，大陸社會各階層普遍對官僚特權存有相當強烈的不滿、然而在黨這部專政機器的箝制下，群眾這股不平的情緒，長期積壓達到臨界點，當毛澤東適時地登高一呼，在階級鬥爭的號召下，廣大的群眾終於找到了洩憤的管

---

[1] 「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簡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頁 796。

[2]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96-799。

[3]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98-799。

道，這是毛澤東得以成功發動群眾運動的主因。[4]這場失控的群眾運動，不僅使中國大陸歷經全國性的大動亂，在毛澤東所謂的「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5]的口號帶領下，各種殘暴與荒誕的鬥爭層出不窮，這場蔓延全國性的大浩劫，歷時了整整十個年頭，史稱「十年浩劫」。而周恩來去世後，以悼念周恩來為導火線，爆發了中國社會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後的蓄積的怒氣，形成了聲勢浩的四五運動，矛頭直指以江青（1914-1991）為首的四人幫及其幕後老闆毛澤東（1893-1976），結束了文革十年的浪潮。時間再往前推幾年，在毛澤東與周恩來在生命中最後這幾年共同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時是中共政治史上最風雨飄搖的時代，周恩來是如何在這風暴中安然度過的？

周恩來的晚年正巧經歷文革風雨最飄搖的年代，此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權力至高無上是不容許任何人挑戰的，而周恩來大部分的政治生涯都是籠罩在毛澤東的陰影下，文革期間更是周恩來政治生涯中最難熬的一段，周恩來在這之中是否真如目前中共黨史著作所提是「大樹參天護英華」[6]，是值得再去還原真相的。歷經「海瑞罷官」、紅衛兵運動、「二月逆流」、「武漢事件」到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等諸多重大的事件周恩來自始自終沒有被打倒，這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而周恩來究竟是何許人？他在震撼整個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他究竟是護主有功，在浩劫中扶危定傾的功臣？還是助紂為虐，使中國政治陷入文革風暴中的幫兇？針對這些質疑，本論文將試圖找出各種可能

[4]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衝突（1954-1971）》（臺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頁 182。

[5]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17。

[6]許多經過文革劫後餘生的人，對周恩來心存感激，寫了取多緬懷周的文章，稱他是「大樹參天護英華」，琴九鳳，〈嘔心瀝血披肝膽 大樹參天護英華-周恩來“文革”期間對政協等人員的保護〉，《黨史文天地》，期 10（2009 年），頁 33，傅崇碧，〈大樹參天護英華〉，收錄於郭思敏、天羽編，《我眼中的周恩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月），頁 336-340。

性的合理解釋，或存疑待證。

貳、　題目界定

本論文題目是「文革前期周恩來角色之探討（1966-1971）」，於此就題目中的關鍵字彙，研究範圍與時間斷限作一翻界定。

首先本文的主角周恩來從中華人民共和過建國以來即擔任總理這個重要的職務，一直到他辭世爲止，他的政治資歷可說是非常的完整，經歷過北伐、長征、抗戰、國共內戰，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在這之中，尤以周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所扮演的角色最令人好奇，因此本文就時間斷限上，主要以周恩來 1966 年到 1971 年文革前期間的角色爲主要討論範圍。文革前期是從文化大革命爆發至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文革後期則是「九一三事件」之後，鄧小平等人重新崛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爲止。[7]由於毛澤東非常在意文革的推動與其後續相關運動的發展，毛在選人與用人方面特別慎重，往往在運籌帷幄之間，牽動到各派系之間的權力平衡，因此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角色及功能，主要取決於毛澤東的態度，周與毛兩人長期合作，在文革中彼此更是密不可分。至於，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目前常見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開始；另一說法則爲 1966 年 5 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通過所謂的〈五一六通知〉，並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成立一個全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就此展開，直到 1977 年 8 月，華國峰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8]本文將採用第一種說法。

雖然本文的時間斷限是開始於 1966 年，然而發生在 1965 年底的「海瑞罷官事件」，可說是吹響文革戰役的號角，因此本文將列入探討。至於本文將時間斷

[7]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77。

[8]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877。

限結束於 1971 年，原因在於這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等人墜機於外蒙古，林彪集團人馬分別成爲階下囚，中共九大所確立的權力格局一夜之間崩塌。原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澤東、周恩來與自廬山會議後即一病不起的康生，原先參與議事的政治局成員也缺席了一半，變得七零八落，不得不唱起了「空城計」，五年來，一直高唱入雲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掩蓋不住破產的現象。[9]

參、　研究回顧

由於筆者最主要是以周恩來在文革時期 1966-1971 年中所扮演的角色爲本編論文主要的處理對象，因此對於文革時期，國內外、兩岸三地，與周恩來有關的研究都必須加以回顧和探討。與周恩來生評傳記有關的論著，基本上幾乎都是落入中共官方的人物宣傳的框架中，例如，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1949-1976）》[1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的《周恩來年譜》[11]，安建設編著的《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主編的《周恩來自述》[13]，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編的《周恩來選集》[14]，張瑞靄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15]，張佐良的《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16] ，高振普的《周恩來衛

[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頁 356。

[10]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898-1976》，一至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76》，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

[12]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主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 年 7 月）。

[14]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編，《周恩來選集》，上、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15]張瑞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16]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6 月）。

士回憶錄》[17]，劉武生著的《周恩來的晚年歲月》[18]等。

非中共官方觀點的則有，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19]，這本書與中共官方說法在很多歷史事件的描述上大相徑庭。書中大量引述作者在過去摘抄之中共內部未公開之信件、文件、會議紀錄和訪問等，以揭秘式披露周恩來由 1940 年代延安整風至逝世前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恩怨爲主要內容。周恩來晚年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同時也是人們對他歷史評價中爭議最大的一段。[20]非官方觀點的專書還有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21]與高華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22]，與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共和國史》[23]等。另外，在回憶錄方面有吳法憲著的《吳法憲回憶錄》[24]、王力著的《王力反思錄》[25]、李志綏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26]。

至於文革時期與周恩來有關的期刊與報導，主要也以大陸方面的資料爲主，內容都帶有替周恩來作人物宣傳的特色，例如：周家鼎在〈周恩來忍辱負重的歲月〉[27]中所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脫離了正常軌道，造成異常困難複雜的局面。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作爲執行者，是無法從根本上扭轉這場災難性的「革命」的。周只能忍辱負重，運用他的智慧和經驗，巧妙

[17]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18] 劉武生著，《周恩來的晚年歲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 月）。

[1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

[2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9-10。

[21]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8 年 6 月）。

[22]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

[23]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民國共和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

[2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9 月）。

[25]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26]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11 月）。

[27]周家鼎，〈周恩來忍辱負重的歲月〉，《黨的文獻》，期4（1993年），頁60。

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爭取毛澤東首肯和支持，對「文革」中出現的問題做了一些矯枉和引導。這篇文章並將文革的災難完全歸咎於林彪、江青等人妄圖通過打倒一切來實現其改朝換代、篡黨奪權的陰謀。然而，文革浩劫，絕非此三言兩語就可蓋棺論定。

陳浩在〈韓丁回憶周恩來〉[28]一文中，內容談到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雖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暴的中心，但周甚至有勇氣同意了一個中外通婚的事例。關於對待外國客人他作了些勇敢的事情，當然周主要是爲中國作了很多勇敢的事情。這是因爲周眼界開闊，懂得世界上的事情，他沒有「框框」，能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和別人的觀點，作者認爲周能理解他們；而且周有人之常情，能認識到這些事也是重要的，周還肯花時間來操心和處理這類問題。這是很突出的。很多政治家不屑于管這些個人的事情。所以，作者再一次周能成爲他們最佳的主人，最好的朋友。這雖是些小事，但說明周恩來的品質。整體來說，還是跳脫不了爲周恩來作人物宣傳的框架。

安建設在〈周恩來領導的 1972 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29]一文中，主要敘述「文革」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正是憑藉手中的權力，煽動極左思潮來挑起派性，製造事端，攪亂全國，進而打倒一大批黨政軍領導人，妄圖篡黨奪權。1971 年林彪墜機身亡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間，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意見，並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仍然過份渲染林彪、江青在文革中的罪行，並將二人定位爲亂軍篡黨的野心分子。

楊增和在〈評《論周恩來的人性思想及其踐履》〉[30]一文中，敘述到周恩來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具有高尚的共產黨員品德。他毫不利己，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爲了同志，爲了人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熱愛革命的領袖，也熱愛

[28]陳浩，〈韓丁回憶周恩來〉，《文獻和研究》，期 1（1987 年），頁 42。

[29]安建設，〈周恩來領導的 1972 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黨的文獻》，期 1（1993 年），頁 22。

[30]楊曾和，〈評《論周恩來的人性思想及其踐履》〉，《文獻和研究》，期 3（1984 年），頁 26。

革命的群眾。他關懷工人，關懷農民，也關懷知識份子。他尊重腦力勞動者，也尊重體力勞動者，對每一個辛勤勞動的人都充滿深厚的感情。通篇依然充斥對周恩來的歌功頌德。

曾自在〈周恩來文物保護思想與西部大開發〉一文中[31]，提到周恩來在擔任政府總理的 26 年間，十分重視中國的文化建設事業。周認爲，革命和建設的目的就是爲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因此，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必須同步協調發展。周將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32]而在文化建設中，周恩來又始終將文物保護和文物博物館的建設，看作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視，周對文物保護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但卻沒有隻字片語提到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文物的損失情形。

吳慶彤的〈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解放幹部的努力與貢獻〉[33]與湯聿文的〈周恩來保護老幹部得一著棋〉[34]這兩篇文章中，主要敘述周排除「四人幫」的阻撓，批判極左思潮，爲解放老幹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此文還是將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過錯歸咎於「四人幫」，但是其實周恩來在文革中是許多專案小組的實際負責人，文中卻略過沒有提到這點。

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的〈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35]一文中，主要敘述從青年時代起，周恩來一直是很傑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個正確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還是因爲有了毛澤東的領導。而對毛澤東，有如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所說，最離不開的是周恩來。他們之間的關係確實是相得益

---

[31]曾自，〈周恩來文物保護思想與西部大開發〉，《黨的文獻》，期 1（2002 年），頁 54。

[32]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頁 71。

[33]吳慶彤，〈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解放幹部的努力與貢獻〉，《黨的文獻》，期 2（2000 年），頁 81。

[34]湯聿文，〈周恩來保護老幹部得一著棋〉，《百年朝》，期 2（1998 年），頁 51-53。

[35]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黨的文獻》，期 12（1993 年），頁 29。

彰。文中描述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之間密切配合所產生的對中國政治的影響，然而內容仍舊有明顯歌功頌德的意味。

江山的〈在晚年周恩來身邊採訪〉[36]一文中，主要敘述作者於1971年至1975年在周恩來身邊採訪，透過親眼目睹的一件件小事，領略到了周恩來忍辱負重，苦撐危局，爲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偉人風範。整篇文章歌功頌德的意味仍舊非常的濃厚。

由以上的回顧可看出，關於周恩來在文革時期的相關資料，仍然無法擺脫過度渲染林彪，江青，四人幫等人的罪狀，對於毛澤東與本文主要研究對象周恩來顯現出高度宣揚的傾向，在這樣具有強烈中共官方宣傳色彩的文獻內容中，難免會出現與史實有所出入的地方，這些面向都是值得再去深入探討與還原。

肆、 資料運用與研究方法

資料運用方面，在文革時期與周恩來有關的資料，將是蒐集上的重點，並試圖利用一些中共已經開放的檔案資料、相關的黨史著作、有關的專書和期刊論文，來了解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尤其是1966-1971年所扮演的角色。

由於目前許多歷史檔案中共並未開放供海內外的學者閱查，檔案目前未開放，查閱相關檔案仍舊存在種種限制，因此研究上存在著一定的難度。也由於直接查閱原檔有一定的困難，因此利用經過整理與編輯過的已出版檔案資料，成爲目前研究中共歷史的一個重要的途徑。

在中共黨史文革方面的資料，主要是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37]，此文庫收錄了大量文革時期已開的第一手資料與檔案，內容包括中共中央的指示、重要人物的講話與批示等；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部編的《中共文化大革命

[36]江山，〈在晚年周恩來身邊採訪〉，《百年潮》，期 3（2009 年），頁 26-30。

[37] 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重要文件彙編》[38]，也蒐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中央檔案的相關資料。

至於中共建國後的一些相關史料，也必須加以注意，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的《中共機密文件彙編》[3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40]中均收錄了許多中共建國以來有關中共中央的指示、政策宣導、重要人物的講話記錄與批示等第一手資料。

相關人物傳記或年譜，以及中共的黨史相關出版品，裡面提供相當多的參考資料，但在運用上，要與其它史料作逐一比對，以免落入編纂者因個人意識形態或情感等因素，而導致失真的圈套中，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周恩來年譜1898-1976》上、中、下卷[41]、金沖及主編的《周恩來傳1898-1976》一至四冊[42]；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43]等。

其他資料在報紙與期刊部分，在文革時期較重要得有《人民日報》、上海《文匯報》兩份報紙；雜誌方面爲《紅旗》雜誌，都是重要的資料，還有大陸方面出版的期刊，：如《黨的文獻》、《文獻和研究》、《黨史天地》、《百年潮》、《炎黃春秋》、《中共黨史研究》等，這些期刊裡的相關文章，有助於了解周恩來在文革時期的經歷與處境，不過其中內容多帶有歌功頌德與宣傳個人的意味，在使用上必須要適當的解讀，才能真正反應事件的始末。

此外，透過相關專書的蒐集與整理，從中找尋有關的論述，並加以分析整理，也有助於了解周恩來在文革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如：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

---

[38]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部編，《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臺北：上海印刷廠，1973 年）。

[39]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年）。

[4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1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年）。

[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76》，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

[42]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898-1976》，共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43]逄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邁克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44]、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45]、陳永發編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李志綏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6]、吳法憲的《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47]，王力寫的《王力反思錄》[48]、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49]、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50]、權延赤的《走下聖壇的周恩來》[51]、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52]卜偉華的《「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53]等。

研究途徑部分，最主要是以歷史研究途徑為主，透過檢視歷史的相關紀錄與資料，並嘗試重建歷史事實，進而發現其中的因果關係。在此將透過官方的檔案資料、傳記年譜，期刊報紙和相關專書的研究與分析，並試圖去除其中過份渲染與宣傳的部分，並加以適當解讀，期望藉此瞭解周恩來與文革的關係，並加以探索周恩來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伍、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緒論，第五章是結論。

第二章部分是關文革爆發初期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下分三節：第一節討探在周恩來在文革爆發初期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敘述「海瑞罷官」、〈五一六通知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毛澤東與

[4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8年6月)。

[4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4月)。

[46]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 11 月)。

[4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

[48]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

[49]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50]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51]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年1月)。

[5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

[53]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

周恩來在這些事件上的互動情形。第二節是討論在天下逐步走向大亂中，周恩來經歷了〈十六條〉、紅衛兵等混亂的局面，周恩來在毛澤東與其他重要幹部面前的自處之道。第三節討論到隨著文革的運動進入全面奪權的時期，周恩來一方面「抓革命」一方面「促生產」，須加以了解周恩來扮演這雙重角色的作用，並且探討周在「一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的部分是關於身處在文革鬥爭中周恩來的自處之道，下分三節：第一節是討論當奪權風氣蔓延全中國時，周恩來介入「賀龍案」、「二月逆流」、「伍豪事件」的原由與其中的前因後果，將在此探討。第二節是關於周恩來在 1967 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動亂一年的處境，特別是「武漢事件」中周恩來的處理與因應之道。第三節是關於周恩來的政治上的手腕與行事作風，從「楊、余、博事件」到「五一團結」再到「火燒英國辦事處」周恩來的處理之道，此外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的關係，也必須加以了解。

第四章是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的作爲，下分三節：第一節是探討 1970 年廬山會議前後周恩來與林彪集團之間的關係，周恩來在林彪這位毛澤東欽點的第二位接班人之前，周恩來的自處之道爲何，有待去了解。第二節討論到周恩來如何發現毛澤東與林彪關係逐漸生變，當周恩來發現毛、林兩人的關係生變，周恩來的處境與政治地位又是如何，也是本節探討的重點。第三節討論到「九一三」事件前後，周恩來與林彪集團之間的關係，這段期間周恩來、毛澤東、林彪三個人之間的互動情形爲何，在此需加以探討與了解。

第二章 文革爆發初期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

毛澤東（1893-1976）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觀意圖，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為了「防修正主義」與 「反修正主義」，或者說是在這兩個修正主義的號召下進行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十年的歲月裡，誰也沒有說清楚什麼是修正主義，但毛澤東卻把這個誰說不清楚的「修正主義」的概念廣泛運用，他不僅認為修正主義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大大助長了寧「左」勿「右」的思潮更加發展，並認為黨的一些領導人推行的是修正主義路線，並使用浮濫，使得文革期間許多鬥爭目標的都是含混不清，而這種打亂仗的情形，不斷在十年文革中不斷上演。[54]

從三面紅旗到七千人大會，中共面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經濟考驗下，毛澤東卻與他欽點的接班人劉少奇（1898-1969）之間產生嚴重的紛歧。劉少奇不同意毛澤東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與矛盾，劉認為當前的矛盾應該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55]而在四清時期，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下鄉蹲點，但是遲遲不見動靜。劉少奇登高一呼，全國幹部紛紛動起來參加城鄉四清。這讓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也讓毛澤東決心鬥垮劉少奇，[56]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幟，毛澤東發動「以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57]的文化大革命，一場歷時十年撲天蓋地的風暴自此席捲中國。

第一節 扮演文革推手的角色

[54]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129-130；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5。

[55]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965。

[56]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574-575。

[57] 〈給江青的信〉（1966 年 7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71。

1932 年 10 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被奪去軍權，由周恩來(1898-1976)取代他，成爲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毛澤東因而掉入政治權力的谷底，在毛的眼中，周恩來犯下非常嚴重的錯誤，在毛澤東失勢的這段期間，周恩來倒向以共產國際爲靠山的王明（1904-1974）等人合作，更讓毛澤東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於之後兩人共處的四十餘年政治歲月，不時的拿出來敲打周恩來，毛並刻意提拔劉少奇作中共第二號人物，用以制衡周恩來，並防周恩來在黨內形勢發生突變的關頭時，再一次棄他而去。[58]1938 年後，毛澤東準確地利用了周恩來的性格特點，對待周，有揚有抑，有緊有鬆，成功地瓦解了周恩來與王明的聯盟，並重新理順了毛周二人的關係。[59]爲了平息毛的疑慮，周不得不檢討自己：「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寧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60]而毛澤東也不時的提出：「保持無產階級晚節」[61]的論點，也因此「晚節不忠，一筆勾消」[62]成爲周恩來在毛澤東身邊處事的政治基調。而毛澤東也非常了解周恩來，緊緊抓住周恩來在政治上「謙虛有餘，直言不足」的弱點。[63]對毛而言，周恩來是須臾不可缺的股肱，周的崇高聲望、非凡才幹和對中共革命事業的獻身精神，使周成

---

[58]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279。

[59]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278。

[60]〈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1966 年 5 月 2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年)。

[61]〈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2]〈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3]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23。

爲任何人都難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瞭解周沒有爭當中共領袖的權慾，對毛毫無威脅。[64]毛周兩人聯手治理中國的半世紀中，兩人的關係一直維持這種模式。

周恩來是贊成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周恩來看來，「文革」主要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是社教、「四清」運動的繼續，與社教、「四清」沒有本質的區別。這是周恩來認爲「文革」的本來意義。[65]1966 年 8 月 14 日，周恩來在接見即將離任的波蘭駐華大使克泰諾談到文革時有一段對話。周恩來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這是個長期的工作。」[66]此外，周又說：「階級鬥爭不是突然出現的。過去我們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在由農村發展到城市，這首先是從學校開始的，也涉及到報紙、文化界，這些都是上層建築，是起指導作用的地方。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深入開展，所以階級鬥爭就尖銳化了，只是形式上有些區別，而不是本質的。」[67]應當說，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在內容上與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思想改造有某種相通性。儘管周恩來過去一直主張思想改造要靠自覺，要和風細雨，但是在官僚主義及種種社會陰暗面屢禁不止的情況下，也不會排斥贊同用搞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嘗試。[68]文革前，周恩來就提到對群眾運動的支持：「經驗證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必須從根本上治療。這就是大鳴大放，依靠群眾來解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如何防

[64]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278-279。

[65]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期 3（1998 年），頁 51。

[66]〈周恩來會見即將離任的波蘭大使克泰諾時的談話〉（1966 年 8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7] 〈周恩來會見即將離任的波蘭大使克泰諾時的談話〉（1966 年 8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8]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頁 51。

止修正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經驗。這幾年來，我們黨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教導，採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來避免修正主義篡奪領導，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最近幾個月來，我國轟轟烈烈開展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是一場“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69]顯示周恩來最終沒能從根本上糾正「文革」的錯誤，而周恩來對「文革」的態度既是被動接受的，也是擁護和贊成的。[70]周恩來從來不曾根本上反對文革，周的緩和作用只能減輕局部的、暫時的痛苦，周支持毛造成的傷害遠大於他減少的損失。[71]

身爲中共中央次於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第三號人物周恩來，文革前專注力顯然在經濟建設上，他在1965年9月30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週年的招待會上發表這樣的談話：「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出現了新的全面高漲，我國的國民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代……」[72]因此他對於毛澤東授意江青（1914-1991）等人策劃的文革導火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刊登在上海《文匯報》一事，事前並不知情，[73]然而在他得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出中扮演的幕後角色之後，周恩來發表這樣的談話：「主席說了，就是在想，吳晗罷官，是文化革命的一個影子。主席要點名，彭真當耳邊風，主席到上海組織力量，姚文元的文章是這樣出來的。」[74]可見周已確切知道毛是這篇文章的幕後主導者。周恩來隨即

[69]轉引自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頁51。

[70]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頁51。

[71]金鍾，〈忠君思想與天下大亂—敬覆有關評周的幾個問題〉，載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78。

[72]〈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六周年招待會上周恩來總理講話〉，《人民日報》，版2，1965年10月1日。

[7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頁1833-1834。

[74]〈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1967年1月14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催促限制此文在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北京市委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1902-1997）發表此文，之後彭真應是知道這篇文章的幕後主使人物，因此他批准《人民日報》轉載〈海瑞罷官〉，[75]於是在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轉載姚文元（1931-2005）發表在上海《文匯報》的這篇文章－〈海瑞罷官〉，並加入周恩來和彭真修改審定的按語。按語中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時事求是，以理服人。」[76]按語的精神是把《海瑞罷官》作爲學術問題進行討論即是執行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77]的策略，顯然周恩來震懾於毛澤東的威嚴，也知道毛命難違，不僅選擇跳上毛安排好的文革第一砲的最前線，更因此打進毛眼中認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劉少奇掌控下的北京獨立王國[78]。

爲了進一步孤立劉少奇的地位，毛澤東打算對中共中央一線的幾位領導人物分化爭取，並採取「聯林、拉周、整鄧、倒劉」[79]的策略，毛澤東爲了爭取林彪（1907-1971）在軍隊的權力，利用林彪與羅瑞卿（1906-1978）在軍權角力戰中的明爭暗鬥，拉攏林彪、打壓羅瑞卿，以防止劉少奇利用羅瑞卿謀權的企圖。毛澤東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場：「羅瑞卿思想有問題，把林彪當成仇人對待……羅是野心家，是搞陰謀的人。」[80]言下之意毛已經默許林彪鬥倒羅瑞卿，周恩來當然也嗅到毛澤東的政治風向，在幾次公開談話中集中火力猛力批評：「羅瑞卿是搞陰謀活動的」[81]、「在公安部中搞特務作風」[82]，甚至毫不留情的批判：「羅瑞

---

[75]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 ： 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頁 34-35。

[76]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768。

[77]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34。

[7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02。

[79]林即林彪，周即周恩來，鄧即鄧小平，劉即劉少奇。

[80] 毛澤東，〈關於羅瑞卿問題的談話〉（1965 年 12 月 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1] 〈周恩來對首都大專院校代表和全國廿五省市紅衛兵的談話〉（1966 年 10 月 22 日），宋永毅

卿搞兩面手法，表面聽林副主席的話，暗地裡搞另一套」[83]，由此不難看出，毛一旦決定打倒一個人，周一定跟他一個鼻孔出氣。

接下來，毛澤東進一步打擊劉少奇的心腹彭真，《文匯報》刊載〈海瑞罷官〉之後，彭真曾經質問上海市委會宣傳部，爲什麼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不事先跟中宣部打招呼，此舉引起毛的大大不滿，毛指出：「吳晗發表這麼多文章，從不要打招呼，從不要經過批准。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偏偏要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84]彭真此舉儼然犯了毛澤東的大忌，與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共中央」作對，而由彭真負責起草的〈二月提綱〉[85]，更遭受到毛澤東非常嚴厲的批評：「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86]甚至直接點名批判彭真，周恩來事後聽康生（1898-1975）轉述毛澤東大力批判彭真的舉動[87]，便知毛已將鬥爭矛頭對準彭真，於是周恩來指出彭真的〈二月提綱〉與毛澤東發動並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前進〈海瑞罷官〉的批判是針鋒相對[88]，周的言下之意，就是暗指彭真的〈二月提綱〉大開文化革命的倒車，周恩來並寫信給毛澤東表

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2]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 年 12 月 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3]〈周恩來對“軍隊院校部隊文藝工作者紅色造反者揭發控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處全體同志的講話〉(1967 年 1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4]毛澤東，〈與康生等談話紀要〉(1966 年 3 月 28-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5] 〈二月提綱〉即是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所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27。

[86]〈毛澤東與康生等談話紀要〉(1966 年 3 月 28-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87]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24。

[88]〈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的發言〉(1969 年 4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明同意毛的立場：「**五人小組報告是錯誤的**」[89]，隨後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集中火力批判彭真[90]，再次強調他支持毛澤東的態度。

在這樣不尋常的氛圍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完全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進行。周恩來更是在會議中集中炮火猛力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1906-1996）、楊尚昆（1907-1998）四人，[91]5 月 23 日會議中決議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撤銷他們四人的職務，另外還決定撤銷原來以彭真爲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5 月 16 日會議中通過會前由陳伯達（1904-1989）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92]而這次召開的會議正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93]，而對於毛澤東主導揭發「**四大家族**」[94]的會議，周恩來認爲：「**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應該慶祝。**」[95]，

[89] 「五人小組報告」即是指〈二月提綱〉，〈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1966 年 4 月 2 日），手稿，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08。

[90]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28；周恩來在會議中指出彭的提綱是反對高舉毛澤東思想，1962 年七千人大會中林彪的講話，並批評彭擺出一付一貫正確的姿態，驕傲自滿，自高自大，從無自我批評，彭經常講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好話對著我們說，壞事背著我們作。羅瑞卿的事情發生後，毛主席已經指出他的錯誤，他不去檢查自己的錯誤，還去改羅的報告（指檢查小組報告），為羅打掩護，為自己謀出路。〈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91]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這次在中央揭發的彭、羅、陸、楊是中央領導機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開“四大家族”，奪回他們所佔領的陣地是剝削政策的勝利，……不到半年時間，“四大家族”原形畢露，事情不簡單，鬥爭剛開始。我們的陣地一個一個地被奪走了，現在要一個個地奪回來。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散佈了大量毒素，……把定時炸彈挖出來，中央更加團結了，全黨全國人民更加團結在毛主席的周圍。」〈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9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0。

[9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38。

[94] 周恩來在發言中用「四大家族」代指這次會議中遭到檢討與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周恩來亦步亦趨的跟緊毛澤東的腳步，絲毫不敢鬆懈。

在〈五一六通知〉發表前，毛澤東曾說明了他的「剝筍」政策，要將一些他認爲壞的黨員一層層剝掉，但是毛認爲當時還有睡在他們身邊沒有發現應該剝掉的黨員，[96]在〈五一六通知〉中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他的說法：「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97]毛在此雖沒有直接明指他要打倒劉少奇，但是已經暗示出他要將劉少奇「剝掉」，而劉少奇就是睡在身旁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要打倒劉少奇，毛的暗示周恩來也聽進去了，雖然毛並沒有把話講明，但是周恩來經過一番揣測，還是確認了毛的本意：「睡在旁邊的赫魯雪夫，在中央來講是劉少奇。」[98] 爲保晚節的周恩來又再一次順了毛澤東的意，推波助瀾將文革命大火燒向劉少奇。

在中共近年來內部發行《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中，公佈了一個〈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裡面有許多內容都大大讚揚周恩來堅決的站在毛澤東身邊，與彭真作鬥爭。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在「四月二日〔1966〕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提示，

---

[95]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9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41。

[97] 〈對中央關於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會報提綱》通知稿的評語和修改〉(1966 年 4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43-44。

[98] 〈周恩來接見陸海空三軍聯合演出單位代表的講話〉(1967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指出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錯誤的」，另外，「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99]然而在《周恩來年譜》中許多史實被刪去，例如，1966 年 4 月 2 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表示支持一事，僅僅在內容提到周恩來聽取關於打井抗旱的工作彙報而已，[100]《周恩來年譜》也刪去了周恩來最關鍵的堅決反對彭真的政治失誤，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抓生產的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也是貫穿中共官方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一來它可以遮醜，二來又突出了「人民的好總理」念念不忘民生的疾苦。[101]

〈五一六通知〉發出之後，當時北大學生領袖聶元梓（1921-）認爲毛澤東發出的〈五一六通知〉是爲了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者起來保衛中國共產黨，[102]於是聶元梓認爲：「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黨中央走，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103]，聶並認爲經由彭真的倒台，她看到了希望，而也因她認爲北大當時的情況太複雜，有必要寫個報告給毛澤東與劉少奇匯報一下當時北大的狀況，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聶元梓等人雖然搞不清楚什麼是「修正主義」、什麼是「走資派」的情況下，就是憑著感覺走，以爲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工作上存在的問題，推測陸平（1914-2002）會變成「修正主義」，全共產黨與全中國都會變色，[104]聶元梓等人事前還請示過曹軼歐（1903-1989）要寫大字報的事情，並

[99]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66-67。

[100]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25。

[101] 宋永毅，〈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351。

[102]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114。

[103]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115。

[104]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115。

取得她的同意。[105]於是在 1966 年 5 月 25 日由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內貼出一張提爲〈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106]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並被毛澤東所利用，根據李雪峰（1907-2003）的說法這個大字報是「康生搞的」[107]，而根據聶元梓的說法這張大字報的具體內容，只有他們幾個參加寫作與簽名的人知道，他們事前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只有同意他們寫大字報，並不知道具體內容，康生也不知道，[108]不過這張大字報正中毛澤東由下而上推動文化大革命進程的下懷，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09]這張大字報的確是毛澤東屬意的[110]，這張大字報給了毛澤東靈感，好讓毛借題發揮，[111]顯然毛有意透過康生製造上下之間的對立，他打算利用這次大字報的事件將廣大無法找到宣洩管道的群眾之火燒到劉少奇身上。毛澤東指示康生、陳伯達（1904-1989）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由新華社廣播全文，並在全國各報刊發表，[112]希望於群眾基層中點火，挑起群眾造反的火牛陣，一舉延燒到當時毫不知情仍正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身上。而周恩來得知這次的大字報事件後，立即做出正面的回應，周強調要從正面講毛澤東的偉大決定，對大字報的工作要說服，不能壓，[113] 在 6 月 2 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了〈宋碩、

---

[105]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117。

[106] 大字報的內容嚴厲指責當時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黨委副書記彭佩雲搞修正主義，並指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1966 年 5 月 2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07]李雪峰，〈我所知道的 “文革”發動內情〉，收錄於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 —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600。

[108]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122。

[109]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123。

[110]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323。

[111]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130。

[112]〈關於廣播《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大字報評語〉(1966 年 6 月 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62。

[11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 “文革”發動內情〉，收錄於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 —中

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全文內容，並發表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鼓勵揪鬥各級領導[114]，從此全中國的高等學校陷入一片混亂，鬥爭上級的風氣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

此時中共中央領導層階對工作組問題出現正反兩種不同的意見，劉少奇，鄧小平認為運動必須要有中共黨內的領導，要較有秩序的進行，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等人，則提出工作組的設立阻礙運動的進行，主張文革應由群眾自己進行，不能由工作組包辦代替。[115]雙方在這個的問題上針鋒相對，發生了嚴重的爭執。此時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開始對劉、鄧兩人提出尖銳的批評：「回到北京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116]也因毛澤東大動作的批評，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分別選擇一所聯繫院校，到基層去調查研究，[117]周恩來選擇北京東郊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去研究。

原本毛澤東對工作組的作法是：「同意這樣做」[118]，當時也沒有人對工作組的作法提出異議，包括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這時對工作組的問題也是是同意劉少奇與鄧小平的作法[119]，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領導層面對

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下冊，頁 601。

[114] 「陸平、彭佩雲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學，是"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而他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聶元梓等人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你們的紀律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實行殘酷無情的打擊。」〈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1966 年 6 月 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15]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44。

[11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1422。

[117]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45。

[118] 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說，《人民日報》的威信下降，希望能派工作組去解決其內部問題。〈關於同意派臨時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的批語〉(1966 年 5 月 30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61。

[119] 周恩來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工作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周恩來就工作組問題給劉少奇鄧小平的信〉(1966 年 7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待運動的認是不一致，注定了工作組必然要犯錯誤，[120]這也說明了後來毛澤東開始對大批派工作組的方法不以爲然。毛澤東於是透過康生傳話給周恩來，要求周不要同劉少奇、鄧小平兩人一樣陷入工作組，並囑咐周要積極加入中央文革的工作，毛澤東並同意只要周恩來能做到上述工作，就讓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21]毛澤東此舉警告意味十足，再加上毛澤東對工作組提出批評：「工作組一個多月，起阻礙革命的作用，實際上是幫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組是坐山觀虎鬥，看著學生鬥學生。」[122]、「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工作組阻礙運動、工作組有錯誤。」[123]雖然周恩來都是在毛澤東的「批准」下進行支派工作組的業務，[124]但是當周恩來聽到毛澤東如此批評工作組，隨即改變他的說法，周認爲工作組的作法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125]周也說到工作組的存在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要求，不僅造成了群眾鬥群眾的現象，也把學校和學校的聯繫也隔開了，[126]周恩來甚至檢討自己對工作組曾經提出支持[127]。隨後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128]接下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在

---

[120]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130。

[12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613-614。

[122] 〈關於撤工作組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23] 〈在會見大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24]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批准下，草擬新華社電訊搞，指派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5-36。

[125] 〈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9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26] 〈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7 月 29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27]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我們派工作組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依靠群眾鬧革命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理。因此，我們應把責任引到自己身上，我們檢討。工作組應該檢討，……一直到主席親自抓這個問題，才認識到工作組應該撤回。」。〈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 年 8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28] 〈中共北京市委關於撤銷各大專院校工作組的決定〉(1966 年 7 月 2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撤銷工作組後，到清華大學「過問」文化革命運動問題。[129] 周恩來首先再次檢討工作組錯誤，並將問題再次聚焦到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上，周恩來對清華大學的學生說到:「煽風點火,煽社會主義的風,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火。」[130]戰戰兢兢努力執行毛澤東交代的「既光榮，又艱鉅」[131]的任務。劉少奇曾經在 1966 年 6、7 月間針對工作組問題，指責那些不聽工作組指揮的學生，[132]加上劉少奇曾簽署一份文件，該份文件同意北大工作組鎮壓「六一八事件」[133]，因此在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聲色俱厲的批評這股來自中央鎮壓學生運動的力量[134]，面對毛澤東的指責，劉少奇一開始承認是自己的問題:「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135]但是毛澤東卻不斷的挖苦劉少奇:「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136]並將劉上綱上線爲路線錯誤與違反馬克思主義[137],劉少奇因而回應:

---

[129]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48。

[130] 〈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 年 8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1] 〈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 年 8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2] 劉少奇在發言中指出:「什麼人在指揮，不聽黨的話，聽誰的話？肯定聽黑幫的話，搞地下活動，非法地煽動群眾，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動。……他們利用群眾對黑幫的氣憤情緒，把文化大革命搞亂，背著工作組、革委會搞地下活動。」,會議中並有人發言指稱這些學生是:「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參見〈劉少奇六七月間對北師大一附中的指示〉(1966 年 6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3]1966 年 6 月 18 日上午，北京大學工作組召開全體工作隊員大會，研究動員大會後的情況，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大會精神，領導好運動。上午 9 時左右，校園內又突然爆發了亂揪亂鬥事件。被鬥者頭上戴高帽，臉上塗黑墨，身上貼大字報；罰跪、揪頭髮、撕衣服、拳打腳踢、遊鬥。張承先，〈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組〉，《百年潮》，期 2（1998 年），頁 58。

[134]毛澤東指出鎮壓學生運動是:「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參見〈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5]〈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66 年 8 月 4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27-1428。

[136]〈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66 年 8 月 4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28。

[137]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

「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138]，不料卻引來毛澤東更尖銳的指責：「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139]，毛澤東、劉少奇兩人的正面交鋒，使這場會議上瀰漫著前所未有的緊張氣氛。

在這樣緊張的氛圍下，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寫下了震驚全中國上下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140]

這張大字報中所說的「司令部」，就是在毛澤東眼中「資產階級司令部」，也就是指劉少奇。[141]8 月 5 日周恩來與毛澤東開完會之後，曾打電話給劉少奇，建議他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也不要會見外賓。[142]顯然周恩來已徹底明白毛澤東的意思，

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38]〈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66 年 8 月 4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頁 1428。

[139]〈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記錄〉(1966 年 8 月 4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頁 1428。

[140]〈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 年 8 月 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91。。

[141]〈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 年 8 月 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91。

[14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949-1976)》，下卷，頁 46。

雖然一方面周恩來表面上看來是好意對劉少奇示警，但另一方面也頗有扮演毛澤東傳聲筒的意味。這張大字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於 8 月 7 日印發中央全會[143]，也表明毛澤東已經正式與劉少奇劃清界限，欲集中攻勢「炮打」劉少奇。而周恩來也感受到不尋常的氣氛，特別交代值班的秘書，如果毛澤東通知他去開會或談事情，要隨時醒他，這段期間周恩來也天天到毛澤東處所開會，[144]毫無疑問，眼下劉少奇的態勢讓周恩來更加戒慎恐懼，更讓周恩來下定決心在政治上緊跟著毛澤東走，只爲了不落得 「晚節不保」的下場，[145] 但也更進一步把全中國推向文革的災難之中。

第二節 天下大亂

毛澤東在寫好〈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後，曾找來周恩來觀看大字報的內容，毛主動跟周恩來說：「看來劉少奇不行了」[146]，並詢問周有關於接班人的問題，此時毛澤東早已拿定主意，決定由林彪擔任下一任的接班人，面對這情況，周恩來當然不會違反毛澤東的意願，順守毛的意願，要林彪回來擔任接班人。[147]而毛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內容後，在還沒有印發中央全會之前，是由周恩來唸給一些中央較核心的領導份子聽，也是經過周恩來的一番提示大家才明瞭，毛澤東已決心以林彪擔任唯一中共中央副主席，並取代劉少奇的地位。[148]周恩見狀來，隨即秘密安排，將林彪從大連接回北京，周恩來不僅親自至機場接機，當林的專機降落機場時，周恩來與汪東興還親自上飛機迎接

[14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28。

[14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6。

[14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27。

[14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9 月），頁 594-597。

[147]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594-59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30。

[148]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596-597。

林彪，隨後並與林彪一同步出飛機。[149]可見，周恩來不僅遵守毛澤東的命令，更進一步將毛心中之意圖落實。周恩來知道毛澤東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等人只是第一個目的，主要目的是權力鬥爭，因此周恩來時刻惦念的是讓毛知道自己並無二心，一切大權都在毛的手中。[150]

自此之後，周恩來不僅爲毛澤東造神，更爲林彪造神[151]，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談話：「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我們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在全國人民面前端出來，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見面，同全國人民更廣泛地結合，讓毛澤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進全國人民思想進一步革命化。我們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揭露各種修正主義。」[152]林彪大力吹捧毛澤東，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賞和重視，因此林彪的講話第一次印發中央全會。[153]

---

[149]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6月），頁328-329；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Cultur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79.

[150]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上）〉，《記憶》電子版，期 16(2009 年 3 月)，頁 9。

[151]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2009 年 3 月)，頁 5。

[152]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5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599。

周恩來接續這個發言別出心裁的對林彪又吹又捧[154]，從 1969 年 4 月 14 日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周在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愧是廣大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155]周恩來甚至做如下的發言：「我們的副統帥林彪同志已經是眾望所歸的了。經過幾十年的培養，經過幾十年的鍛煉，經過幾十年的領導經驗的證明，林彪同志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這樣經過考驗的領袖，事實上已經存在了，為什麼我們不在法律上定下來呢？」[156]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來，也是史無前例的事。即使翻開各國共產黨史來看，無論是哪國共產黨，也無此舉，周恩來這提議，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157]而林彪一直以來在中共政治圈有「毛主席的親密戰友」[158]與「副統帥」[159]的稱號，這也是因為周恩來的緣故。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通

[154]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5。

[155]〈周恩來在九大中的發言〉(1969 年 4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56]〈廣州市機關紅司 820 通訊社上海新化工總部“動態”編輯部〉，《文革通訊》，期 1（1967 年 10 月 9 日），轉引自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5。

[157]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6。

[158]在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之後，隔天的報紙要報導毛澤東與林彪接見紅衛兵的情形，周恩來提議要在林彪的照片旁加註「毛主席的親密戰友」這幾個字，以凸顯林彪的地位，自此就成為中共各場合的慣用法。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08。

[159] 在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周恩來等人稱呼毛澤東是「偉大的統帥」，林彪自然就成為「副統帥」，自此之後稱呼林彪為「副帥」就成為周恩來的口頭禪。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頁 608。

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十六條〉)。但是這份文件不是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出來的，而是在〈五一六通知〉發下之後沒多久，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由陳伯達等人於 6 月份即開始撰寫的。[160]〈十六條〉的內容指出進行文化革命的重點，是用大字報與大辯論的方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161]會議另外一個重點是接班人問題，這次會議的實際組織者是周恩來，周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將接班人從劉少奇換成林彪，但是還是要把劉少奇放在中常委的名單中，於是林彪的排名升到毛澤東之後，居第二位，第三位是周恩來，劉少奇則從原本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162]雖然根據高文謙訪問吳法憲後得到的結論，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解決了因黨內排名順序而衍生出來的棘手問題，實在功不可沒，[163]此舉卻協助毛澤東去除掉處在第一線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164]也協助毛澤東利用個人的權威，透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合法的程序奪取了第一線領導人的權，把大全集中到毛的手中，是造成文化大革命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165]雖然高文謙認爲對於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風暴，周恩來一直都是身不由己置於這場大風暴的中心，不得已才由被動捲入轉爲積極投入。[166]但是實際上情況卻是周恩來又再一次貫徹毛澤東的個人意願，徹底的執行毛澤東的命令。

---

[160]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15-617。

[16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 年 8 月 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62]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17；〈中共中央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結果的通知(中發〔66〕400 號)〉(1966 年 8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9。

[163] 最後常委的排名結果，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的排名卻排在總書記鄧小平之前，顯得不倫不類，最後在周恩來的建議下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他接班人的地位，其餘的人皆以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對外公布。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31-132。

[164]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但處在第一線的同志處理的不那麼好。現在，這個一線、二線的制度已經改變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10 月 2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43。

[165]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201。

[16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32。

雖然劉少奇曾因此檢討自己：「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在工作組派出之後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組的，這樣就增加了工作組犯錯誤的可能性和嚴重性。……這樣，就違背了革命群眾運動發展的規律，就發生了許多嚴重事件，就在事實上站到反動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運動打了下去」，劉更進一步檢討自己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主席思想」[167]，期望能平息毛澤東的怒氣。但是整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鬥爭鋒芒，仍然直接指向劉少奇與鄧小平，這也是毛澤東的意思，毛希望以會議形式解決劉少奇與鄧小平的問題，儘管表面上還保留他們的一些職務，但是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拉下馬，而且注定不久之後被徹底打倒的命運。[168]

雖然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鄧小平的總書記一職已成空銜，但是由於會後中央書記處仍然繼續運作，對此毛則東非常不滿，於是毛的心病發作，因此先前在鄧小平中央書記處指導下的工作組織逐漸被毛瓦解，各部門的領導人並經歷空前慘烈的清洗。[169]周在經過毛澤東的同意下，對中共中央調查部進行軍事管制。[170]由於劉少奇的地位已被架空，因此當時的中央日常工作落到周恩來身上，所有的文件都是由周批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的公報在會議召開之前就寫好了，也是經過周恩來的批示，那個時候就已經決定要把劉少奇拉下馬，另外，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內容還包括把劉少奇公開發表的講話給「勾掉」[171]。後來周恩來的權力更擴大到中央文革小組，在多次處理地方派系的紛爭時，都以中央文革的

---

[167] 〈劉少奇為北京市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寫的檢討（摘錄）〉（1966 年 9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68]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01。

[169]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110-111。

[170]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38。

[17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41。

名義喊話與介入。[172]雖然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上的組長，但是周恩來對小組支配的的權力如此的大，以至於只要周覺得合理，就可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聲與干預地方事務。[173]林彪雖然名義上是排名第一的副總理，但是他將中央的日常事務都交給周恩來處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周恩來即開始例行主持「中央碰頭會議」，而早在全會召開前夕，周恩來已經在毛澤東的指示下，負責起草重要文件，並由毛澤東作最後審定。[174]雖然中共中央每天要處理的文件多達一千三百多件，但是沒有一件是毛澤東不知道，也沒有一件事不是周恩來親自處理的。[175]也因此有國際政論家評論道，在毛與周聯手治理中國的半世紀中裡，中國是被置於毛澤東的頭腦裡，同時也被置於周恩來的手掌中。[176]換言之，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兩人間的互動，一直都維持著毛澤東決策，周恩來執行的基本模式。

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周恩來歷來被塑造形象都是對紅衛兵一些「破舊立新」的舉動和倡議表示並不以爲然的態度。[177]周恩來雖然曾經對遭到紅衛兵迫害的宋慶齡提出保護，[178]但是或許正如《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的說法，周恩來幫助宋慶齡的原因是因爲一方面兩人交往多年且彼此相知很深，[179]，另一方面也是

[17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83。

[173]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16。

[17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14。

[175]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訪問林辦工作人員談話紀錄，轉引自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14。

[176]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12。

[177]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59。

[178]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對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去搜查？如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在歷史上有功績。毛主席在解放北京後寫的頭一篇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了孫中山的功績，一九二四年和我們合作，他的功績在紀念碑上也有。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搞掉孫中山的銅象，這不好，地方不合適換個地方嘛！搞掉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了。」〈周恩來王任重對北京市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 年 9 月 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7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38。

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才敢做保人的舉動，[180]然而事實卻是，周恩來面對紅衛兵的態度與毛澤東一樣，是正面的肯定與支持的，[181]毛澤東對紅衛兵「造反有理」的精神表示熱烈的支持[182]，毛澤東並指示《紅旗》雜誌刊出兩篇文章—〈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與〈再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這兩篇文章都是由紅衛兵所寫的大字報更名而轉載的。[183]而中央文革小組對南開大學紅衛兵抓叛徒的活動也是讚賞有加，並批准且同意南開大學抓叛徒的紅衛兵以「中央特許」和「中央專案組」的名義，到各地抄家、抓人、審訊和查閱機密檔案，並不需再向上級請示。[184]實際上，讚賞有加的不僅是文革小組，周恩來也在其中。而且「中央專案組」的最高領導就是周恩來，以「中央專案組」名義也是周恩來同意的。[185]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用來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中央文革小組最大的特點依照周恩來的說法，就是直接執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186]，因此周恩來一直都在努力執行毛澤東交代的任務，也深知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是毛澤東清除異己

---

[180]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間，紅衛兵闖入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家中任意查抄資料，章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他家的情況，毛澤東指示周恩來予以保護，於是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擬訂一份需保護的名單，名單中包括宋慶齡、章士釗等人。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40-1441；〈在章士釗反映被抄家情況來信上的批語〉（1966 年 8 月 30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16；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3。

[181] 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3-4。

[182] 〈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 年 8 月 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87。

[183]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於 1966 年 6 月 24 日寫下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於 7 月 4 日寫下大字報〈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送江青審閱再轉送毛澤東，最後由毛澤東更名並刊登在《紅旗》雜誌上，〈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 年 8 月 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88-89。

[184]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481。

[185] 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4。

[186]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119。

的工具，周恩來不僅絲毫不敢懈怠，並且徹底的執行每一道來自毛澤東的命令。

另一方面，雖然周恩來對紅衛兵運動中普遍存在的亂打亂鬥問題，花了許多精力去做紅衛兵的思想工作[187]。周恩來希望紅衛兵不要癱瘓交通運行、不要破壞組織宣傳、不要影響中央執行任務、不要亂搞，更不要破壞生產。[188]而有些涉及國家制度的事情，更不能說改就改。[189]而對於紅衛兵到處套用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說法，由於周恩來不敢正面否定毛澤東的說法，[190]只好引用毛澤東的說法「要文鬥，不用武鬥」[191]對紅衛兵釐清運動的原則，周僅對紅衛兵說明，「炮打司令動部」是有所指的，不能亂打一通。不能對一切司令部都炮轟，不能把一切領導都打成黑幫。毛澤東指的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犯了錯誤，但不是一切領導機關都要抓叛徒、一切黨政機關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192]而當紅衛兵將批鬥的焦點集中到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21-2006）身上時，周恩來態度堅定的勸告紅衛兵：「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員，……王光美不去檢查，不能當場檢查，一去檢查肯定下不了臺。」[193]周這時認爲王光美不宜到群眾中去做檢查，而這整

[187]〈李雪峰周恩來陳伯達等在清華大學的講話〉（1966 年 8 月 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88]〈周恩來王任重對北京市紅衛兵代表的講話〉（1966 年 9 月 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89]〈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2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39。

[191]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過：「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社會上批改鬥。要用文鬥，不用武鬥。」。〈要用文鬥，不用武鬥〉（1966 年 8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15。周恩來則引用毛澤東的說法對紅衛兵講話。〈周恩來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 年 9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2]〈周恩來在首都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第二次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 年 9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3]〈周恩來張春橋接見清華大學八個組織的代表座談紀要〉（1966 年 10 月 9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件事也不宜牽涉到劉少奇，[194]周恩來看似苦口婆心力勸紅衛兵，並試圖力挽狂瀾，但是周恩來對紅衛兵的做法大表支持也是不爭的事實，周就曾經對紅衛兵公開表示：「支持你們，幫助你們，保護你們，愛護你們。」[195]周並對紅衛兵在多次運動中搞出安子文（1909-1980）和瞿秋白（1899-1935）等人的黑材料表示讚賞，周恩來聲稱：「這是紅衛兵的功勳」。[196]

紅衛兵也多次舉出證據來表明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支持，並多次向周恩來致謝。天津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就曾說道，1967 年 1 月中旬時，他們再次寫了〈關於搞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請示和報告〉送給周恩來與中央文革等人後，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中央首長給予他們極大的關懷，並不斷給他們重要指示。而當周恩來知道他們過去上報的材料被陶鑄（1908-1969）扣壓的時候，經由中央文革小組、中共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和周恩來的總理值班室都傳達了來自周恩來的指示：「總理叫你們把材料交來」。[197]另外，對於周恩來支持紅衛兵的舉動，寫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1921-）也回憶道，紅衛兵參與當時的所謂「抓叛徒」的活動時，紅衛兵的確有來自周恩來的批示，周恩來指示他們：「可以調查。人數少一點，材料不要公布。」[198]並同意紅衛兵進行「抓叛徒」的相關線索調查工作，由於聶元梓等人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於是他們利用周恩來的這張批示當「通行證」，進行「除隱患」和調查「叛徒」的相關材料。[199]而中央文革小組與紅衛兵之間也確實有聯繫，中央文革小組確實不反對讓紅衛兵其中的成員在某些特殊

[194]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882-1883。

[195]〈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2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6]〈周恩來對瞿秋白的批判〉(1966 年 8 月 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7]〈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們是如何揪出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1967 年 00 月 0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198]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232。

[199]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頁 232-233。

的場合爲它執行某些棘手的任務，特別是當中央文革小組不想承認自己介入的狀態下，因此這些受到煽惑的學生們，由於渴望證明自己的革命價值，他們通常都非常樂意爲中央文革小組鞍前馬後的跑腿，以示自己對文革事業的忠誠。[200]可見，周恩來不僅以個人名義鼓勵紅衛兵的行動，當時對中央文革小組有著操控能力的周恩來，[201]更放任中央文革小組默許紅衛兵的各項運動。雖然《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認爲周恩來決心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竭力勉勵自己以一種熱情投身到文革去，但還是無法斬斷塵緣，不食人間煙火，內心更關注的還是大亂之中的國民生計，周恩來並試圖在執行「天下大亂」與維持國家社會日常生活運作上找一個平衡點，並試圖將兩者在一定程度統一起來。[202]而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周雖然也在各公開場合上竭力號召把經濟與文革區分開來，[203]然而執行「天下大亂」在周恩來的心中分量，似乎是重了一些。

第三節 協助毛澤東全面奪權

自從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周恩來做爲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處在文革運動實際執行者的地位，總是扮演著雙重角色。而周恩來的個性中也有著矛盾性與雙重性，有人認爲他「偉大謙虛」，但也有人認爲他「明哲保身、勇氣不足」。[204]而最能體現周恩來的雙重人格的，莫過於他在文革期間所精心選擇並始終佩戴的那枚毛澤東像章，像章的一端是毛澤東的頭像，表明了周決心在政治上跟著毛澤東走的信念，像章的另外一端刻有毛澤東手書的「爲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則是周政治理念的另一方面，他並一直試圖在這雙重角色中求取平衡。[205]

---

[200]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58。

[201]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16。

[20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42。

[20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63-64。

[204]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20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79。

周恩來一方面貫徹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願，與實現「天下大亂」意圖，另一方面身爲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則必須要維持國家與社會各項工作運作正常，在這兩種角色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周必須要跟緊毛澤東的腳步，心心念念如何繼續排除阻力將運動持續搞下去，但是周又不能放任因紅衛兵大串連而造成混亂的局面持續惡化，因爲若再造成大規模的飢荒，身爲國家總理的周恩來，肯定無法向毛澤東交代。[206]然而這兩種角色時常產生衝突，甚至引起包括毛澤東在內其他中共中央核心領導人的不滿。林彪就曾批評周恩來執行運動不力，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幹勁：「我們許多同志，容易埋頭於糧、棉、油，還有鋼鐵、煤炭的指標，而忽視政治思想。」[207]

在這樣渾沌矛盾的情境下，1966 年 9 月 7 日，周恩來授意陶鑄起草一篇《人民日報》的社論，社論名爲〈抓革命促生產〉[208]，社論內容提出：「革命和生產兩不誤」的觀念，並要求各生產和業務部門要加強領導，廣大的工人、社員和科技人員和其他勞動者要堅守生產崗位，並呼籲學生不要去農村和工廠干預生產和革命。[209]周恩來並在各種場合中努力宣傳〈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身爲中共七億人的大管家的，周恩來著實不希望中共舉國上下，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同時，而將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也就是日常生計問題拋諸腦後。[210]就如王力所言，周恩來身任中共國家總理，要顧及到具體的民生工作，但是他卻很爲難，因爲周同時必須講革命和生產都要抓，兩個擔子一起挑。[211]

隨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議中修改通過〈關於縣以下農村

[20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42-143。

[207]〈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13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08]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9。

[209]〈抓革命促生產〉，《人民日報》，1966 年 9 月 7 日，版 1。

[21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9。

[211]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953。

文化革命〉規定縣以下各級設施仍按照「四清」的規則進行，[212]周並起草了一份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工礦企業如何發展的規定，並指示陶鑄向華東局傳達這些內容。[213]不過卻引起的正反兩面的討論，一方面的輿論認爲以往只對抓革命，而不抓生產的現象著急，另一方面的輿論則對華東局傳達的指示表示懷疑，面對這樣的紛爭，周恩來只好請示毛澤東，有關農村和工礦業企業文化大革命問題，需要在政治局討論一次。[214]毛澤東對於這兩個束縛群眾手腳的規定感到不快，但是又無法置之不理，於是只好表態印發，並指示不要再討論。[215]

不過，周恩來指示陶鑄向華東局轉達內容的舉動，卻埋下陶鑄倒台的導火線，陶鑄顯然是在代替周恩來受過。[216]毛澤東曾經拿著憲法，指著「結社自由」的條文，批評陶鑄與陳丕顯（1916-1995）對上海工人運動不支持的態度。[217]不過關於陶鑄被打倒的內情，最主要還是江青對陶鑄的不滿，江青與陶鑄曾在要不要壓鄧小平的問題大吵一架，兩人各持己見，陶鑄對江青不假辭色，由於江青從來沒有被這樣對待過，因此對陶異常的不滿，周恩來這時也經由王力的轉告得知毛澤東已對陶鑄的作法感到諸多的不滿，[218]雖然陶鑄一直以來都是堅決的在搞階級鬥爭與文化大革命，並盡力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去搞好文化大革命，但是陶鑄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包括陳伯達等人處不好，再加上在批判劉少奇與鄧小平的那次會議上，採取保護態度，爲他們二人講話，因此陶鑄的垮台也就難以避免了。[219]

---

[21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60。

[21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60-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44。

[21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61。

[215]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61。

[21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8。

[217]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55。

[218]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57。

[219]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 2 月），頁 183-184。

1966 年 12 月 4 日，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由林彪親自主持，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輪流批判，批評陶鑄等人「壓革命」，並指出陶鑄等人的錯誤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220]周恩來也在發言中指出：「現在的情況就是勢不可當，我們要學習因勢利導，多數同志對文化大革命不了解，……，以前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221]然而林彪卻對周恩來的這番發言不以爲然，林彪說道：「不是勢不可當，不是當不當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剎車的問題，而是擴大的問題，要讓文化大革命襲捲每一個領域，滲透每一個領域。」[222]林彪有可能奉了毛澤東的命令，趁機敲打周恩來，[223]而周恩來也非常清楚毛澤東不會輕易放過陶鑄，因此周接下毛澤東的旨意，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幫助批評」陶鑄。[224]當毛澤東決心要批陶鑄時，周恩來即使有心保陶鑄，但是在「爲保晚節」的心態下，周並不敢違抗毛澤東的旨意，只能放任陶鑄爲自己背黑鍋，而終至被打倒的命運。[225]在這其中毛澤東曾經因爲陶鑄一案訓誡江青，毛指責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眼中只有她自己一個人，毛並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面前批評江青，毛指出陶鑄倒台就是江青和陳伯達兩人幹的，不僅如此，毛澤東也間接批評林彪，有事不向他報告，對他實施封鎖，只有周恩來不同，周凡是重大問題都會對他作報告。[226]從毛的一番談話中可知道，在陶鑄一事中，毛周二人一直不斷通氣。也因此周並沒有接到毛澤東的指示要保護陶鑄。[227]事實上，毛這麼做說明了他暗地裡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打倒陶

---

[22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98。

[22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99。

[22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99。

[22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7。

[22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69。

[22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71。

[226]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9-30。

[227]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01。

鑄。[228]陶鑄原本是取代彭真，任職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但是陶鑄倒台之後，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了書記處，中央文革小組晉身爲中共中央文件的簽署單位之一，地位迅速提升，僅落後代表中共中央的毛澤東、中共國務院和中共中央軍委。甚至在 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到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後宣布中央文革小組解散，這六個月的日子裡，中央文革小組在正式文件中的地位甚至凌駕於國務院和軍委之上。[229]

1966 年 12 月 26 日，是毛澤東七十三歲的生日，毛澤東一向不過生日，這天他卻破例請了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江清、陳伯達、張春橋等多位成員到他家作客吃壽麵，毛澤東主動與大家分享他指示〈五一六通知〉的進行、廣播第一張馬列大字報與發動紅衛兵大串連的心得。[230]毛澤東顯得興高采烈，席間談笑風生，整場壽宴的話題都圍繞在階級鬥爭上，就在這天毛澤東決定破釜沉舟，把他自己發動的文化革命搞到底 ，毛決心定下「全面奪權」的大計，最後毛澤東藉著敬酒，登高一呼：「為展開全國全面內戰而乾杯！」[231] 顯然毛澤東想藉著這場壽宴對在場所有的中共中央核心幹部宣示他「全面奪權」的決心。不過這批核心幹部並沒有周恩來，因爲毛澤東這天七十三歲生日宴客的賓客名單中並沒有將周包括在內。[232]由此可見，毛澤東認爲周恩來並不是他做重大決策時必要在場的核心人士，在這場文化大革革命中周僅爲執行者。

196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罕見地首次共同發表一篇名爲〈把無產階級文化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233]目的是爲了宣傳毛澤東全面奪權的思想，這篇社論中清楚的宣示：「一九六七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

---

[228]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頁 326。

[229]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169。

[230]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323。

[23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93-696。

[232]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693。

[23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3。

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234]清楚的宣示毛澤東將對他認爲所謂的「走資派」展開全面性的攻擊。稍早，於 1966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發生王洪文（1935-1992）等人爲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總部」簡稱「工總司」，策畫臥軌的「安亭事件」爲這「一月革命」埋下了伏筆。[235]周恩來得知「安亭事件」發生後，立即指示陳伯達做兩件事，第一件是爲告知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要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擾軍是革命的行動；第二件事情爲致電給上海安亭站的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該單位的生產，更大影響全國交通，並希望這些工人立刻回到上海，將問題就地解決。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張春橋爲了處理此事也抵達上海，不過首先張卻承認了「工總司」的合法地位，隨後並聲稱「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236]雖然這舉動與周恩來先前的指示大不相同，但是事後中央文革小組與毛澤東均表態支持與批准張春橋的行動。[237]顯而易見，張春橋的種種舉動均來自於毛澤東的指示。

之後以王洪文爲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直將攻擊矛頭對準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全國第一場大規模的武鬥，將與它對立的另一個上海工人組織鬥垮，而「上海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在不宣告成立久之後立。[238]在鬥爭風氣四起的氣氛下，這時周恩來顯然還不知毛澤東下了「全面奪權」這個重大的決定，

---

[234]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67 年 1 月 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35]王年一，〈對上海 “一月革命”的幾點看法〉，收錄於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 — 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下冊，頁 789。

[236]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89。事件發生後陳伯達曾打電報給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態度明確的要工人返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數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06 年 3 月），頁 319。

[237]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89。

[23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4。

他正爲全國鐵路運輸全面緊張的問題忙得焦頭爛額[239]，在 1 月 1 日的凌晨，周恩來曾打電話指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1916-1995）：「上海一定不能亂，南北鐵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斷。」[240]殊不知這時張春橋與姚文元已經帶著毛澤東的命令前往上海，準備以上海做爲「全面奪權」的基地。1 月 4 日，張春橋與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名義回到了上海，隨即宣布上海《文匯報》造反派接管報社，隔天 1 月 5 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也宣布取得報社的領導權，[241]並在隔天刊登一篇〈告讀者書〉的文章中宣示：「這個權，我們是奪定了。」[242]同時張春橋也在「工總司」召開的會議上宣示：「基本的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243]，隨後以陳丕顯爲首的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等所有相關部門，被迫停止辦公，在張春橋的指示下，由「工總司」爲指揮部聯合交通六局與紅衛兵，奪取了上海的交通運輸大權，張春橋並讚揚造反派砸爛與奪取上海公安局的實權，並支持造反派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簡稱「文保會」，由王洪文任主委。雖然「文保會」宣稱他們的職責在於「調節各派紛爭，維持全市治安」，但事實上卻淪爲「工總司」等造反派鎮壓反對派的藉口，而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則取代原來中共上海黨政部門的職責，整個上海的實際權力全數轉移至張春橋與姚文元兩人手中。[244]

[239]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06。

[240]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 ： 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頁 117。

[241]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4。

[242]〈告讀者書〉，《解放日報》，1967 年 1 月 6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4。

[243]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5。

[244]轉引自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37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465。

這是毛澤東樂於見到的發展，毛左一言：「這個方向是好的」[245]，右一句：「要支持他們造反」[246]，並大大讚賞了在上海發生的奪權事件：「這是一個大革命，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於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247]毛澤東並在中央碰頭會上再次認可上海的奪權：「左派的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248]毛還希望全中國都能效法上海：「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249]毛澤東如此大動作的發言支持上海的奪權事件，可以說是向整個中國宣示他「全面奪權」的決心，此時周恩來也將他的焦點從全國鐵路問題轉回上海奪權事件的議題上。縱使周事先因沒有參加毛澤東的七十三歲生日壽宴而錯過了毛的重要發言，而不知毛的「全面奪權」說，然而局勢丕變，也打亂了周原來先解決上海問題的設想與安排。但是周恩來從毛澤東處理「安亭事件」與後續上海奪權的發展，周看出毛澤東的態度，故周恩來開始退卻，並更加謹言慎行，從周對上海奪權事件從善如流的回應就可一窺端倪，周恩來說：「我們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樣防止接管風。革命靠自己，每個工廠、單位，都應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組織起來，……我們號召全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全北京市的一切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農民、革命的學生、革命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幹部同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切革命同志聯合起來，響應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號召，抓革命促生

245 〈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46 〈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47 〈對《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85。

248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3。

249 〈對《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 年 1 月 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86。

產，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250]周恩來的言下之意，不僅對上海奪權事件大大表示贊同，還希望這股奪權風吹向北京，號召北京一起行動起來，周恩來還是秉持著一貫的作風，只要是毛澤東的意願，不管對錯是非，周恩來是絕對不會違逆的。

果然這股鬥爭風氣如毛澤東與周恩來所願，吹到了北京，1967 年 1 月中旬以後，北京各地也出現全面奪權的風潮。 1 月 12 日與 14 日，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公社聯合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造反派，兩次奪取人民廣播電台的主導權，並廣播了他們的〈奪權宣言〉。1 月 17 日，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的造反派在當時北京公安部長謝富智的支持下奪取了北京市公安局的主導權，隨後並發表〈重要通知〉，聲明他們的一切舉動是為了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為了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並為了維護社會治安。[251]一時之間，北京各地的奪權風氣此起彼落，面對這股不可擋的趨勢，1 月 18 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人召開坐談會，並在會議中表示支持學生參加奪權行動，周恩來肯定學生的作為：「我們一定要奪權！要奪到底！……關鍵的問題是奪權，……北京是一個市，是首都，今晚已有三十多個單位的造反派去奪權了，進駐了市委大樓，祝賀他們奪權的勝利。這只是開始。……北京市範圍很廣，奪權鬥爭不能一下子解決。首先要吸收廠、礦職工參加全市的職工的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大專院校，特別是綜合大學象北大、清華等對北京市的奪權鬥爭應多負一些責任。……工廠、農村、機關的造反派要進一步擴大，這是第一步，奪權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奪權問題對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解放軍也是一個新課程。我們要向你們學習，這事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上有毛主席，下有群眾，兩頭結合，我們結合你們。」[252]不

---

[250] 〈周恩來陳伯達在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團體“抓革命促生產”大會上的講話〉(1967 年 1 月 1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51]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392-393。

[252] 〈中央首長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 年 1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

過另一方面，周恩來還是認爲奪權行動應該是一種政治行動，奪權之後還是要保持各部會的正常運作。葉劍英（1897-1986）等老帥就在周恩來的支持下，由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這篇通知內容強調，軍隊負擔戰鬥與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與任何組織衝擊中共解放軍。[253]當然，這個通知的內容係出自毛澤東的同意[254]。然而文革之火卻越演越烈，相對於大動作肯定學生奪權的作法，周恩來此舉不過是杯水車薪，不過周恩來也可能早就預測到這種結果。周恩來就曾針對這個問題說道:「在中央工作會議時我說方興未艾，主席說不能夠剎車，一個多月後運動必有發展。現在勢不可擋，要因勢利導，要導要疏，不要堵，不要擋。實際上已從學校發展到社會，破四舊，立四新；從大中院校發展到小學校，從小學校發展到工廠，學生到工廠同情被壓抑的群眾，也很快就發展到農村，中間還有一個商業。現在形勢已看得出來了，工廠、學校、農村、商業、服務行業、機關、甚至影響到軍隊。機關會從主要領導機關，由上而下發展到各種專業性的機關。正如林總說的，運動正在向著廣度深度發展。勢不可擋，怎麼能擋得住！伯達同志說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擋。」[255]，周早在奪權風漫延前就闡明了他的想法，面對這股趨勢，不能堵，更不能擋。若說文革之中毛澤東是躁動的皇帝，那周恩來就是執行的輔臣，是內政外交的大管家，而換個說法，如果說毛是文革的罪魁禍首，那周就應該是文革的從犯，怎能如中共官方所說，周算忍辱負重呢？

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5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3。

[254]〈關於中央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稿等三文件的批語〉（1967 年 1 月 12 日、13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190-191。

[255]〈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1966 年 12 月 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第三章 文革中周恩來的自處之道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確實是保護了不少黨內外人士，不過他總是做得小心謹慎，然而更多時候周恩來是看著毛澤東臉色行事，例如周恩來為了取得毛澤東的同意保護黨內幹部的名單上就很少包括劉少奇、彭真等人馬，另一方面周也必須兼顧江青、林彪等人的態度，周恩來煞費苦心，總希望找到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場來做事。[256]雖然有人指出周恩來「明哲保身、處世精明」[257]，但也有不少人說他是「明哲保身，勇氣不足」[258]，因此在所謂「大樹參天護英華」[259]的背後，周也幹了許多不光彩的事情，簽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因此周恩來對文革中不少冤案與錯案都逃脫不了干係，其中有些案件，周更須負起重大的責任。[260]

陳伯達更指出是周恩來幫毛澤東一手建立起中央文革小組，[261]在中共的內部檔案中就有提到：「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就中央文革小組的名單討論時，提議：江青擔任副組長，第一組副組長。」[262]也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推薦林彪為副統帥，毛澤東的接班人。由此可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都是周恩来幫忙搭建的。[263]周恩來對此也非常自豪，常在許多公開場合提到。例如，1967 年 1 月 21 日，周恩來接見軍事院校的學生就談到：「在十一中全會上，我推薦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學活用毛澤

[25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2-183。

[257]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258]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

[259]許多經過文革劫後餘生的人，對周恩來心存感激，寫了取多緬懷周的文章，稱他是「大樹參天護英華」，琴九鳳，〈嘔心瀝血披肝膽 大樹参天護英華–周恩來“文革”期間對政協等人員的保護〉，《黨史文天地》，期 10（2009 年），頁 33。

[26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2。

[261]陳曉農，《陳伯達遺稿》（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 年），頁 79 。

[262]轉引自羅冰，〈官方秘密檔案披露：周恩來參與批鬥劉少奇〉，《爭鳴》（1999 年），期 3，頁 20。

[263]宋永毅，〈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頁 352。

東思想，跟毛主席跟的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他將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264]因此，周恩來與文革的發起可說是關係深厚。

第一節　奪權鬥爭蔓延全國

周恩來對許多被毛澤東與江青點名批判的老同志，內心不無同情，但是周一如往常十分注意政治上的分寸，絕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節上做點文章，或者始保終棄，而更多時候周恩來是看著毛澤東的臉色做事的。例如，當周恩來面對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王光美去清華接受檢查的事件，周雖表示不同意，不過那也是因爲周恩來兩次請示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同意，周恩來也才表態，[265]後來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又設下圈套，假造王光美女兒被壓斷腿的假象，將王光美騙至醫院並進一步扣押她，[266]雖然周恩來第一時間下令放人，並要求秘書連夜趕往清華要求造反派放人，[267]不過這一切也都是因毛澤東與政治局都同意這個做法。[268]而戎馬一生的賀龍（1896-1969）此時也被造反派窮追猛打，他們到處散布攻擊賀龍的言論，並批評他不宣傳毛澤東思想，[269]面對造反派來勢洶洶的批評，賀龍曾到周恩來的住處西花聽求救，周才讓賀龍暫時住下，[270]以避開那些對

---

[264]〈周恩來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來京串連的部分軍事院校同志時的講話（1967.1.21）〉，收錄於武漢造反派編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第三卷，頁 191。

[265]〈周恩來在全國財貿系統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12 月 3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904-1905。

[266]〈周恩來談清華大學“一·六”抓王光美事件〉(1967 年 1 月 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67]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905。

[268]〈周恩來談清華大學“一·六”抓王光美事件〉(1967 年 1 月 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頁 1905。

[269]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4。

[270]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 月)，頁 787。

賀龍窮追不捨的造反派，周恩來曾對賀龍說：「毛主席是保你的，我是保你的。」[271]周恩來並多次告訴這些造反派，他不同意他們批鬥賀龍的做法，周恩來並宣稱：「這是中央的決定」，[272]這個來自中央的決定，顯而易見就是毛澤東的決定，因爲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周恩來是不敢做保人的舉動。

剛開始在賀龍問題上，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態度都是採取保護的做法，而且賀龍原本也並不在毛澤東發文革欲打倒的名單中，但是自從羅瑞卿被打倒，林彪在軍隊的勢力壯大之後，在軍隊擁有高威望的賀龍就成爲林彪下一個翦除的對象，[273]林彪到處指責賀龍在背後議論他的歷史有問題，並質疑他不宣傳毛澤東的思想，[274]林彪批評賀龍不遺餘力，他指稱賀龍：「到處奪權」、「是個大陰謀」、「四十年來靈魂深處是個大野心家」、「賀龍是反對毛主席的」，[275]並指控賀龍在軍隊各單位：「到處伸手」[276]，江青也與林彪唱和指出賀龍：「是個壞人」、「搞陰謀」[277]。毛澤東曾試圖調解林、賀兩人之間的紛爭，但是卻沒有成功，於是毛澤東開始思考要在兩人之間做取捨。[278]周恩來也試圖緩和這樣緊張的氣氛，在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公開活動中，周恩來特意將賀龍安排與毛澤東同坐在第一輛檢閱車中，不過周恩來此舉並沒有幫上忙，不但遭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279]也無法阻止愈來愈猛烈批判賀龍的聲勢。這時周恩來也看出這整件事情是林彪在背後支持，周恩來也不願意得罪當時身爲中共副主席的林彪，[280]因此周恩來保賀龍的態度開始

[27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4。

[27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4-115。

[27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6。

[27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4。

[275]李烈主編，《賀龍年譜》，頁 787。

[276]李烈主編，《賀龍年譜》，頁 787。

[277]李烈主編，《賀龍年譜》，頁 787。

[27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7。

[279]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08。

[28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8。

軟化，周恩來不再事事護著賀龍，周指出：「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貫正確的，這當然是不對的。」[281]周恩來的言下之意爲，賀龍雖然跟隨著毛的腳步，但是這不一定代表賀的所做所爲都是正確的，周並指出賀龍在歷史上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犯了嚴重錯誤。」[282]周恩來最後更下了一個結論：「賀龍不是一貫正確的」[283]，後來在毛澤東同意下，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賀龍專案小組正式成立，[284]毛澤東並親自決策要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交由周恩來落實執行，於是周恩來親赴賀龍住處的要求賀繳械，並指示警衛將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賀龍夫婦從此失去自由，[285]這也正式宣告賀龍終被打倒的命運。周恩來也因知道毛澤東從「保」變爲「倒」賀龍後，才在公開場合上對賀下了數百字的批語，[286]沒說一句好話。

1967年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碰頭會，但在會議中葉劍英（1897-1986）、徐向前（1901-1990）等老帥卻站出來批評中央文革的成員，葉劍英責問陳伯達：「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

[281]〈周恩來接見國家体委“鬥賀（龍）聯絡站”代表談賀龍的歷史問題〉(1967年8月1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82]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賀龍的歷史問題：「南昌暴動的大方向是對的，但沒有就地發動農民，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大方向對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錯誤。一是城市觀點，還想回廣東，攻打大城市，先打廣州，後打汕頭；另外依靠外援，請蘇聯幫助，這兩點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犯了嚴重錯誤。」。參見〈周恩來接見國家体委“鬥賀（龍）聯絡站”代表談賀龍的歷史問題〉(1967年8月1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83] 〈周恩來接見國家体委“鬥賀（龍）聯絡站”代表談賀龍的歷史問題〉(1967年8月1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284]李烈主編，《賀龍年譜》，頁791。

[285]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637。

[286] 周恩來在發言中批評賀龍帶部隊攻打長沙，失敗後逃跑了，是在在湘西執行了立三路線，犯賀錯誤。周並指出賀主張肅反擴大化也是不正確的，並指責賀龍在這個問題不負責任，把責任推給他人。〈周恩來接見國家体委“鬥賀（龍）聯絡站”代表談賀龍的歷史問題〉(1967年8月1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幹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287]徐向前更是情緒激動大拍桌子出聲斥責：「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288]這類的人來指揮嗎？」[289]這樣火爆的氣氛延燒至2月16日的中共中央碰頭會議，會議開始前譚震林就向張春橋責問爲什麼不讓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到北京來，張春橋回答說，我們回去跟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1902-1983）非常的氣憤說：

>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290]

這場會議原訂的議題是「抓革命，促生產」，但在在懷仁堂內，譚震林、陳毅（1901-1972）、葉劍英、李念先、余秋理等老將們依然忿忿難平，拍案而起，對中央文革小組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鬥爭許多老幹部的做法非常不以爲然，譚震林首先發難指責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你們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幹部。」[291]余秋理緊接著拍桌子高聲發言：「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292]而李念先更是情緒激動的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287]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頁 18。

[288]蒯大富為當時清華大學造反派領袖。

[289]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454。

[290] 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2月16日懷仁堂會議〉，1967年2月16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81。

[29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25。

[29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26。

[293]陳毅更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林彪：「史達林搞出了一個赫魯雪夫，以後又怎樣？延安整風搞出一個劉少奇，現在又怎樣了？」[294]陳毅此番發言不僅批評林彪這位現任的接班人，也連帶批評指定林彪當接班人的毛澤東，[295]周恩來眼看情勢不對，陳毅竟批評起延安整風了，隨即插話指出：「對於延安整風要肯定」[296]，周恩來反應非常快速的滅火舉動，在王力看來是處理得得體的。[297]不過周恩來的滅火舉動顯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陳毅又發表了一段激動的談話：

> 這些傢伙上臺，就是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過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裡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雪夫，他一上臺不是搞修正主義嗎？[298]

這時，周恩來隨即打斷陳毅說：「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劉鄧！」[299]後來譚震林還是愈說愈激動，氣憤至極點最後拂袖而去，譚震林甚至寫信給林彪抱怨此事，[300]林彪馬上將這封信轉送給毛澤東，並批評譚震林思想糊塗，[301]這場軍隊

---

[29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27。

[294]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8。

[295]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8。

[296]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9。

[297]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9。

[298]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第一冊，頁 184。

[299]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第一冊，頁 185。

[300]譚震林在信中寫道：「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根本不做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幹部幾乎都挨了鬥，帶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對不自殺，也不叛國，但絕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01]〈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

老幹部與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抗爭，史上稱為「大鬧懷仁堂」事件，後被稱為「二月逆流」。

周恩來也知道這些老帥說的是實情，事實上周恩來也認同老帥們的說法，周恩來也曾批評造反派的做法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302]，周並為老幹部們說話：「老幹部是黨的財富呀！……對老幹部鬥得要文明一點嘛。……對老幹部，不能都是用敵視的眼光看待呀！」[303]但是為了避免激怒毛澤東，周在整場懷仁堂的會議上不敢說，也不好說，只能在兩方人馬中居中協調。[304]從 2 月初周恩來就警告這些副總理、老帥們不要出格，以免惹禍上身進而牽涉到自己，但是現在陳毅竟然在如此眾多人面前如此放炮，周恩來自然急於擺脫干係。因此，周選擇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於是毛澤東指示汪東興趕到現場了解狀況，雖然汪趕來時高潮已經過去，但散會後，周恩來親自向汪東興介紹了會議情況，再由汪東興向毛澤東作彙報。[305]也難怪吳法憲認為周恩來：「在政治上是很老練的」[306]。

後來，周恩來甚至有意和這些大聲斥責文革的老將們畫清界限，當譚震林憤怒情緒漲至高點準備拂袖離去時，周恩來一改在會議上一直保持沉默的常態，拍桌子大聲叫譚震林回來，周恩來並指出譚的這個做法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因此他無法含糊以對。[307]原本在會議紀錄中，並沒有記錄周恩來拍桌子這一幕，是周

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02]〈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03]〈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各部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1967 年 2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0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58。

[305]曾濤〈正義的抗爭——所謂“二月逆流”的前前後後〉，收錄於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 —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下冊，頁 819。

[30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頁 658。

[3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9。

恩來之後修改會議紀錄時親筆加進去的。[308]而當陳毅提及周恩來曾在延安整風中挨整時，周恩來除了加上自己當時的對答：「應該檢討，整的對嘛！」[309]除此之外周還特別註明：「陳老先挑撥康老後挑撥周。」[310]顯然周恩來急於撇清自己跟這些老帥的關係，免得被毛澤東或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人誤會爲這些反文革老帥的同路人。接下來，老帥們大鬧懷仁堂的舉動激怒了毛澤東。尤其當毛澤東聽到陳毅批評的那一段話，馬上變臉，[311]毛大發脾氣指出：「我馬上走，林彪也走！江青槍斃！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找上余秋里，在找上薄一波、安子文這些叛徒當組員。力量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312]，周恩來眼看毛澤東大發雷霆，只好在一旁陪不是。周恩來自我檢討他沒有做好會議上的掌握工作，毛澤東雖然因爲周恩來的自我檢討暫時消氣，[313]但事後毛澤東依然怒氣沖沖的對葉群說道：「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念先他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眾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跟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314]毛澤東更嚴厲的批評這些老帥們：「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的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要否定

---

[308]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1-202。

[309] 周恩來對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修改手跡。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0。

[310] 周恩來對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修改手跡。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0。

[31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0。

[312]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3。

[313]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3。

[314]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58-659。

文化大革命”，辦不到。」[315]毛並要葉群轉告林彪:「他的地位不穩，有人要奪他的權哩。」[316]毛澤東並直接點名批判譚震林說:「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的路綫上說話呢？」、「你不該跟我革命、你可以退黨嘛！」[317]之後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懷仁堂召開會議對這些老帥副總理們進行批判[318]，毛澤東並支持陳毅的部分要由周恩來親自做，並親自談話。[319]自 1967 年 2 月 25 日自 3 月 18 日，總共在懷仁堂召開了 7 次「政治生活批評會」，這幾次會議毛澤東均指派周恩來親自主持，[320]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會議中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對這些老幹部們猛力批判，有鑑於此，在政治上異常老練的周恩來見狀在會議中率先發難，搶先自我批評一番，[321]周恩來並說明他對有些同志因爲一時衝動而脫離軌道的行爲，他是沒有也不能支持的，[322]希望藉此能洗清反文革的嫌疑，王力在整理會議紀錄時原本沒有將陳毅關於赫魯雪夫這段談話寫在會議紀錄上，是周恩來看了之後覺得應該據實以報，才吩咐王力在加上去，[323]毛澤東事後也才有機會得知陳毅的這番談話。最後這些老幹部被安上「資產階級復

[315]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59-660。

[31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60。

[31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60。

[318]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26。

[31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3。

[32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26。

[321]熊蕾，〈「九一三」事件前後的毛澤東〉，收錄於熊華源、安建設編，《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1月），頁82；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5，頁195；周恩來在會議上主動承擔了自己監督，幫助得不夠的責任，希望在盧山會議上犯有錯誤的同志，能夠聯繫實際，搞好自我教育。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52。

[322]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6。

[323]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8。

辟逆流」的罪名，後來被打爲「二月逆流」。[324]周恩來沒有支持他在國務院和解放軍的戰友們，這一點意味深長，其中有些人和他相處了四十年之久，在這些老帥提出的基本問題上，周同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325]對於周恩來不堅決的態度，甚至在中國內部都有一些批評。[326]儘管一般來說，周的公開形象是完美無瑕的，人們只能猜測，如果這位深得毛澤東倚重的總理能利用難得的老帥們團結一心的機會，和幾位元帥、副總理齊心協力，向主席提出一套建議以解決文革造成的恐怖和混亂，那會對毛造成多大的影響，然而，周恩來沒有冒險一試。[327]

毛澤東原本就有意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地位，[328]而在「二月逆流」之後，江青仗著有毛澤東在背後撐腰，公開向周恩來大聲宣示，要求周恩來以後要以對待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態度，等同對待中央文革小組。[329]江青的言下之意，不僅是要周恩來示威，也頗有向周恩來奪權的意味，周恩來當然知道江青背後的支持者是毛澤東，也了解毛澤東有意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地位，因此周恩來不敢激怒背後有毛澤東頂著的江青，得罪了江青就等同冒犯了毛澤東，於是周恩來只好說：「我以後只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330]，希望江青不要再一直把矛頭指向他，但是江青與張春橋顯然覺得周恩來退讓得還不夠，聯手在各場合中一再得提出這個問題針對周恩來，逼得周恩來只好對江青

---

[32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30。

[325]王年一，《1949—1989 大動亂的年代》，頁 211-215。

[326]有人批評周恩來的許多作為是保持晚節的心態所致，由此，周恩來只扮演「從惡」與「幫兇」的角色。周延，〈和大鬧懷仁堂的戰友們〉，收錄於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39-41；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854。

[327]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05。

[328] 1967 年 2 月初，毛澤東在一個很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書記處」。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72。

[32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4。

[330]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4。

等人說：「以後你們做決定，我給你們辦事。」[331]甚至有一次在中共中央文革得碰頭會議上，江青大發雷霆得指著周恩來說：「你周恩來，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對你沒有什麼好怕的。你周恩來比我強的，只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則、大方向不行的。」[332]面對江青的來勢洶洶周恩來只得放低身段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333]江青見周如是回應才語氣緩和的說：「我們兩人配合起來處理問題，就是完人了。」[334]康生見狀也在旁敲邊鼓說：「希望周恩來同志多尊重江青同事的意見，你們兩個人密切合作，就成中央同會議的領導核心，可以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事領會毛主席的意圖是很快的。」[335]周恩來自知敵不過江青康生二人聯手抨擊只好點頭稱是，周雖然知道江青是狐假虎威，但是依然對江唯唯諾諾不敢犯顏，因此江青就越來越囂張。[336]周恩來此番退讓徹底的發言，雖然依照《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的說法，周恩來只是「為保晚節、逆來順受」[337]，然而事實上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爲周恩來向來不敢違逆毛澤東的任何意願。也因如此，「二月逆流」之後，也因周恩來對江清的退讓，自此之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正式取代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地位。不過，周恩來對毛的態度，在林彪眼中，充其量也不過是個「唯唯諾諾，畢恭畢敬，為命是從的老當差。」[338]例如，毛澤東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前，周事先向毛說明行車路線，周恩來跪在攤開的地圖前爲毛指點方向，毛則站在一旁吸著紙煙，一邊聽周的解說。[339]在一旁目睹一切的李

---

[331]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84。

[332]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0-681。

[33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33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335]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33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33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2。

[338]根據李志綏的回憶，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恩來：「像個老當差的，不管是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為命是從。」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90 。

[339]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90-491 。

志綏心裡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毛的態度帶著一思嘲諷，似乎在享受這一切。毛的專制集權在毛與周得君臣關係上表露無遺。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辦，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為周過於忠心，毛完全沒有將周放在眼理，毛不認為周有攫取權力得野心，所以周能夠被打而不倒。」[340]周恩來的「老當差」行徑還有一事可證明，毛澤東在 1966 年 7 月 8 日寫給江青的那封信，信中對林彪有所批評，也是周恩來奉毛的命令，拿給林彪看的，[341]顯示周恩來對毛澤東的指示，總是「畢恭畢敬，爲命是從」。

1967 年 5 月，南開大學的造反派在翻查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由國民黨爲造的〈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啓事〉，隨即將這個訊息轉告江青，於是江青隨即寫了一封信告知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信件中指出這些南開大學的學生，直接找上她，因爲在他們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伍豪就是周恩來，由於他們覺得事態嚴重，才趕緊通知她。[342]根據王力的說法江青翻出此事的舉動顯然透露出她依然不肯放過周恩來的訊息，仍將鬥爭的矛頭對準周。[343]而周恩來當然不願意被這股當時盛行「揪叛徒」的風潮掃到，馬上發表聲明：「伍豪等脫離共黨啟示，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人已在中央蘇區。」[344]但是若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江青對於周恩來是不會鬆手的。江青在收到有關「伍豪事件」的相關資料之後，致信林彪、周恩來、康生是完全符合中共的組織程。[345]因此這件事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毛澤東，因爲周恩來深深知道要是毛澤東決定要整一個人，那個人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全身而退，

[34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91 。

[34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7。

[34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54。

[34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27。

[34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54。

[345]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2009 年 3 月)，頁 2。

好在毛澤東當時並不想整周恩來，因爲當「伍豪事件」的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裡時，毛一看就說：「我早已經知道，那是假的，沒有用處。」[346]而且毛也認爲：「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衊。」[347]再說直到 1972 年 12 月份，江青和周恩來的合作遠遠大於衝突。特別是在整治「五一六份子」[348]上，周恩來和江青合作得非常好，因此「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來自己的心病。[349]在 1972 年 6 月 23 日，周恩來做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啓事"真相〉的報告後，周恩來再次強調這整個事件：「都是國民黨的陰謀。」[350]而會後本應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要把這個報告的錄音、文字記錄稿及其它有關文獻資料存人中央檔案館，一併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和各大軍區黨委存檔。[351]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沒有簽字同意將這些記錄存檔，而且周恩來如果不簽字，這個報告就印發不出來。[352]

「伍豪事件」成爲周恩來晚年最罣礙的一件事，事實是清楚的，這整件事情是周自己耽擱的，周恩來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爲自己頭上的「緊箍咒」的，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並不是想讓周恩來澄清事實，整個處理「伍豪事件」的過程完全是一種對周恩來的敲打，告訴全黨，周恩來歷史上不那麼乾淨。既然如此，又何

---

[34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14。

[347]〈對北京大學一學生反映"伍豪啟事"來信批語〉(1968 年 1 月 16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465。

[348] 1967 年 5 月以後，北京出現一股反對周恩來的風氣，一個叫做「五一六兵團」的組織公開貼出砲打周恩來的大字報。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19。

[349]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2。

[35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31。

[35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531。

[3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主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473。

必去簽字難爲毛澤東呢？[353]由此可知，周恩來明知道毛澤東拿一個「緊箍咒」往自己頭上套，卻絲毫不敢反抗。直到 1975 年 9 月 20 日，周恩來要進行大的手術治療。由於周恩來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來，在痳醉藥都打了的情況下，他叫工作人員讓把此〈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啓事”真相〉報告的錄音稿儘快送到醫院來，並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註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354]周簽好之後如釋重負地說：「我簽了字，就算是辦完了這件事。」[355]在臨進手術室前周恩來並用盡力氣大聲叫：「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356]不過周恩來擔心他的這次的吶喊沒有訴諸於文字，讓他覺得非常不放心，深怕毛澤東沒有聽到這些話，於是請鄧穎超幫他代筆簽名，留下文字稿好向毛澤東報告。[357]綜觀這整件事情，周一直等到自己病入膏肓才考慮簽字，也由於不知自己是否挺得過這次的手術，才決定辦完此事。[358]周此舉也是希望毛澤東能放過已經病入膏肓的他一馬。[359]而面對這次手術，周恩來心中在意的，不是是否能挺得過去這個未知數，周更希望的是毛澤東能夠瞭解他的苦衷，高抬貴手。[360]

第二節　周恩來與武漢「七二〇事件」

[353]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3。

[35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721；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 9 月），頁 245。

[355]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3。

[356]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721。

[3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主編，《話說周恩來》，頁 474。

[358]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頁 245。

[359]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3。

[360]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頁 3。

一九六七年這個夏天，因爲軍隊的「支左」問題，全中國很快陷入毛澤東所謂的「全面內戰」，依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份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不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外交部就是鬧得一蹋糊塗……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361]在這全國性的大混戰中，武漢發生的抗爭可說是異常的嚴重，武漢地區的群眾，分裂成兩大派。其中一派是號稱有一百二十萬人的「百萬雄師」，另一派則是被稱爲「三鋼」的造反組織，兩派互相對立，造成許多嚴重的衝突，雖著混亂升級，當時由中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1909-1993）與政委鍾漢華（1909-1987）領導的解放軍控制了銀行、監獄、糧倉以及一些重要的基本設施。表面上軍隊是在執行毛澤東「支持左派」[362]的任務，但是關鍵的問題是，誰是「左派」？究竟應該支持誰？而誰又是該被鎮壓的人？[363]關於這個問題，陳再道與鍾漢華二人曾經在 2 月份的時候到北京參加軍委會議，陳還特別記錄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建議，毛告訴解放軍的領袖要通情達理，在造反行動面前要退讓一點，如果不行的話，就來硬一點的辦法，追究攻擊軍事機關壞份子。[364]毛的這個建議讓局面更加混亂，雖然毛澤東認爲 8、9 兩個月才到達天下大亂的程度。但事實上那時早就已經天下大亂，只是 8、9 兩個月的局勢已經到了毛澤東也駕馭不了的程度。[365]於是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馬，到兩派鬥爭

---

[361]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錄〉(1970 年 12 月 18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163。

[362] 毛澤東各軍區的黨委說：「首要的是從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經驗」。〈中共中央批發鐵道兵黨委轉發渡口駐軍支左聯合指揮部關於“首要的是從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經驗〉，(1967 年 3 月 8 日)，〔中發〔67〕84 號〕，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6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682；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212；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林彪事件新探〉，頁187-188。

[364]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12。

[36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58。

最嚴重的武漢地區親自解決紛爭，並希望能爲全中國樹立起解決這次兩派鬥爭的模範方法。毛澤東告訴周恩來他要去南方走一走，去武漢游泳渡長江。[366]雖然毛名義上說要游泳，但是實際上他是想要親自就地解決武漢問題。[367]因此周恩來便打電話到武漢軍區，告訴原本要到北京來的武漢群眾組織代表不用來了，就在武漢當地解決問題。[368]由於擔心武漢地區局勢混亂無法控制，爲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還特意先期來到武漢，住在東湖賓館的百花一號，爲毛澤東的到來做準備。[369]當然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先行到武漢去最主要的目的是爲了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爲了防止出現任何問題，還將賓館所有的人手全數撤換，原來賓館的人員是屬於「百萬雄師」，後來換成另一派。[370]另外，周恩來也不讓陳再道負責毛澤東的安全，而是改由武漢軍區空軍政委劉豐來負責。[371]爲了維護毛澤東的安全，心思縝密的周恩來可說是事事周道，絲毫不敢懈怠。

1967 年 7 月 14 日毛澤東在南巡的過程中，帶領楊成武（1914-2004）、汪東興（1916-）、李作鵬（1914-2009）等人抵達武漢，住在東湖賓館梅嶺一號，毛到達武漢之後，隨即聽取了關於湖北與武漢地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匯報，毛武斷地認爲「百萬雄師」是個保守組織，而「三鋼」、「三新」則是革命造反派，武漢軍區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由於毛澤東的話沒有人敢違逆，一句話就決定了武漢地區兩大群眾組織和武漢軍區領導人的命運。對於毛澤東的這個意見，周恩來一如往常只能照辦。[372]毛澤東並指示王力與謝富治（1909-1972）兩人上街去看看大字報，了解一下情況，並聽聽群眾的意見。[373]由

---

[366]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68。

[367]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4。

[368]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69。

[369]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370]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4-1005。

[371]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5。

[372]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3。

[373]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於武漢局勢異常的混亂，周恩來曾要王、謝兩人暫時不要公開露面，四處活動，因爲支一派（支持少數的激進派）與壓一派（壓多數派的「百萬雄師」）可能會加劇兩派群眾對立的情緒，但是兩人並沒有聽進周恩來的建議。[374]不過事後王力卻指責是因謝富治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報，才闖下大禍。[375]後來王謝二人他們的行蹤很快就被造反派發現了，於是造反派組織大規模的遊行歡迎王力與謝富治兩人到武漢解決問題。[376]毛澤東接連下達指示，要給「三鋼」、「三新」平反的機會，[377]周恩來也指出：「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378]由於周恩來的部署完全是經過毛澤東的同意，[379]因此周恩來此番談話等於是在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由於毛澤東認爲「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於是要王力與謝富治派專人協助做好他們的工作，[380]並對陳再道喊話：「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陳再道如果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會轉過來擁護陳再道。」[381]毛並要求周恩來在武漢多住幾天，全力做好武漢的軍區工作，[382]於是周恩來依照毛澤東的意思建議陳再道與鍾漢華主動承認支左犯了方向路綫錯誤：「軍區支左有錯誤，責任由軍區主要領導同志來承擔。」[383]，周並告訴他們只要先承認錯誤，是會保他們的：「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因此犯了錯誤，錯了就檢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們承認錯誤，寫檢討，是為了保護你們，不是為了打倒你們。」[384]周恩來並告知陳、鍾來武漢之前毛澤東曾對

[374]王年一，《1949—1989 大動亂的年代》，頁 261。

[375]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5。

[37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37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378]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6。

[37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6。

[38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381]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382]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

[38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70。

[384]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638。

他說：「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385]試圖安撫陳、鍾二人，並要他們放心，不要再有顧慮。[386]

後來周恩來回到北京召開中央碰頭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決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發出一個文件，指出武漢軍區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綫錯誤」，主要責任應該由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鍾漢華來負責，並要求陳、鍾二人力及支持「三鋼」、「三新」並且要軍區各總部和個軍、兵種公開表態，像支持上海軍區委員「工總司」和王洪文一樣，支持武漢的造反派。[387]另一方面，造反派組織大規模的遊行歡迎王力與謝富治兩人到武漢解決問題的舉動，引起「百萬雄師」極大反感，[388]原本周恩來還認爲王力與謝富治引起造反派的注意，正好可以掩蓋毛澤東到武漢的事時，以保護毛澤東的安全。[389]由於人們不知道毛澤東與周恩來就在武漢，謝富治和王力到處都被看作是中央的派來的欽差大使，雖然謝富治的職位更高，但是在公眾的心中，王力才是主要的仲裁者，再加上造反派喜氣洋洋的將問題解決的訊息傳播全城，謝、王兩人因爲促成此事而受到造反派支持，但是卻受到另一派別的指責。[390]局勢演變至此，陳再道與鍾漢華被迫作檢討。而謝富治卻在同一個會議中要求武漢軍區要作「一百八十度大轉彎」[391]王力甚至把在場的軍事幹部稱呼爲「小學生」[392]，讓現場聆聽的

[385]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38。

[386]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38。

[38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4-685。

[38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62。

[38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5。

[390]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20。

[391] 謝富治在發言中指出：「三新、二司大方向沒有錯，揪武老譚（指陳再道）是把矛頭對當權派，是對的，有 缺點是不可避免的，你們怎能抓住一些缺點打擊革命小將呢？你們要 180 度大轉彎，不扭轉，你們自己考慮。」（當時謝發了脾氣，眼睛一瞪）。〈謝富治王力在武漢軍區師級幹部會議上的指示〉（1967 年 7 月 19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392]王力在發言中指出：「看來你們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了解。因此，我只好像給小學生上課一

武漢高級將領們聽得七竅生煙。[393]而謝富治、王力二人的這場講話，對於已經劍拔弩張的武漢局勢來說，無異成爲「七二〇事件」即「武漢事件」的導火線。[394]

隨著情勢越演越烈，從 7 月 19 日開始，聲討王力的大字報貼滿武漢的街頭，[395]「百萬雄師」一部分的人甚至乘坐數十輛的大卡車衝進軍區大願，質問軍區，王力憑什麼把擁有一百二十萬人的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群眾組織打成「保守組織」？[396]「百萬雄師」並質問陳再道和鍾漢華：「軍隊“支左”大方向明明沒有錯，陳再道、鍾漢華為什麼要當“投降派”？承認犯了方向路綫錯誤？」[397]7 月 20 日凌晨，「百萬雄師」兩千多人頭戴安全帽，手直長矛，分乘二十七輛卡車和八輛消防車，來到武漢軍區大院，並高呼「解散工總司，鎮壓反革命」的口號，現場指揮者並對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武漢的記者說道，他們要當面向謝富治、王力質問，「百萬雄師」是不是革命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等問題，「百萬雄師」並聲稱，如果不答復上述的問題，明天將會發動全市大罷工，[398]後來王力被群眾擄走，[399]他們要王力承認「百萬雄師」是革命群眾組織，但是王力當然不敢違背毛澤東的決定，只敢承認「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400]毛澤東這時下令要陳再道與謝富治要將王力接出來，[401]但是無法成功，陳再道還因此被誤認爲是王力而遭到群眾打傷。[402]由於局勢一片混亂，不僅毛澤東下的命令無

樣，從第一年級的第一課講起……」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5。

[393]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20。

[394]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29。

[39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62。

[39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62。

[397]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7。

[39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262。

[399]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9。

[400]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8-1009。

[401]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9。

[402]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8-1009；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8。

用，毛的住所更已經擠滿塵擠的人群，決定揪鬥王力。[403]這時，周恩來見狀馬上趕回武漢，周用盡最大的力氣保護毛澤東，並執行毛澤東離開武漢前最後的命令一救出王力，雖然毛澤東因為被迫離開武漢而感到非常的惱火，而且毛澤東還在周恩來的親自部署中，由「後門」離開賓館前往機場，這是毛成為中共國家領袖之後從未發生過的事，這一次他不僅被迫離開，毛澤東還因此打破他不坐飛機的慣例，以求盡速離開武漢。[404]周恩來在保護毛澤東上可說是盡了最大的功勞，[405]然而在周越盡力保護毛的背後，卻益發凸顯出毛無法控制失控的群眾而倉皇離開武漢的事實。

毛澤東離開武漢後，將「七二〇事件」武漢事件定性為：「不過是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方針的模式」[406]，但是毛澤東對形式上的錯估不僅無益於局勢的發展，對於整個混亂的局勢無異是火上加油。比起掛心武漢的局勢，毛澤東更在意原訂的長江游泳計畫無法成行，[407]毛認為此舉有傷尊嚴，堂堂的中共最高領袖，如今被迫秘密出走。[408]毛澤東離開武漢之後不久，由林彪出面主持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會議，會議上，林彪將「七二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409]而中央文革小組也準備要召開一個批鬥陳再道等人的會議，[410]陳再道等人也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入住西京賓館，並慎防文革小組的人把人搶走，周並交代

[403]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9。

[404]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10。

[405]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9。

[406]毛澤東對武漢事件做出分析：「不是什麼“兵諫”，不是什麼“反革命事變”，不是什麼住到“賊窩”裏去了，不過是以王力作為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方針的模式。」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09。

[407] 毛澤東在離開武漢前，對前來護送他離開的邱會作說：「為什麼要從武漢轉移？想到長江去游泳，現在也游不成了……」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頁 649。

[408]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21。

[409]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72。

[41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0。

現場人員要好好保護陳再道與鍾漢華兩人，[411]陳、中二人的安全雖然暫時無虞，但是卻形同軟禁，[412]在舉行批判陳再道會議之前，周恩來事先召開一個預備會議，[413]周在這個會議上要求大家：「大家不要心軟，要狠狠的揭發批判。」[414]由於周恩來此番的發言無異鼓舞大家盡情的批判，於是江青率先發難：「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415]陳伯達也附和說：「這不是一個一般的會議，而是一場保護毛主席的鬥爭。」[416]周恩來也曾在批判會議的前一天在一個公開場合談論此事：「武漢是另一種形式，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417]由於周恩來暗指陳再道領導的武漢軍區支持「百萬雄師」群眾運動所造成的「七二〇事件」危害毛澤東的人身安全，再加上周恩來鼓勵中央文革小組盡情批判的緣故，陳再道的罪名被上綱成反文化大革命。1967 年 7 月 26 日批判陳再道等人會議正式開始的那一天，周恩來要求大家開始批判陳再道與鍾漢華，於是江青和楊成武（1914-2004）手持《毛語錄》衝到二人的面前質問他們，為何要趕走毛澤東？為什麼要搞「七二〇事件」？在這個責問過程中，還有人趁亂打了陳再道，吳法憲則是為了群眾包圍機場，可能會讓周恩來的座機無法順利降落這件事責怪陳再道，因此打了陳一巴掌，吳法憲打人的舉動雖然馬上被周恩來制止，不過周恩來只是幫陳再道制止吳法憲打人的舉動，但周卻沒有幫陳再道說話。[418]整場會

[411]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72。

[412]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23。

[413]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0。

[414]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0。

[415]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0。

[416]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0。

[417] 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聽說在河南某一個分區（我不點名）支持保守派，開上吊車把樓都砸了，簡直不像解放軍。毛主席相信解放軍，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有崇高的威信，咱們能支持保守派下這樣的毒手嗎？保守派群眾是受蒙蔽的，壞人只是一小撮，用吊車把房子都弄壞，打傷很多人，這樣的事情比武漢更厲害。當然武漢是另一種形式，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領導幹部的講話〉（1967 年 7 月 25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18]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1。

議周恩來只是和中央文革成員坐在主席台上，看著大家亂轟一氣，[419]而陳再道在整場會議上也是不發一語，因爲他已經無法再爲自己辯解，[420]陳的罪狀已在會議開始前經由毛澤東認可。[421]也因此周恩來之前跟陳再道說會擔保他的舉動，只是先安撫他，周並未兌現他的承諾，因爲周恩來不可能出面保毛澤東認爲已經犯下重大錯誤的人。

第三節 周恩來的政治作風

如果離開了周恩來，毛澤東在準備發動文革時和在開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難保證能夠貫徹下去。而周恩來能夠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拿周恩來與江青做比較，相比之下，江青的沖衝殺殺更多是在輿論方面，周恩來則是把毛的思想落實在行動上。[422]例如，發生在 1968 年 3 月份的「楊、余、傅事件」，雖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但是從已經披露的部分事實仍然可以看出周恩來

[419]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1。

[42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1。

[421]毛澤東武漢部隊公告復電對中共武漢軍區黨委指出：「對於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包括你們和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志在內，只要他們不再堅持錯誤，認真改正，並為廣大革命群眾所諒解之後，仍可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武漢部隊公告內容 ：「七月二十日，在武漢市發生了衝擊毛主席派來處理文化大革命問題的代表謝富治與王力住地的“嚴重政治事件”。這一事件，“是在部隊內和‘百萬雄師’內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煽動下進行的”，陳再道等人“則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禍首”。」〈中央關於武漢“七二〇事件”給武漢軍區黨委的復電〉(1967 年 7 月 25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2，頁 381；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區公告內容：「“七·二〇”叛變事件。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復電內容：「你們現在所採取的立場和政策是正確的。公告可以發表。」〈中共中央對武漢軍區公告的復電(1967 年 7 月 26 日)〔中發〔67〕227 號〕，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22]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6(2009 年 3 月)，頁 4-5。

在落實毛澤東意圖時的重要作用。[423]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命發佈〈關於撤銷楊武成、余立金、傅崇碧職務的命令〉。命令全文如下：

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一、楊成武犯有極嚴重的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其中央軍委常委、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

二、余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

三、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職務。

此命令發到團，傳達到全體指戰員。[424]

楊、余、傅三位將領突然被打倒，在當時引起巨大的震動，但是其中一些具體的事實至今仍不爲人所知。[425]不過此命令發布後兩天，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幹部大會發表講話時，講述到三位將領被撤銷職務的原因：「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佈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象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羅、陸、楊那樣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問題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說就是這樣一個不大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裡面發生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裡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

---

[423]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16(2009年3月)，頁5。

[424]〈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命令〔中發〔68〕52號〕〉(1968年3月22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25]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669。

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和曲解馬克思主義。」[426]林彪發表完談話之後，周恩來也大會上發言，周表示：「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剛才宣佈的我們偉大領袖、偉大統帥的英明的決定和命令！……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我們要以無限的忠誠，堅定的立場，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執行我們偉大領袖的命令和林副主席的指示！」[427]周恩來並號召大家繼續揭發楊成武等人的錯誤，他認爲楊成武的後面可能還有黑後台。[428]由此可看出周恩來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在「楊、余、傅」問題中他會堅決的執行來自毛澤東的命令。

於是在毛澤東開會解決「楊、余、博」問題並將整個情況拍板定案之後，整個事件後續問題的處理都是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完成。[429]周恩來在毛澤東和林彪離開之後，繼續主持會議，決定立即採取措施，第一，命令吳法憲派飛機在一天之內立刻將黃永勝（1910-1983）接到北京，爲防止風聲走漏，要求吳法憲一個人去接黃，黃永勝到北京後，由周恩來親自與黃談話。第二，周恩來同時命令李作鵬和邱會作（1914-2002）兩人親自帶領中央警衛團部隊至楊成武家中，將楊帶到人民大會堂，交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集體跟他談話。[430]這其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抓楊成武的時候，徐向前（1901-1990）因爲是楊成武的鄰居，徐的哨兵因此被換、電話線被切斷。[431]由此可見，作爲中國特工鼻祖的周恩來之

---

[426] 〈林彪在軍隊幹部大會上的講話〉(1968 年 3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27] 〈周恩來江青陳伯達中央首長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8 年 3 月 2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28]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7。

[429]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3；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6(2009 年 3 月)，頁 5。

[43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3。

[43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7 月），頁 839-840 。

老辣與幹練。[432]第三，通知鄭維山（1915-2000）和傅崇碧兩人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負責與二人談話，同時準備飛機將傅崇碧送去瀋陽，並通知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1915-1999）作好安置傅崇碧的準備工作。第四，派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帶領警衛部隊到空軍大院，執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務，逮捕後送秦城監獄關押。[433]在執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務的過程中，吳法憲曾提醒周恩來逮人的動作太大，周因此要求吳依照他的方法低調進行逮人舉動。[434]周恩來對毛澤東交辦任務事事週到、細心至極，於此可見一斑。第五，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駐京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對「楊、余、傅」問題的決定。[435]整個過程，滴水不漏。無論是在文革發動時的「羅瑞卿事件」，還是文革中的「楊、余、傅事件」，還是後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來都堅決地貫徹了毛澤東的意圖，可謂「忠心耿耿，日月可鑒」。[436]

「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成功平息了中共黨內對文革運動的反對聲浪之後，因此毛有意緩和一下與黨內元老派的關係，於是周恩來馬上擬定了參加「五一」慶祝活動的名單，將「大鬧懷仁堂」的幾位主角一一列上，報請毛批准，希望通過這種在天安門城樓上「亮相」的舉動，多少改善一下他們的政治處境。但是周恩來在做完這件事情之後，又擔心這些「炮筒子」因此而「翹尾巴」，再度鬧事，甚至牽連到他身上。於是在 1967 年 5 月 5 日，周恩來給因「二月逆流」

[432]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16(2009 年 3 月)，頁 5。

[433]在執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務時，吳法憲曾問周恩來，：「夜深人靜，這麼多人闖到余立金家裡，動靜太大了。」於是周恩來要求吳法憲：「你想個辦法嘛！就說你要找他談話，把他找到你家裡來就好了，我交代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在你家裡等，你負責要秘書通知余立金到你家來就行了。」，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3-724。

[43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4。

[435]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24。

[436]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16(2009 年 3 月)，頁 5。

問題造成風波而受到批判的陳毅、譚震林、余秋里、谷牧、李富春等 6 人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提醒他們 6 人注意，這封信全文如下：

陳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並告富春同志：

"五一團結"[437]，不要又造成你們五位同志錯覺，否則二月逆流，再壓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實行打擊報復，那就又來一個新的反覆。你們在人民中，在黨內信用將要失盡。對黨、對革命來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這也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對革命小將們將是深刻的一課。

為預防你們五位同志走入絕路，專此警告，勿為言之不預。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438]

《「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的作者卜偉華認爲，周恩來這封信雖然措辭嚴厲，但確實是用心良苦。[439]然而實際上卻是，周恩來在做上述這些事情的時候，十分注意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總是儘量左右兼顧，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440]也可以看出周恩來的自保之道。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可以一窺周恩來的政客作風，依照中共官方的說法在造反派圍困中南海期間，周恩來多次對造反派的過火行動提出委婉的批評，並堅持不肯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終不得進入，從而保護了在中南海中的許多領導人。[441]然而此一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爲在周恩來前往武漢的幾天，不正是

---

[437]，指 1967 年 5 月 1 日「五一」天安門焰火晚會。因所為「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陳毅、譚震林、余秋里、谷牧、李富春等與毛澤東一起，出席了火焰晚會。隔天 5 月 2 日，《人民日報》做了報導，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50。

[438]周恩來致陳毅等人的信，1967 年 5 月 5 日，手稿，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6-217；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50。

[439]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479。

[44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15。

[441]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479；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2009 年 3 月)，頁 6。

這些揪劉的造反派鬧得最凶的幾天，怎麼也沒有衝進中南海？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毛澤東沒有鬆這個口，[442]允許造反派衝進中南海，這跟周恩來搬不搬出中南海毫無關係。雖然根據中共官方說法，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是「趁」周恩來不在北京，策動造反派揪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夫人，並抄他們的家。[443]但是這個說辭依然不足以採信，中央小文革小組成員的舉動，周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中央文革小組在對待群眾組織上，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對許多老紅衛兵和許多多數派組織棄之如敝屣，這種明顯支一派反一派的作法，與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作風，還有新崛起造反派仗著中央文革小組的撐腰有恃無恐、橫行霸道的行徑，引起了老紅衛兵和廣大多數派的不滿與憤恨。[444]但要說這種「政客作風」，周恩來同這些人相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在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以及當年的紅衛兵報紙上，周恩來「明顯的支一派壓一派」的講話比比皆是。[445]

「武漢事件」之後，左派的影響力達到巔峰，而火燒英國辦事處則是一個轉折點，[446]而火燒英國辦事處的發生可說與造反派衝入外交部奪權的事件不無相關，至於造反派衝入外交部奪權事件的起因吳法憲認為是因為王力的「八七講話」[447]。雖然根據王力本人的說法，他並沒有發表這樣的講話，只是以中央文革小組

---

[442]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17(2009年3月)，頁6。

[443]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1。

[444]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337。

[445]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17(2009年3月)，頁6。

[446]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237。

[447] 吳法憲指出，王力在1967年8月7日對外交部造反派講的話，公開動員他們起來動員，結果，在姚登山等人的帶領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奪取的外交部的大權。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693。

成員的身分在了解外交部一個群眾組織的情況下時做了一些插話，[448]不過王力的確在發言中，對造反派的作法予以肯定，[449]而且王力這篇談話的確鼓舞姚登山這位造反派領導，姚因而起來奪取外交部的權，由於外交部一直以來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450]這個奪權的舉動等於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因爲這實際上就是要奪取周恩來的權[451]，也或許是因爲這個原因，周恩來將王力這篇紀錄稿直接送交毛澤東[452]，且並沒有事先經過王力本人核閱紀錄稿的內容[453]。這篇王力的「八七講話」被毛澤東批上：「**大、大、大毒草**」[454]幾個字，毛澤東並指出王力等人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455]再加上火燒英國辦事處事件那等於是燒了周恩來的「自家後院」。[456]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嚴厲的批評了周恩來，[457]對此周恩來承受巨大的壓力，致使心臟病發作，整整一天半無法起身工作，處理這混亂的局勢，[458]因爲周知道若毛澤東拿此問罪於他，他該如何向毛交代？最好的辦法是主動出擊，化被動爲主動。[459]這也宣告了王力即將被打倒的命運。當然，王力的出

---

[448]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15-1016。

[449] 王力在發言中指出：「命小將揪陳毅的行動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對的，衝外交部是方法問題，次要問題。陳毅的問題是很嚴重的，應該到群眾中去好好檢查。戚本禹同志的這一席話，大長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氣，大滅了保陳派的威風。」〈王力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談話〉(1967 年 8 月 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50]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3。

[451]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3。

[452]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3。

[453]根據王力的說法，江青是趁周恩來心臟病發而逼迫周恩來將這篇講稿交給毛澤東，但是這種說法顯然值得商榷，顯然跟中共官方一直以來把江青當成一切事件罪魁禍首的說法如出一轍。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20。

[454]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83。

[455]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83。

[456]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7(2009 年 3 月)，頁 5-6。

[457]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4。

[458]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83。

[459]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局有多重因素，[460]「八七講話」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接下來，毛澤東透過楊成武傳話給周恩來，要周恩來把王力等人抓起來，並要周負責處理此事，於是周恩來遵照毛澤東的旨意召開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這場會議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均有出席，在會議上，周恩來對著眾人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隨後王力等人即被隔離審查。[461]王力等人分別被軟禁在釣魚台賓館的一座樓裡，很快地，王力等人被隔離反省得事前就傳了出去，於是在短短一天之內，打倒王力等人的大字報就貼滿了北京城。[462]

在文革中發生過許多令人髮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僅僅停留在各種群眾組織舉行的規模宏大的批鬥大會，顯然是不夠的。因爲這些比起現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專案組（亦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或中央專案小組）所實施的法西斯行爲，都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463]中央專案組與中央文革小組是的成員大多是同一批人，但是它們是兩個不同樣的機構，中央專案組是負責整人的機構，不過它與中央文革小組一樣都是直接對毛澤東負責。[464]不同於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

17(2009 年 3 月)，頁 5-6。

[460] 王力本人認為他導台的原因是因為江青在許多事情上不滿王不同意她的意見，而「七二〇事件」後江青認為王力的聲望已經超過她了，這更加引起江青的不滿，再加上 8 月底亂到極點了，不能在維持下去，於是找王當代罪羔羊。《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24。依照吳法憲的說法，王力等人垮台的原因有三，第一件事情，是與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有關，第二件事情，是與「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反對周恩來的事件，第三件事情，則是與北京發生「火燒英國辦事處」事件有關。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3-694。

[461] 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83。

[462]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5。

[463] 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48。此外，康生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許多中央專案組一些不人道的鬥爭手段。〈中央首長在首都部分院校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二）〉(1967 年 1 月 2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64] 《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726。

是公開的，中央專案組的運作則是秘密的。[465]中央專案組來源於 1966 年 5 月成立的一個處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四人問題的臨時機構，當時，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會議上決定成立對彭真、陸定一、楊尙昆和田家英（1922-1966）的審查小組，而羅瑞卿的問題則由軍委處理，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總負責並且直接擔任專案委員會下的彭真專案組的組長，中央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和軍委的各項審查工作都是由周恩來做統一部署。[466]不過中央專案組其具體的操作罕爲人知，中央專案組的結構和作爲迄今仍難於見諸於公開出版物。[467]只能透過楊城武的回憶可略窺一二。自 1959 年廬山會議之後，發生了彭德懷問題，於是設立了彭德懷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與賀龍負責，專案組的組長由賀龍兼任，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賀龍倒台，組長則由周恩來接任，至於因爲羅瑞卿問題而設立的羅瑞卿專案組，組長也是由周恩來擔任，而在文革中最動亂的 1967 年，在這一年中，中共中央、國務院、軍委機關等，有許多幹部經點名要被打倒，這些高層幹部左被安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右被扣一個「歷史上有問題」的大帽子，爲了處理這些案件，成立了許多專案審查小組，而這些專案審查小組也是由周恩來擔任組長統籌事務。[468]因此可以說整個中央專案組的實際領導者就是周恩來，連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員。[469]整個專案組的材料最後審批與向毛澤東做最後的報告之前都要先經過周恩來之手，至於材料的真假並不是問題，關鍵是在於能否迎合整個中共中央當時的要求。無論是早期的彭德懷專案還是文革期間的劉少奇、賀龍等專案，完全都是依據中央專案組所提供的材料定案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專

[465] 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52。

[466] 《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726。

[467] 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48。

[468] 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縱橫》，期 1(2000 年)，頁 18。

[469] 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48。1967 年成立的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擔任組長，陳伯達擔任副組長，小組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縱橫》，期 1(2000 年)，頁 18。

案的最後仲裁完全取決於毛澤東，無論在專案迫害上還是執行保護老幹部上，都是經由毛作出決定，而周恩來負責具體執行。[470]

中央專案小組的工作內容，大多屬於不公開的狀態，不過林彪曾經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公開對中央專案小組進行表揚，林並提到了江青和周恩來：「我們專案小組進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別是江青同志對專案領導領導的、抓得很緊，把這些我們素無所聞的事情、觸目驚心的事情，真憑實據，人證、物證、旁證都拿出來了，才能使我們恍然大悟。否則，沒有事實總是使人迷迷糊糊，不是那麼清楚。現在把這些傢伙揭了出來。當然專案的問題除文革的幾個同志之外，總理也是參加了的，也是領導的，是他們這些同志，專案小組得全體同志的努力，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471]從林彪的講話中可以得知，除了江青之外，周恩來就是中央專案小組的主要領導人物。在整個文革期間（除周恩來病重期間），負責中央專案組的是周恩來，並且由周恩來直接對毛澤東負責。[472]而且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從 1967 年 9 月開始，一直到 1971 年 9 月他被逮捕爲止，總共成立了 14 個專案組，當時決定成立什麼專案組、由誰來分管、選派專案工作組工作人員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由周恩來親自提出，經大家討論同意，再由周恩來報請毛澤東、林彪批准。[473]另外，雖然實際掌握著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有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四人，但是在具體工作上，還是由周恩來帶領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召集所有中央專案小組的工作人員開會，周恩來每半個月就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堂主持召開一次全體工作人員會議，周除了在會議上闡述中央專案小組任務的重要性之外，還會依序聽取

---

[470]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49。

[471]〈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68 年 10 月 2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72]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23；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51。

[47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7-698。

每個專案組的工作匯報。[474]這個每次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會議，它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負責揪人、批鬥、關人。[475]因此，可以說，當時中央專案組各小組的工作，事無鉅細，都是由周恩來負責，不過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毛澤東身上。[476]一如往常，依然遵循著毛澤東作主，周恩來負責執行的模式。

在劉少奇一案中，也可看到毛、周二人聯手的行爲模式。而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是清楚的，可以說是當事人之一。[477]在中央專案小組公佈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刘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報告中指出劉少奇竊取湖北省總工會秘書長的職位破壞工人運動等罪行，[478]然而，劉少奇作爲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僅僅是執行上級的命令，[479]反觀周恩來，不僅是參加了工人的會議，甚至還介入處理工人運動的問題。[480]對於這段期間湖北工會的工作內容，周恩來必定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在中央專案小組公佈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刘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報告中提出劉少奇在 1929 年在東北叛賣革命的罪證，[481]做爲當時中共中央實際領導人的周恩來對於此事的前因後果也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周恩來卻沒針對此事提出相關的證據或說明，[482]關於這點實在違反周恩來「事必躬親」[483]的性格。

---

[47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98。

[475] 《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730。

[476]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00。

[477]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928。

[478]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中發〔68〕155 號〕(1968 年 10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79]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929。

[48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119。

[481]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中發〔68〕155 號〕(1968 年 10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82] 李文合、李義凡，《走近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121。

[483]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6。

1967 年 3 月 30 日，戚本禹所撰寫並經過毛澤東審閱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祕史》〉在各個報章雜誌同時發表。[484]毛的這個舉動象徵對劉少奇批判的公開化。[485]為了消除群眾對此的疑惑，周恩來在接下來的 4 月份，連續發表三篇談話，三次講話的主題都圍繞在劉少奇的錯誤上，周指出，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會積少成多的，不會一下子從犯錯那天起，就把他的錯誤定下性質，因此，劉少奇的錯誤是逐漸發展起來的。[486]也因此周恩來放任劉少奇專案組的手下做假證，羅織劉少奇的罪行。[487]眾所周知的是，作為中央專案組的一把手，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所有材料最後上報都是周恩來一手把關的，沒有周恩來的同意這些材料根本上報不了。[488]王年一就曾經說道，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罪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罪證確都沒有送交到毛澤東手上。[489]而周恩來的這些行為，沒有毛澤東的同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490]1968 年 9 月 25 日，周恩來還親筆起草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呈的報告，將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大叛變的罪刑與材料送交給毛澤東與林彪審閱，在這報告中，劉少奇被稱為長期埋伏在中共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

---

[484]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祕史》〉（1967 年 3 月 3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85]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932。

[486] 〈周恩來與國家計委群眾組織代表的談話〉（1967 年 4 月 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恩來在廣州市中山紀念堂的講話〉（1967 年 4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恩來在廣州接見群眾組織及駐軍代表的講話〉（1967 年 4 月 1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87] 1968 年 10 月 7 日，周恩來在看到這些假證之後，感到非常得可疑，於是追問徵查辦外調組的負責人……，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彌尚義、楊大勇，〈誣陷劉少奇的三項「帽子」是如何製造的〉，《百年潮》，期 6，（1998 年），頁 30。

[488]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936。

[489] 高默，〈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否該偏正一點？〉，收錄於楊建利主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出版），頁 23。

[490] 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頁 300。

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各種材料都足以證明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份子。[491]甚至有一說法，根據澳洲墨爾本莫那盧（Mohash）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孫萬國（Warren Sun）教授透露，在 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周恩來就「劉少奇專案組」的調查報告，親手批示「此人該殺」上呈毛澤東。[492]不過高文謙並不同意這個看法。[493]目前也無直接文獻資料證明孫教授的說法。1980 年初劉少奇案平反後，鄧穎超曾爲周恩來的所作所爲找藉口，鄧說道，開除劉少奇黨籍文件，也是周恩來簽署的，他們需要爲此事道歉嗎？這是一件極痛苦的事，但是又非做不可，周恩來不得不往大處著眼。[494]周恩來從來不需爲自己的所作所爲道歉，也從來沒有表示過，從周恩來的言行中，絲毫看不出來周恩來的問心無愧，因爲周只是擔心後人在自己臉上打叉叉而已。[495]

另外，周恩來曾在 1966 年 5 月 21 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個問題：一、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二、領導和群眾問題；三、保持晚節問題。[496]在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周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講得很好**」，[497]然而周恩來在發言中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他更帶頭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因此周恩來可以說是文革的最佳推手。在領導和群眾問題上，周恩來則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周提出：

---

[491]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就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刑材料問題給毛澤東、林彪的報告，1968 年 9 月 25 日，周恩來手稿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50-251。

[492] 孫萬國，〈古有竇娥，今有林彪〉，《明報月刊》，期 7（1996 年），頁 108。

[493]高文謙認為在這件事情中，周恩來只是扮演毛澤東的幫兇。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50-252。

[494]韓素音著、 張連康譯，《周恩來與現代中國：1898-1976》（台北：絲路出版社，1995 年），頁 402。

[495]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941。

[496]〈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97]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 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 。」[498]在保持晚節問題上，周向全黨老幹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周更以李秀成（1823-1864）、瞿秋白（1899-1935）爲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周指責瞿爲「叛徒」，周說道：「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499]由於周恩來是第一個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砸爛死者墓地，數月以後，周的講話廣爲流傳，瞿、李二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文革群眾性政治暴力中對死者屍體、墓地的殘害也是從此開始的。[500]

周恩來的影響力不僅如此，「九大」前後其實是周恩來權力轉換的分水嶺，根據邱會作的回憶，把此前與此後的狀況做一個比較：

過去的中央碰頭會，名義上是周恩來在主持，事實上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議才真正由周恩來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會，陳伯達、康生也主持過政治局會議，但是從來沒有讓江青主持過會議。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江青不到不能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江青不到照樣開會。過去碰頭會開會之前，周恩來總要謙恭的問一句：「江青同志，我們開會嗎？」江青不點頭不答話，周

[498] 〈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499]〈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00]宋永毅，〈一個被掩蓋了的文革周恩來形象〉，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頁 353。

恩來一般不會馬上宣布開會。「九大」以後的政治局會，周恩來仍習慣的問一句「江青同志，我們開會嗎？」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樣開會。周恩來這句話僅僅是形式上的禮儀了。過去的中央碰頭會，最早在中南海懷仁堂開。1967 年反對「二月逆流」後，江青不願意在那開，於是周恩來遷就他，碰頭會改了在釣魚臺開，會址固定在中央文革辦公處十六號樓。那樣對江青方便，對周恩來不方便，但周恩來一點辦法也沒有。「九大」後江青幾次提出，政治局會「仍在十六號樓舉行，不能改變」。幾經周折，政治局開會很快就離開釣魚臺，並固定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了。這對周恩來方便，對江青沒有以前那麼方便。江青提了幾次會釣魚臺開，周恩來不理他。周恩來不再迎合江青的口味。過去中央碰頭會，是江青這個「霸王」逞威風的地方。凡要經過碰頭會處理得事情，無論大小，江青不點頭不能算數。「九大」後的中央政治局會，周恩來變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來很尊重大家的意見，特別是提出問題的人的意見，只要多數人同意的事，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來就拍板決案，從來不讓江青專權。[501]

「九大」後周恩來成爲名副其實的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領導者，在毛澤東確定的路線內，周恩來又是執行中的決策人，成了集國務院總理、黨的具體部門的領導人、「半個」國家主席于一身之人（董必武代理國家主席，不問事，對國外交往用其名義）[502]，無怪乎整場文化大革命「謀事在毛，成事在周」[503]。

---

[501]程光，〈1970 年廬山會議背景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613。

[502]程光，〈1970 年廬山會議背景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13-614。

[503]張素華等編著，《說不盡的毛澤東》，頁 526。

第四章 周恩來與林彪事件

周恩來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擅長於窺視毛的內心世界，尤其在「如何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問題」上，不同於許多人的疑惑不清，周對於毛的問題是異常得清楚與明瞭，何況周還認真的落實與實踐。[504]關於此，可透過邱會作的回憶略窺一二：「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底的過程中，終於形成了一個"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個人關係問題。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是平等的（至少口頭上是這樣），執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會一班人的"班長"。雖然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毛主席為主，常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但是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義上並沒有改變成員之見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來執政之後，他正式把毛主席放在高高淩駕於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成了毛主席的"從屬"，黨的政治局領導集體要像毛主席個人請示工作，聽從他的指示……那個時候，周恩來對重大問題是像毛主席寫書面報告（同時也向林彪報告），他在參加毛主席接見外賓等活動時，有些事還當面請示，有時還約毛主席面談。在周恩來主持政治局處理問題時，凡他認為有必要的，討論後會請汪東興、葉群分別向毛主席、林彪口頭匯報。毛主席批示和汪東興帶回來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傳達學習。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畫圈才能發出。」[505]換句話說，毛澤東後來在中共中央的崇高地位，是由周恩來推波助瀾所造成。[506]也因周恩來遵循「順守」之道，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使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取代碰頭會處

[504]程光，〈1970 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18。

[505]邱會作回憶稿、談話稿，轉引自程光，〈1970 年廬山會毅背景的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18-619。

[506]程光，〈1970 年廬山會毅背景的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18-619。

理中央日常事務的工作模式。[507]

第一節　1970年盧山會議前後周恩來、林彪的關係

毛澤東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在李志綏（1919-1995）的眼中「明明是一個精神上不健全的人」[508]，李曾目睹「林躺在床上，頭放在葉群的懷裡，哼哼唉唉地哭著。葉群在撫慰他。」[509]此一情景，因此他認爲林是「精神上十分脆弱的患者」[510]對於林彪在生活起居上，怕風、怕光、怕水等種種的怪癖，李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李還在回憶錄中透露，林彪不能上廁所大便，「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從頭往下蓋全身，在被子內大便。」[511]李志綏係一位專業醫生，他近身觀察林彪病情所獲得的一手訊息，應有其參考價值。[512]至於爲何毛澤東要選林彪這樣身體跟心裡都可能有問題的人當接班人？由於毛澤東的第一位接班人劉少奇，讓毛澤東感受到功高震主的威脅，毛澤東因而選擇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有鑑於此，新任接班人絕對不能像劉少奇一樣活力充沛，野心勃勃，處處攬權，換句話說這個人絕對不能對毛澤東構成任何威脅，因爲毛無法再容忍劉這樣的人成爲他的接班人，不論在名義上或者實質上，在這種背景上，林彪脫穎而出，林的病情竟然成了他最大的政治資本，在這點上，毛澤東絕對是慧眼獨具。[513]由這點可以

[507]程光，〈1970年盧山會議背景的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619。

[508]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 11 月），頁436 。

[509]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36 。

[51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36 。

[51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36 。

[512]齊茂吉，〈毛澤東欽定林彪為接班人之探討〉，《兩岸發展史研究》，期2，頁202。

[513]齊茂吉，〈毛澤東欽定林彪為接班人之探討〉，《兩岸發展史研究》，期2，頁210-211。

看出，毛澤東從未打算以林彪做爲他的真正接班人。[514]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在於著手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在 1966 年 8 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親自將林彪的名字從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名，成爲僅次毛澤東在黨內的第二號人物，林彪這位曾長期居於周恩來下屬的人一下子成爲周的頂頭上司。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項決定堅決擁護支持，一來，周恩來一向以毛澤東的意志爲意志，[515]周對毛澤東更是非常的崇敬。[516]另一方面，周恩來總是將自己擺在輔佐、幫手的位置。[517]毛澤東就曾說過：「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離不開總理。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可是誰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他。」[518]周恩來自「反冒進」以來，周恩來在重大政策上及以不再堅持己見，避免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也不與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早在文革爆發前，善於觀風的周恩來已嗅出風雨欲來的味道。[519]在 1964 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即已表示響應毛澤東所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但是周恩來也表達了「絕不能說資本主義復辟是不可避免的」意見，[520]不過周恩來強調：「特別重要的是，我們的黨和國家有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南的領導核心。這

[514]齊茂吉，〈毛澤東欽定林彪為接班人之探討〉，《兩岸發展史研究》，期2，頁199-227。

[515]丁凱文，〈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334。

[516] 根據周恩來其中一位衛士劉忠揚回憶，周恩來對毛澤東非常的崇敬，閒暇時喜歡背毛澤東的詩詞，並要求身旁的人也跟著熟背。鄒研主編，《周恩來和他的衛士們》（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311-312。

[517] 丁凱文，〈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頁 334。

[518]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724。

[519]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台北：新新聞文化出版社，1997 年 1 月），頁 271。

[520] 〈周總理在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收錄於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編輯，《周恩來專輯》下冊(香港：自聯出版社，1971)，頁 543。

就使得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成為很困難的事情。」[521]這正是周恩來狡黠之處，也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歷次險惡的權力鬥爭一直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522]這也註定了周恩來對林彪的基本態度。

周恩來接續他一貫頌揚毛澤東的路線，周對於林彪這位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評價亦相當高。[523]1966年10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學習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許多精闢語句，如活學活用，學用結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524]周恩來在文革時期每當提到毛澤東時，必定要加上林彪，將毛林二人並列提及。比如1966年9月26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大會上說：「我現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國務院以及我個人向你們問好。」[525] 11月27日周恩來接見外地來京學生時，開頭就說：「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你們問好！」[526]周恩來在文革期間這樣的談話不勝枚舉，顯示此時周恩來對林彪極爲尊重。不僅如此，周恩來在寫給毛、林兩人的書信中也將兩人的姓名並列書寫。[527]此外，周恩來還在許多講

---

[521] 〈周總理在第三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收錄於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編輯，《周恩來專輯》，下冊，頁543。

[522]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1954-1971》，頁271。

[52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43。

[524]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8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25]〈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9月26日)，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26] 〈周恩來在接見外地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7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27] 〈興建葛洲壩水利工程是可行的-致毛澤東、林彪〉(1970年12月24)，《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頁607。

話中突顯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比如，1969 年 4 月 14 日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的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開幕式上的極其重要的講話，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不愧是廣大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528]從周以上的發言可以看出當時周恩來與林彪兩人的關係應當不錯，否則周恩來也不會在擁護毛澤東與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之餘，說出如此大力讚揚林彪的話，甚至還將林彪與毛澤東擺在同一個高度。而林彪聽了周的大力稱頌當場即席發言：「同志們，我沒有準備講話，但是我要插兩句話，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地看問題，沒有達那個水準，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準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529]這番談話也顯示周、林二人在文革期間關係密切。隨後發表的九大的總綱正式確立林彪接班人地位。[530]另外根據吳法憲（1915-2004）的回憶，可從兩件事看出，林彪與周恩來兩人的關係不錯，其中一件事是發生在九大期間，有一天開會時，吳法憲正好坐在康生（1898-1975）和張春橋（1917-2005）的身邊。開會時，他倆悄悄地對吳法憲說 「揪軍內一小撮」[531]這個口號，是周恩來批准的，有意促使林彪集團的人馬找周恩來負責任。

---

[528] 〈周恩來在九大中的發言〉(1969 年 4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29] (林彪在九大上的講話)，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30] 在第一章總綱的內容中：「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1969 年 4 月 14 日通過)，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31] 「揪軍內一小撮」，指文化大革命發展到全面奪權和全面內戰的白熱化階段，在群眾造反組織出現一種普遍的思潮和現象，但是後來凡有參加過「揪軍內一小撮」的活動或有類似言行的人，都受到文革的發動者與領導者毛澤東與「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嚴厲申訴，被打成「五一六份子」的大多數人都遭到清算。程光，〈1970 年廬山會毅背景的研究〉，收錄自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

後來吳法憲選在合適的時候，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周恩來，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動。聽了吳的話，周恩來只是笑了笑，什麼話都沒說，吳法憲因此非常讚揚周恩來：「有涵養，遇事冷靜，沉著大度，絕不會為了什麼閑言碎語而受到刺激發怒。」[532]由此不難看出周恩來在林彪集團與江青兩大集團中爲人處事之道。而另外一件事是發生在九大之後，這件事也顯現出周恩來對林彪也很關心。有一次，周恩來要吳法憲轉告林彪，要林彪有空可以出去走一走，因爲出去走走對身體有好處，周並勸林彪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蘇州不動，但是林彪的脾氣不好，讓吳法憲有點猶豫，周恩來還是鼓勵吳法憲可以去試一試，於是吳遂找機會把周恩來的這個意思轉告給了林彪。[533]林彪回應說：「謝謝總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體實在是不行了，現在就連轉車也轉不了。」[534]林彪最後還是沒有出去走走。不過吳法憲認爲，他對周恩來的好意是真心感謝的。[535]而在邱會作的眼中周恩來與軍事辦事組的幾位領導同志，實際上就是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是「非常融洽」[536]的，軍委辦事組直接送交周恩來批示的報告，周恩來能批就批，因此軍隊內許中央許多文革那一邊並不知道，周恩來給了軍隊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軍委辦事組能夠展開很多方面的工作，能把各項任務完成好，和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537]

周恩來在九大中發還說到：「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

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26。

[532]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1-752。

[533]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2-753。

[534]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3。

[535]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3。

[536]程光，〈1970 年廬山會毅背景的研究〉，收錄於自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26。

[537]程光，〈1970 年廬山會毅背景的研究〉，收錄於自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26-627。

終緊跟毛主席。」[538]周的言下之意，不僅要緊跟毛的腳步，也要追隨在毛之後林的腳步，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吳法憲眼中：「林彪與周恩來兩人的關係是很好的」[539]。另外，在九大在中還有一件事情，也可看出周對林彪集團的良好關係，在九大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之前，葉群（1917-1971）私下向林彪表示，不想讓江青他們一幫人得全票，要殺一殺他們銳氣，因此指定軍隊中有的人不投票給江青這一群人，選舉結果，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都相對應少了一些票，因此江青大發雷霆，四處派人查各個大區的選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個代表團少投了他們的票，這時吳法憲直接找上周恩來說明原委，周一剛開始與吳法憲的立場相同，都認為江青此舉是違反黨章的，於是周恩來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毛澤東聽了沒有說話，於是大家也不好再追查下去，這件事情才不了了之。[540]周恩來應該是看在毛澤東沒有表態的原因才不好再繼續追究這件事情，但是江青事後仍不死心，甚至想要周恩來安排她當政治局委員，但是也被周拒絕，[541]雖說因毛澤東沒有表態，周恩來對於江青違反黨章一事不好追查，但是也不會主動幫江青，不難看出，周恩來此時在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之間，是較偏向林彪這邊。然而，在中共許多文獻中的說法都將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定位：「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542]但是，卻無法舉例周恩來到底如何與林彪進行鬥爭，因此，如果將這句話改為「周恩來在文革中林彪關係融洽密切、互相尊重與支持，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見解相同」則更加貼近符合歷史事實。[543]而中共官方此一說法，無非就是想人為區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一方面拔高周恩來的

---

[538] 〈周恩來在九大中的發言〉（1969 年 4 月 14 日），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39] 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1。

[540] 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4-745。

[541] 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6。

[54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 17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43] 宋永毅，〈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頁 333。

偉人形象，一方面則繼續抹黑林彪，讓林彪充當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544]

另外，從下列幾件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在林彪、江青這兩大派系之間，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不錯，周恩來曾向吳法憲透露，毛澤東決定要打倒劉少奇時，曾徵詢他的意見，由何人取代劉少奇最合適，他推薦了林彪。周恩來爲何要通氣給吳法憲呢？理由非常簡單，周要讓林彪知道是他支持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545]據陳伯達的回憶指出，周恩來在文革的處境經常是艱難與微妙的，他也需要爭取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的中央領導階層的幫助，才能克服難題，度過難關。[546]的確在當時的環境下，江青不時狐假虎威，咄咄逼人，周只好忍氣吞聲，唯唯諾諾。吳法憲透露，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來，除了康生以外，誰都不放在眼裡。[547]因此在政治局常委中，周只有拉攏與江青有矛盾的林彪和陳伯達。有一次毛澤東說了重話批周恩來，周心中不安，乃透過妻子鄧穎超（1904-1992）向陳伯達的妻子劉淑宴求援，希望陳伯達從中緩頰。[548]而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剛，也十分配合周，也支持周。[549]至於陳伯達當時則被江青逼得走投無路，幾乎步上自殺一途。[550]就在這個時候，林彪反將江青一軍。他囑咐黃永勝、吳法憲出面，一狀告到毛澤東那裡。照理來說，江青無權召集六位政治局委員開會，[551]這種做法本身就不

[544]宋永毅，〈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頁 339。

[545]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597。 關於周恩來向毛澤東推薦林彪一事，因非出自周的主動，若非毛的意圖明朗化，在接班人這種事關重大的問題上，周應不會輕舉妄動，關鍵在於毛決定打出林這張牌。周恩來一向是毛旨意的執行者，因此周不過順水推舟，落實毛的意圖而已。齊茂吉，〈林彪與江青交惡之始末〉，《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3，頁 134。

[54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15。

[547]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

[548]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16。

[549]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681、783。

[550]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 375。

[5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253。

合法，在這次會議上，江青宣稱掌握了不利於周恩來的材料外，又拋出了陳伯達的歷史問題，含沙射影地斥責陳伯達，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指控。不料，毛澤東對於黃永勝、吳法憲的告狀不感興趣，也未表示意見，毛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也沒有責備江青的意思，令黃、吳二人相當失望。不過，毛澤東還是假惺惺地交待黃、吳二人，千萬不要讓江青知道他們來過這裡，另外毛也表示，他不會告訴江青這件事情。[552]

在文革初期江青並沒有要把周恩來打倒，也還未把周恩來視爲「眼中釘」。長期以來，江青在周恩來面前，比較隨便和放肆，有時發脾氣，或頂撞周恩來。[553]對這些事和這種情況，戚本禹也曾經提出他的說法：「江青和總理的關係很好，她之所以敢在總理面前發脾氣，那正是他們關係比較好的表現，她怎麼不敢在劉少奇、林彪面前發脾氣？」[554]周恩來還時常爲了跟江青商討事情而親自打電話給她，而江總是歡迎周恩來的到來，[555]針對此事汪東興也曾說道：「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一樣。在文革中，總理說了很多讚揚江青的話。“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總理喊出來的。」[556]而且就連毛澤東都說過，周恩來有點怕江青。[557]至於周恩來爲何對江青遷就又遷就，忍讓又忍讓，這一切都是因爲毛澤東站在江青身後的關係，[558]陳伯達就曾經說過一句很直接而又很深刻的話：「如果不是因為毛主席的關係，誰理她呀？」[559]因此周恩來對江青的態度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延伸。

[552]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54-755。

[553]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2008 年 9 月），期 3，頁 35。

[554]轉引自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頁 35。

[555]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頁 35-36。

[556]轉引自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頁 35。

[557]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頁 35。

[558]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期 3，頁 38。

[559]陳曉農，《陳伯達遺稿》（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 年），頁 89-90 。

而江青對周恩來的態度也是以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態度爲轉移的，恐怕是在毛澤東經常敲打周恩來，在每一次敲打時，江青都比毛澤東走得更遠，從思想方法講，她比毛澤東更極端。至於後來江青認爲周恩來成爲她的障礙而必須打倒，則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560]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最初並不十分積極，不過因爲已經上了毛這條「賊船」，身不由己愈陷愈深。[561]林彪對文革的態度可以從下列這些事件看出，文革初期，在爲發動文革製造輿論而特意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問題上，林彪的態度反意非常冷淡，這讓與奉毛澤東之命專程來參加的江青非常的不滿，雙方甚至差點大打出手。[562]原本在兩人的談話中，江青請林彪務必多關心一下藝文活動，但林彪卻當面表示他對這類活動一點都不懂，於是江青只好搬出毛澤東的名號，江指出在上海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不是她搞的，而是「主席讓我請尊神」，林彪看到江青搬出毛澤東這尊神主牌，不僅不買她的帳，又再次回絕了她，只是這次林彪以他身體不好作爲推拖的理由，雙方因此不歡而散。[563]後來，林彪看在毛澤東的面子上，還是敷衍一下江青，不過，在上海召開的部隊藝文工作座談會，林彪指終沒有親自露面，然而林彪消極的態度卻無法置身於文革事外。後來以中共中央黨的形式向全黨轉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得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其實是出自毛澤東本人的手筆，這篇紀要毛修改了三遍，做了大段增刪，並在標題上動了手腳，把原來〈江青同志召開得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增加「林彪同志委託」這六個大字。[564]，如此一來，毛澤東明正言順的將林彪拖入，一蹚文革這場渾水。

---

[560]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期 3，頁 39-40。

[5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59。

[562]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頁 156。

[563]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頁 156。

[56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59。

在九大之前，由於文革風暴席捲各地，所有的地方政權均告癱瘓，當下毛澤東決定由軍隊介入，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靠軍隊穩定全國秩序，也使軍隊在整體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的作用，以軍隊介入國家事務，這種情況也是當時為了穩定大陸局勢這個客觀條件造成的。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就占了其中十四人，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表示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565]而毛澤東能夠放手發動文革，縱容紅衛兵砸爛黨政機關，他手中的主要王牌就是解放軍。毛澤東一手挑起這場空前的群眾運動後，根本無法撲滅這把由他點燃的熊熊烈火，整個運動的發展乃告失控，毛澤東下令解放軍以「支左」名義，介入文革。[566]解放軍乃以工作隊的角色出現在中共政治舞臺上，軍方的勢力也大量滲入非軍事部門。由於非軍事任務的擴大，職業軍人在中共政壇已形成主流勢力，軍方的政治勢力亦膨脹至空前的地步。1968 年 9 月，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陸續成立後，在「軍、幹、群」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內，軍方無疑擁有多數的優勢。在 29 位省級革委會主任中，有 22 名職業軍人，其中包括 13 位司令員和 9 位政委，佔了 75.9%。[567]

毛澤東與林彪合作的氛圍在九大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出爐後開始產生變化，以下為九屆一中全會的選舉結果：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

[565]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28。

[566]〈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人民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967年1月23 日），中發（67）27 號，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67]Jürgen Domes, “Part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ank N. Trager & William Henderson eds., *Communism China, 1949-1969: A Twenty-year Appraisa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nd printing,1972), p. 90.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

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

葉　群　葉劍英　劉伯承　江　青　朱　德　許世友

陳伯達　陳錫聯　李先念　李作鵬　吳法憲　張春橋

邱會作　周恩來　姚文元　康　生　黃永勝　董必武

謝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紀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東興[568]

在九大產生的170 名中央委員中，職業軍人就高達87人，佔全體51.2%，其中包括軍事幹部68人及政工幹部19人。[569]九大後，中共陸續重建地方黨委組織，結果在29 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會的領導班子內，軍方勢力仍居上風，在總數達158 位的黨委正副書記群中，有98 名職業軍人，比例達62%。至於29位第一書記中，有22 名職業軍人。[570]因此，1969 年4月的九大前後，軍方的政治勢力日益高漲之際，林彪集團無疑也成爲一馬當先的當權派。也代表林政治

---

[568]〈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公報〉(1969年4月2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69] Jürgen Domes, "Part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ank N. Trager & William Henderson eds., *Communism China, 1949-1969: A Twenty-year Appraisal*, p. 91.

[570] Jürgen Domes,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3), p. 215.

上的勢力日益壯大，這種狀況越來越成爲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毛、林關係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571]毛因此有意在兩人的關係上降溫，毛澤東有一次特別在林彪面前提起，林年紀大之後要誰接班的問題，當時毛曾經提到張春橋這個名字，此舉也讓林彪產生了疑慮。[572]毛澤東也從未完全信任過林彪，毛只是暫時利用林彪來借刀殺人。[573]此時周恩來也開始察覺出毛對林彪日益不滿。[574]

第二節　毛澤東與林彪關係逐漸生變

九大之後，毛澤東開始對林彪產生懷疑，因此對周恩來更加依賴，周也秉持著一貫小心謹慎的態度，採取任何行動前一定先請示毛澤東，把他自己的所作所爲都稱之爲貫徹毛澤東思想，但是周依然十分留意，以免被別人抓住辮子。[575]此時毛澤東欽點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並且指定陳伯達（1904-1989）、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負責起草初稿，林也在毛家灣約見他們談了一下。雖然陳伯達當時貴爲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但是第一副組長江青、顧問康生（1898-1975）、副組長張春橋及組員姚文元並未將他擺在眼裡，不時對其冷嘲熱諷，備遭排擠的陳伯達乃向林彪靠攏。因此，陳抓到起草政治報告的機會，將張、姚二人甩開，而搞起「單幹」。陳伯達認爲，不能再搞運動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在這種基調下，陳將政治報告的題目定爲〈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他本人帶著這份提綱去和林彪商量後，親筆寫了一份報告給毛澤東，並得到了毛的批准。不料，陳伯達的初稿尚未完稿，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上，對於陳未能按期交出報告全稿，可能延誤九大的召開，毛表

---

[57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74。

[57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388。

[573]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46 。

[57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0。

[575]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140。

示了不滿。結果，改由張春橋、姚文元上陣。[576]由於陳伯達在起草這份報告時，認爲今後要講國家建設，要搞民富國強，這樣的想法剛好跟周恩來不謀而合，爲此陳伯達曾經私下徵求過周的意見，周恩來表示支持，[577] 然而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稿子，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另起爐灶，林彪、周恩來見毛澤東表了態，對於此事便不再吭聲。[578]

問題是，林彪內心根本看不起江青、康生、張春橋和姚文元這些人，因此在張、姚起草政治報告的過程中，林始終未置一詞，吳法憲透露：「幾次討論，他〔林彪〕都是一言未發，送到他那裡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沒有動一個。」[579]林彪這種態度也顯示了他對這篇政治報告的看法，因此林在九大上唸這份政治報告時，事前根本沒有閱讀過一遍，所以唸得結結巴巴，一點也不順暢。緊接著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時，葉群向吳法憲等人傳達林彪的指示，決定殺一殺江青這幫人的銳氣，要讓他們的選票少幾張，給他們來個下馬威。吳法憲等人隨即做了具體部署，指定軍方一些代表在選舉時不投江青等人的票。[580]對江青早已心懷不滿的陳伯達，順水推舟，也未投票給江青。[581]中央委員會選舉的結果，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票比預選時少了一些，尤其是江

---

[576]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2（1998年），頁88-90。

[57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69。

[57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70。

[579]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41。此外，吳法憲又透露：「報告正式發表以前，張春橋曾經想請林彪簽個字，但被林彪拒絕了。張春橋不得已，只好從《〈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裡描了一個林彪的簽字才算完了事。」見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頁741-742。

[580]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4。

[581]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 2，頁 91。

青的選票不僅比葉群少，甚至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及邱會作還少。江青大發雷霆，康生面帶慍色，臉色比江青還難看，張春橋、姚文元亦然。[582]上海小組在開會時，群情激憤，除了爲江青打抱不平外，還要追查在江青的名字上打××的人，並認爲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一向謹小慎微的陳伯達聽說要追查，非常不安地打電話給汪東興，探詢關於查驗筆跡的事情，唯恐東窗事發。[583]江青、康生當然心中有數，誰在太歲頭上動土，因此不肯罷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周恩來獲悉後，覺得大事不妙，趕緊報告了毛澤東，但是毛聽了並未表示意見。[584]可以想像的是，江青一定會向毛澤東告狀，毛不可能看不出來是林彪動的手腳，正如吳法憲所說：「但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都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方面，江青在這些問題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氣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後的人。」[585]

九大之後，雙方互相較勁的態勢也反應至憲法修改小組中，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在政治局內，林彪、江青兩派人馬明爭暗鬥更加激烈，結果在修改憲法這個議題上，雙方爆發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戰，其中的關鍵就是國家主席的問題。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毛澤東先後有六次表達不設國家主席的立場，[586]可是林彪卻堅持設國家主席，雙方各執己見。[587]不過陳伯達在生前却表示：「什麼說

---

[582]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4。

[583]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2，頁91。此外有一篇文章透露，在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到會代表1,510 人，毛澤東獲得全票，周恩來1,509 票，江青1,502 票，張春橋1,496 票。當時有8 個人在江青的名字上面打×，所以江青少了8 票。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期3（2003 年），頁 48。

[584]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4-745。

[585]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5。

[586]〈在外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 年8 月-9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1 月），頁 246。

[587]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頁 1012。

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要設國家主席，可以讓陳永貴當。」[588]堂堂一個政治局的常委爲何不知道毛澤東曾六次說過不設國家主席呢？[589] 顯然，中共官方的說法仍有疑點。

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透露，九大以來汪東興同他們「一直都搞在一起的」[590]。吳又指出，1970 年3 月上旬的一天，當時在杭州的毛澤東指示汪東興回到北京，向政治局傳達關於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在會上，汪特別傳達毛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麼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衹有林彪同志來當。」[591]汪傳達完毛的看法後，當時並未討論。會後，汪找到葉群，準備到毛家灣向林彪傳達毛的意見。由於林當時已服安眠藥入寢，因此汪只好請葉群代爲告知。既然沒去毛家灣，汪就順便邀請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到他家裡小聚。一行人隨著汪到了他在中南海內的小樓，並在汪家中共進晚餐，一起吃紅薯。吳法憲指出，當晚在提到國家主席的問題時，汪東興又對他們說，毛澤東曾經說過，要設國家主席的話，只有林彪才能當。[592]聽完汪這段話，在座的人都很高興，葉群當然會將這個重要訊息告訴林彪。汪東興傳達毛澤東意見時，關於是否設置國家主席的問題，毛的意思非常清楚，他的意見是不設，如果要設的話，就由林彪當國家主席。那麼林彪的態度是如何呢？5 月17 日那一天，林曾對四大金剛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國元首，

[588]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78。

[589]齊茂吉，〈林彪與江青交惡之始末〉，《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3，頁 138。

[590]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6。

[591]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75。此一期間，汪東興確曾代表毛澤東傳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53。

[592]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6。

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祇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但是毛主席的年紀大了，當國家主席要出國訪問，別的國家元首來還要回訪，毛主席出國有困難，可以設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國對其它國家進行訪問。我也不適合當這個副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要設國家主席還是毛主席來當。」[593]林彪的態度也非常明確，應設國家主席，而且毛澤東是不二人選。毛澤東、林彪之間若有不同意見的話，也只能說是毛傾向於不設國家主席。不過毛沒有把話講死，而把這個皮球踢給了林彪，若要設的話，就由林當國家主席。毛的用意當然有試探林的味道，所以林又把皮球踢回毛，認爲只由毛來當國家主席，才名正言順。至於林本人連國家副主席也不當，因爲林的身體不好。吳法憲也指出，林彪從未在他們面前表示過他想當國家主席，吳的感覺是林當不當國家主席是無所謂的。[594]不過據林辦某位秘書透露，1970 年7 月間，毛澤東的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林彪，傳達毛的最新意見，毛認爲新憲法中應保留國家主席的位子，毛表示，他不會要國家主席這個位子，林彪也不要當國家主席，讓董必武（1885-1975）當國家主席，同時再找幾個比較年輕的人當副主席。[595]這種說法，顯示毛澤東不僅不讓林彪當國家主席而且似乎連國家副主席的位子也不打算給林彪。[596]

毛澤東對林彪的不滿從設不設國家主席問題開始逐漸浮出檯面，1970年4月初，毛澤東審閱中央兩報一刊編輯部爲列寧一百周年所寫的紀念文章稿，寫下一大段批語：

關於我的話，刪掉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

[593]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8。

[594]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79。

[595]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122, 233.

[596]齊茂吉，〈林彪與江青交惡之始末〉，《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3，頁 140。

這類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有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597]

毛澤東在稿中刪去的話有：「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598]這些被毛澤東認爲是無用的與引起別人反感而刪去的話，幾乎是人們孰悉的林彪用來讚揚毛澤東的原話。[599]

在這期間吳法憲曾就要不要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尋求周恩來的協助，周恩來最初表示：「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這件事我贊成。」[600]周恩來又指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601]周並要求陳伯達找出中共憲法中有關設國家主席的條文，提出給毛澤東作爲參考，[602]然而毛澤東卻表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603]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夾在其中，左右爲難，[604]不過，周恩來深知毛澤東說一不二的爲人，凡是他所認定的事，別人是很難勸阻的，況且又是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只會自討沒趣， 因此在毛三番兩次公開拒絕之後，周的態度有了改變，不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

---

[597] 毛澤東對周恩來等送審的〈列寧主義，還是帝國主義？–紀念偉大列寧誕生一百週年〉稿的批語，手稿（1970年4月3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59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6。

[59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6。

[600]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83。

[60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頁 386。

[602]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73。

[603] 〈關於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批語〉（1970 年 4 月 12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94。

[60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3。

[605]然而這件事卻成爲後來批陳整風中，陳伯達的大罪狀之一。[606]接下來，爲了紀念八一建軍節，中央兩報一刊準備發表一篇社論，這類的稿件通常都要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最後再由毛澤東審定。然而卻在7月27日，陳伯達與張春橋爲送審稿中的一處提法發生爭執。[607]最初指定起草這份報告的是陳伯達，[608]陳主張把「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句中的「毛主席和」四個字刪掉，理由是自文革以來宣傳中的標準提法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領導、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的提法將會引起外界不必要的議論。張則毫不退讓，力主維持送審稿中的提法不變。[609]對此，主持會議的周恩來不得不出來設法擺平雙方的爭執。爲了弄清事情的原委，他專門作了調查，發現這個新的提法是由張春橋、姚文元（1932-2005）二人提出，周以爲在這場「文字」之爭的背後，不過是大小秀才之間的文人相輕，互不服氣，而沒有馬上領悟到問題並非這樣簡單，實際上是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較勁。更確切的說，是毛爲了在政治上削弱林彪的權勢，暗中指使張、姚造出來的說法。[610]但是周恩來知道此事茲事體大，直接涉及到毛澤東和林彪，最後要由毛本人來定奪。[611]於是，他除了當眾聲明：「這要請示主席」[612]外，又隨即寫信給毛報告此事的來龍去脈，最後表示:「我個人認為以改回為好。究應如何，請

[60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3-284。

[60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 374。

[60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8。

[608]陳伯達在多年後說道：「我不想和張、姚共事。由於我排在起草人名單之首，於是我決定自己來幹。」。陳曉農，《陳伯達遺稿》，頁 113-114 。

[609]〈周恩來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八一社論稿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手稿，1970 年 7 月 28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8。

[61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4-285；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8。

[61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5。

[61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85。

主席決定示知。」[613]由此可看出，周事事以毛的作法爲旨意的處事原則。例如，連周恩來最後病重時，都要寫信向毛澤東報告自己的病情經過，而周也一定要等待毛澤東批准之後，他才肯進手術室。[614]最後，因爲陳伯達在起草過程中，事事把張春橋與姚文元排擠在外，也可能是毛澤東同意張春橋的說法覺得陳伯達這篇稿子太強調「生產力」，[615]在毛主持的會議中，討論姚、張的稿子時，陳伯達趁機反唇相譏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616]陳這一番話，剛好踩到毛的痛腳，毛無法容忍任何人質疑他一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場毛怒氣沖天，痛罵陳一頓，毛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這樣急呢?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你就要報復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在延安時期，你腳踏兩隻船，原來說願意給我當秘書，後來又說願意給張聞天當秘書。一九五〇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腳踏兩隻船。你沒有報告，也沒有經過我的批准，就去見蘇聯領導。是不是看我這條船快要沉了。就趕緊去抓一把？」[617]當時毛已耳聞陳和林彪陣營走的很近，毛對於陳伯達腳踏兩條船的作風極爲反感，毛指責陳的話，講得非常重，不留任何情面。陳聽後噤若寒蟬，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大爲振奮，林彪和吳法憲幾個人感到有些灰溜溜，周恩來則不發

---

[613]〈周恩來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八一社論稿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手稿，1970 年 7 月 28 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8。

[614]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歷史造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我的病情-致毛澤東〉(1970 年 12 月 24)，《周恩來書信選集》，頁 633-634；此外根據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的回憶，周恩來在他的手術治療方案確定後，周都會親筆寫報告，送毛澤東批准，並待毛澤東批准之後，周恩來才肯進手術室。鄒研主編，《周恩來和他的衛士們》，頁 378。

[615]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159-1160。

[616]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注，《陳伯達—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 年），頁 114。

[617]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0。

一語。[618]顯示，毛對陳伯達已極爲不滿，打倒陳只是遲早的問題。[619]於是毛在離開會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決定捨棄了陳伯達的主筆的那份稿子，[620]並在康生主持之下，由張春橋與姚文元兩人匆匆趕出一份稿子。儘管毛澤東已仰賴陳伯達三十年之久，然而此次毛更傾向張、姚兩人的稿子，毛並親自修改好幾次，[621]由此可知毛澤東重視的程度。

毛澤東一開始對陳伯達的這個提法表事無關緊要，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對於這個問題絕非不在意，針對此事，毛對汪東興說：「爭論當中的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嘛！」[622]1970年8月13日下午，中央憲法修改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憲法草稿案，會議上吳法憲與張春橋就草稿一事再次發生爭吵，草案稿序言中有一段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623]張春橋提出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後一句就可以不寫了，另外，

---

[618] 陳伯達回憶毛澤東批判他的話：「毛主席也在會上講了話，說有人在大船將沉的時候來個老鼠搬家。以前，毛主席提到在延安時，張聞天想留住我，我猶豫不決，也說過這話。他此時這樣說，是指我覺得搞運動的路行不通，就走搞生產的路，不能和他同舟共濟。毛主席還說我本性難改，總是看重經濟，說帝國主義的本性不可改變，陳伯達的本性不可改變。」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361；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40-741。

[619]齊茂吉，〈林彪與江青交惡之始末〉,《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3，頁 137。

[620]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283-284。

[621] 毛澤東從 3 月 16 日起見到部分的草稿，一直到大會期間毛還在修改稿子。〈對林彪中共九大報告稿的批語與修改〉(1969 年 3 月-4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11-18。

[622]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年)，頁 22。

[623]〈吳法憲的書面檢討〉(1971 年 4 月 9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9-1570。

張春橋表示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另外，吳法憲以爲抓到了張春橋的把柄，情緒激動地反駁表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澤東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624]事實上，天才地、創造性地這幾個林彪說過的副詞，此刻毛澤東產生反感，吳法憲並不知道張春橋的意見完全是照毛澤東的意思去做的。[625]另外，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和林彪作了一次談話，林彪想就張春橋這個問題說一下，毛澤東說那些都不是張春橋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並說可以說這個問題，但在講話中不要點名張春橋等。[626]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在開幕會上發言說：

> 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憲法的形式把這些固定下來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說是憲法的靈魂，是三十條中間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一條。……這個領導地位，就成為國內國外除極端的反革命份子以外，不能不承認的。……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這點值得我們同志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在我們這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最高的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的事情改變面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值得把腦筋靜下來想

---

[624] 〈吳法憲的書面檢討〉(1971 年 4 月 9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9-1570。

[625] 吳法憲不知道去掉那幾個副詞是毛澤東的意見，也不知道後一句話是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賓波德那拉希時針對赫魯雪夫說的。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69。

[626] 陳曉農編著，《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頁 118；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年)，頁 52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91；丁凱文，〈再論 1970 廬山會議及其影響〉，《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年)，頁 525。

一想，是不是這回事。[627]

雖然林彪有遵守會前和毛澤東的約定，不直接點名批判張春橋，但是林彪在講話中用「他那個中央不同」一句，這個提法，分明是將張春橋歸於與毛澤東不相同的另一個中央無產階級司令部。[628]接著林彪還發表了這樣的談話：「這次憲法修改草案，表現出這樣的特點：就是突出毛王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無產階級專政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毛主席的天才，的他學問，他的實際經驗，不斷地發展出新的東西來。　　……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629]林彪發表談話之後，大家反應熱烈，並引起廣大的迴響，[630]此舉更加引起毛的猜忌，雖然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是事先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的了。[631]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的談話引起廣大迴響，8月24日下午，各組紛紛討論，其中以華北組最爲熱烈，陳伯達在當天會上表示他完全擁護林彪發表的談話：「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有的反革命份子聽說毛主席不當主席，歡喜得跳起來了。」[632]吳法憲也附和：「完全擁護林副主席的講話」[633]，並在會議中念了一段陳伯達選編的〈恩格斯、列寧、

---

[627] 〈林彪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1970年8月23日），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28]丁凱文，〈再論1970廬山會議及其影響〉，《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頁525-526。

[629]〈林彪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上的講話〉（1970年8月23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30]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92。

[631]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93。

[632] 〈陳伯達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言〉（1970年8月24日），宋永毅主編，《中華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33]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796。

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並暗指張春橋批評林彪提出毛澤東是天才的這個說法，一時之間大家紛紛熱烈討論並指責反對「天才論」的人，而且要追查是哪些人反對此說法。[634]隔天，25日〈華北組第二號簡報〉印發全會，簡報中寫道：「大家聽了陳伯達的發言，知道了黨內竟有人否認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這種人是野心家、陰謀家，是極端的反動份子，應該揪出來示眾……鬥倒批臭。」[635]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因而慌張得向毛澤東求救，毛不高興的表示：「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636]毛又說：「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637]毛還衝著林彪說：「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638]毛並指示周恩來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他的指示，因此周恩來又再一次扮演毛澤東傳聲筒角色，再一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換換空氣。」[639]而康生知道毛澤東表態支持之後便大肆批評這次的事件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陳毅跳出來。」[640]而一向善於在政治波浪中生存的周恩來當然順著毛澤東的立場提出批評：「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作了有代表性錯誤的發言，把修改憲法的討論引導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以華北組最為突出。……直到主席召集常委擴大會議之後，才扭轉這一錯誤偏向。」[641]會後周不只一次要吳、陳兩人檢討，並針對陳伯達的檢討稿指出：「在華北組會議上作了煽動性發言，不聽毛主席的意見……引起大家思想混亂，亂講"天才"問題……」[642]。

[634]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796-798。

[635]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 1949-1976》下冊，頁 1019-1020。

[636]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01。

[63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76。

[638]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576。

[639]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02。

[640]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04。

[641]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89。

[64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90。

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起了疑心，現在林彪又在他的眼皮底下揪人，於是先後殺出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摻沙子、甩石頭、挖牆腳，[643]開始逐步肢解林彪集團的派系勢力。毛澤東甩出的的一塊石頭就是針對這場政治風暴中首當其衝的陳伯達所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寫下〈我的一點意見〉批評：

>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紀》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絕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

[643] 毛澤東說：「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頭、挖牆腳、摻沙子。」〈毛澤東在長沙與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蔔占亞和汪東興的談話〉（1971年8月30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絕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644]

這篇文章顯然是明批陳伯達但暗指林彪的不是，周恩來貫徹毛澤東的意圖繼續批判陳伯達：「陳伯達在中央核心內部長期不合作，他的問題遲早要暴露的。」[645]隨後並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的講話中指出：「要好好學習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首先在中央會內部加強團結。」[646]根據吳法憲的說法：「在這次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的一番講話，整個全會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說："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的威信太高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647]接著，毛澤東又甩了一塊石頭，在1971年2月19日批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648]由於黃永勝等三人遲遲不檢討，不難想像，毛澤東當然不滿，於是周恩來於2月19日當天晚上向軍委辦事組傳達了毛澤東當天的批示，並在2月20日呈送報告給毛澤東，向毛澤東承認錯誤。[649]毛澤東對這個報告批示說：「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

[644]〈我的一點意見〉（1970 年 8 月 31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114。

[645]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92。

[646]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92。

[647]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23。

[648]〈關於批陳整風運動重點在批陳的批語〉（1971年2月1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3，頁206。

[6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37-438。

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650]由於毛澤東已說出重話，周恩來見狀馬上約汪東興及軍委辦事組的成員開會，討論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批陳指示。[651]緊接著在2月22日那一天，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四大金剛」的批評，[652]周恩來對「四大金剛」曉以大義，率先做了自我檢討：「在政治上犯路線、方向性錯誤，認識和覺悟是要有一過程的，甚至是痛苦的過程。」[653]在周恩來的引導之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不得不在會議上做檢討。[654]爲了貫徹毛澤東的指示，黃永勝又召集在北京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幹部連夜開了一個會。在這次會議上，黃永勝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接著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也都做了檢討。會後，黃永勝將他們四個人的檢討報告，以書面上呈毛澤東。3月15日，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批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許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655]毛澤東這段批語，特別指出廬山會議這個教訓非常嚴重，就毛澤東的性格來看，在這個問題上，他不會鬆手。[656]雖然在周恩來的帶頭之下，「四大金剛」等人都作了書面檢討報告，但事毛澤東並不買周恩來的帳，繼續抓住這件事作文章，[657]毛一方面對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的檢討批道：「我認

[650] 〈在軍委辦事組關於學習討論毛主席「重點在批陳」指示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71年2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208。

[6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38。

[65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38。

[65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38。

[6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38。

[655]〈對兩報一刊編輯文章《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送審稿的批語〉（1971年3月15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3，頁216。

[656] 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5（2008 年 6 月），頁 188。

[65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12-313。

為寫得很好，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658]毛澤東要「四大金剛」公開檢討，此舉可說一箭雙鵰：既在更大的範圍內把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的問題公諸於眾，又可趁機將火燒向林彪，迫其出來檢討。[659]眼看情勢愈來越不利於林彪，於是周恩來寫信給林彪，送去中共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材料與毛澤東的批示，然而林彪依然不爲所動，仍無出席會議之意。[660]周恩來對於林彪拒不出席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態度既焦急又無奈，周知道林彪的講話事出有因，講話內容大概事先經過了毛澤東，因此現在毛這樣抓住不放，心裡有氣，但是對毛澤東完全信守君臣之道的周恩來看來，君可以不君，臣卻不能不臣，周認爲只要林彪向毛澤東低頭認個錯，服個軟，事情也許就了結了，在周看來林這種硬頂的作法只會更糟。[661]雖然在周恩來的思維中，清楚的明瞭毛澤東只能順不能逆的原則，但是毛澤東想要打倒林彪的意念卻不是能輕易被任何人改變的。也由於廬山上的這個情況，周恩來決定要和林彪集團中的成員拉開距離，[662]並決定轉向有毛澤東撐腰的江青集團，吳法憲就指出：「九大之後，周恩來與康生兩人顯得很親熱，周總理很值得我們學習，善於“見風使舵”。」[663]吳的這一席話可謂一針見血，對周恩來一貫的政治手腕一語道穿。

第三節　周恩來與「九一三事件」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期間，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658] 〈對黃永勝、邱會作、李作鵬的檢討信的批語〉（1971 年 3 月 24 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219。

[65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13。

[66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52。

[6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15。

[662]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19。

[663]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24。

在會前4天，毛澤東批示了四大金剛和葉群的自我批評。[664]不過這五人的書面報告均隻字不提林彪，毛澤東心中自然有數。因此，毛澤東決定將這五人的書面報告及的相關批示，印發給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當材料，同時要求四大金剛在會上作檢討。這次會議的與會者包括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幹部共99人。在當天開幕的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的講話曾指出，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幾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機會，在毛澤東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檢討。[665]顯然，這次會議名義上是批判陳伯達，實質上就是鬥爭這五人。4月29日，周恩來在會議上發表總結講話，這份講稿事前呈送毛澤東批示，經毛澤東同意後，周恩來這麼說：「在廬山會議及其前後，軍委辦事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的錯誤；但錯誤的性質還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同反共份子陳伯達問題的性質根本不同。他們之所以犯這樣嚴重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站錯了立場，走錯了路線。錯誤的政治路線，必然帶來錯誤的組織路線，帶來不正之風，最終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666]對周恩來來說，這些人的錯誤就是沒有站在與毛澤東相同的立場，而這也是最嚴重的錯誤。在整場會議轉入批陳伯達之後，周恩來成為一個大忙人，周連日來同黨內各方人物頻繁交談，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既要勸說點火鬧事的人做出檢討，又要坐重多中央委員的思想轉彎工作，還要分出身來，輪流參加各組的討論，掌握引導會議，防止發言走偏。[667]為此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第一線，並先後發表重要談話，帶頭表態擁護毛批陳的決定，或是逼迫「四大金剛」作檢討。周指出：「陳伯達不守紀律，搞突然襲擊是由來已久的。這個人腳踩兩隻船，特別是欺軟怕硬，過去是靠劉〔少奇〕怕鄧〔小平〕。現在是二陳〔陳伯達、陳毅〕

---

[664] 〈關於黃、吳、葉、李、邱的自我批評的批語〉（1971年4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13，頁226。

[66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52。

[66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54。

[667]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3。

合流了。」[668]不過小心翼翼的周恩來爲了防止在批陳時否定文革，他還特別強調說：「不管出了王〔力〕、關〔鋒〕、戚〔本禹〕、陳伯達，文革小組的歷史作用是不容許抹煞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偉大的功績。」[669]最後，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宣佈黨中央將對陳伯達進行審查，隔天，在周恩來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即成立陳伯達專案組，負責人當然是周恩來本人。[670]由此可看出，不管情勢如何，周恩來始終擁護毛澤東與毛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管陳伯達本人根本無意反毛澤東，[671]陳只是毛澤東步步逼近林彪的一個馬前卒。陳伯達只是一個箭靶子，就如同當年文革之初爲了鬥倒劉少奇而先拿彭真開刀一樣。

對於批陳整風，毛澤東本人從一開始就完全不諱言，而且有意識地在中央領導層吹風。毛在廬山會議結束後返回北京時，在豐台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672]據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毛主席這麼說，使我意是到了陳伯達身後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會辦事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673]吳德的猜測並不無道理，因爲毛澤東在南巡之行就數度點名批判林彪、葉群、與四大金剛，並指出：「這一次的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的可能救的過來，有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

[668] 周恩來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東北組、華北組和中南組的發言，1970 年 9 月 3、4 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3。

[669]周恩來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東北組、華北組和中南組的發言，1970 年 9 月 3、4 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3。

[67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92。

[671]王年一：「說陳伯達反對毛澤東、林彪根本是無稽之談。」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 410。

[672]吳德，〈廬山會議與林彪事件〉，收錄於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155。

[673]吳德，〈廬山會議與林彪事件〉，收錄於安建設編著，《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頁 155。

個，一個可能改，一個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瞿邱白、李立山、羅章龍、王明、張國熹、高岡、饒漱石、彭懷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674]於此可看出毛澤東決心打倒林彪，並把兩人鬥爭上升至路線鬥爭的高度上，[675]這也埋下林彪出走的「九一三事件」之遠因。

這種情況更加深了周恩來維持中共中央高層運作的困難性，有鑒於兩人交惡已經日漸表面化，善於見風使舵的周恩來不動身色的同林彪一派拉開距離，但周也不想完全淪爲毛澤東的打手，對林氏一派窮追猛打，周恩來竭力在毛、林之間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來見機行事，主動向毛澤東批送有關過分宣揚個人崇拜、歪曲歷史的材料，成爲毛手中敲打林彪的石頭。[676]另一方面，周還是想極力修補毛、林兩人之間的關係，周恩來苦心想安排毛澤東與林彪共同出席「五一」紀念日在天安門上觀看煙火的活動，然而毛澤東絲毫不留情面的回答：「我這幾天不出門。」[677]儘管毛澤東與林彪的失和已經趨近於白熱化，善於在政治上左右逢源的周恩來還是暗中給自己留後路，除了在表面上一如往昔的對林彪表示尊重，維護林接班人的形象。[678]周並繼續與林彪在重大問題上互通消息，甚至把毛澤東的病況透露給他，然而這點是毛澤東特別禁止的，李志綏曾爲此質疑周恩來，不過周恩來卻解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能不報告呢？」[679]充分說明周恩來兩方都不得罪的意圖。不過，直到林彪出走之後，

[674]〈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既要〉（1970 年 8 月-9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245-246。

[675]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5，頁 205。

[67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17。

[677]〈對周恩來批陳整風匯報會議請試報告與批語〉（1971 年 4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230。

[67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17。

[679]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5 年 2 月），頁 516。

周恩來唯恐他洩漏毛澤東病況的事跡敗露，周還特地向李志綏打招呼說：「李院長，主席的身體健康情況，我們可都沒有向林彪講過。這點我們還是有警惕的。」[680]李志綏認爲周恩來是在警告他，不能告訴毛，周向林報告了毛的健康狀況。[681]周恩來並寫了一封信告訴毛澤東，他與李志綏一樣都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健康，[682]周似乎是怕毛澤東起疑心。周恩來一直不敢違逆毛澤東的意願，在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亦保持自我批評的作風，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揭幕當天的全體會議上，周恩來針對辦事組批陳不力的問題，主動承擔了自己督促、幫助不夠的責任。在九屆二中全會的東北組會議上，周恩來在肯定林彪講話的同時，強調：「要勿忘過去，警惕現在，教育後代。過去犯過錯誤的不要再犯，要夾著尾巴做人，發現錯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學生，……」[683]周恩來這種作風確實使他始終立於不敗之地。也因此周恩來一直強調：「林副主席聽了毛主席話，並沒有在報告裡再強調設國家主席的問題，還提到了我們黨的歷史證明跟著毛主席就勝利，不聽毛主席的話就犯錯誤。」[684]周恩來引用林彪說過的話意圖非常明顯，不過就是想告訴林彪「不聽毛主席的話就犯錯誤」。

1971年8月14日開始，毛澤東冒著酷暑展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見地方黨政軍大員吹風打招呼，毛澤東並在談話中大動作直接點名批判林彪。[685]因此周恩來

---

[68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516-517。

[68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517。

[682]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主席，您的健康，大家都在關懷。治療的情況，我和東興、耀祠、李志綏同志常商酌。」〈大家都在關心主席的健康-致毛澤東〉(1972年1月25)，《周恩來書信選集》，頁614。

[68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388。

[684] 周恩來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上的講話，1971年4月15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18。

[685]毛澤東指出：「這一次的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有的可能救的過來，有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可能改，一個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瞿邱白、李立山、羅章龍、王明、張國燾、

適時在8月間作出重大的表態，針對一幅準備對外發表，畫有毛澤東、林彪在一起的題爲《遵義會議》的油畫，批示：「這是違反歷史事實，應予否定。」[686]周恩來向來「見風使舵」，見毛澤東大動作批評林彪，隨即跟上毛的腳步。至於中共官方文獻指稱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個武裝暴亂計劃時，曾特地引用南唐後主李煜詞中「幾曾識干戈」、「垂淚對宮娥」[687]的句子警告林立果，就是因爲李後主不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國。林彪強調這是前車之鑑，不能束手待斃。[688]當然這種手法可以坐實林彪的反毛罪名，但是這畢竟不是史實。[689]至於林彪到底有沒有交代他的兒子林立果搞出〈五七一工程紀要〉[690]，並且以聯合艦隊爲班底發動反毛政變，不是單單憑空想像再加上理所當然的臆測，即可構陷林彪入罪。[691]到目前爲止，並無證據證明林彪是否看過這份〈紀要〉、參與此事，也無任何證據證明這一紀要是林彪授意林立果起草的。[692]而且〈五七一工程紀要〉更像是一篇批毛的檄文，但缺少作爲武裝政變計畫所應具有的周密實施細節，它只提出了一個籠統粗糙的設想。[693]

高岡、饒漱石、彭懷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既要〉（1970 年 8 月-9 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頁 245-246。

[68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78。

[687] 李煜，〈破陣子〉，收錄於龍沐勛編選、卓清芬注說，《唐宋名家詞選》（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 10 月），頁 108。

[68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頁10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40。

[689]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5，頁 198。

[690]〈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中發[1972]4號，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691]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5，頁 198-199。

[692]丁凱文，〈重評五七一工程紀要〉，《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頁 625-634。

[69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21。

在毛澤東進行南巡之前，葉群爲了檢查乳腺癌，由北戴河返回北京，當時周恩來親自打電話至毛家灣時，周恩來獲悉葉群在會客，馬上就問接電話的秘書宋德金是哪些客人。[694]宋德金意識到周恩來當時非常關注林彪、葉群的活動，顯示毛澤東、周恩來正密切注意林彪一家的一言一行及一舉一動。事實上，周恩來對於毛澤東準備打倒林彪一事，已心領神會。這時候，周恩來「**已預感到一場暴風雨將要來臨**」[695]。8月9日至12日，周恩來廣州之行前，特地致信毛澤東：「**主席如有急事，可經吳旭君同志以保密電話告我，或告（王）海容轉告。**」[696]因此，毛澤東在南巡期間，爲了讓周恩來緊跟形勢，交待陪同他一起巡視的汪東興，將經他閱改過的汪東興和華國鋒（1921-）追記他沿途講話的內容稿，在9月3日那天專送周恩來處，9月4日周恩來收到此件。[697]緊接著在9月11日，奉毛澤東之命前往長沙聽毛談話後返回北京的華國鋒，又專門傳達了相關的訊息給周恩來。[698]顯示，毛澤東在南巡期間不斷和周恩來通氣，正加緊整肅林彪的部署。[699]在毛澤東南巡連夜轉移專列的當天，也就是1971年9月8日這一天，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林彪親筆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700]決定發動反毛的武裝政變。9月12日晚十許，周恩來接獲林彪之女林立衡所報林彪等人欲出逃的情況，又接連接到電話，瞭解到林彪一夥人的不尋常舉動，當即指示北戴河警衛部密切注意隨時報告，並指示吳法憲調查停在山海關機場的一架三叉戟飛機。[701]當晚23時，周恩來突然打電話問吳法憲，一再詢問吳是否調了飛機到山海關機場。

---

[694]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百年潮》，期 9（2002 年），頁 58。

[695]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頁1035。

[69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474。

[6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78。

[69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0。

[699]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8（2009 年 12 月），頁 169。

[700]《人民日報》，1980 年 11 月 21 日，版 3。

[701]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862。

由於在平時任何專機的調動，都必須經吳批准，而這次三叉戟專機的調動，吳竟然不知情。[702]這點實在耐人尋味，無怪乎周恩來的祕書會這麼說：「往往發生了重大事件連主管部長還不知道，總理卻先知道了。」[703]而且根據周的秘書紀東的回憶，周恩來那天一反常態的守在電話機旁邊。[704]隨後，吳法憲立即打電話給專門負責專機勤務的空34師，詢問師長時念堂有沒有調飛機到山海關機場。出乎吳的意料，時念堂回答是副參謀長胡萍調去的。吳馬上打電話給胡萍確認此事，胡萍稱是改裝好的三叉戟飛機試飛山海關，於是吳下令胡萍立即將專機調回北京。過了5分鐘，胡萍回電話給吳說，飛機引擎故障，正在檢修。吳隨即交代胡萍，飛機修好了以後立即回北京。緊接著，吳馬上將相關的狀況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下達指示飛機返航時不准帶任何人進入北京。吳立即將周恩來的指示傳達給胡萍。不一會兒，周恩來又打電話給吳說，葉群打電話來，說林彪要去大連。周就問葉是否有調飛機，葉群說：還沒有調飛機，準備等一會兒給吳法憲打電話，要吳調飛機。周恩來交代他，葉群很快會打電話給他，要他先不要答應葉群，就說要請示周。不久，葉群果然打電話給他，他告訴葉群，他不能決定調動飛機的事情，必須請示周恩來。[705]不僅如此，老練的周恩來，又作了另一手安排，立即指示李作鵬下令山海關機場的飛機不能動，要動須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一起下令才能放飛。[706] 周恩來這招等於是按了一個保險栓，萬一吳法憲走漏風聲，即使黃永勝、李作鵬放水，只要周恩來一個人不同意，這架專機照樣不能起飛。[707]周並指示黃永勝所有停在山海關機場的專機都不能動。當晚深夜23時30分周恩來親自打電會給葉群，了解林彪的狀況。[708]顯然，周恩來心知北戴河出

---

[702]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2。

[703]程華主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 3 月)，頁 225。

[704]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122。

[705]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2-863。

[70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

[707]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8(2009 年 12 月)，頁 181。

[708]《周恩來傳》中記載：「在證實山海關機場確有一架專機後，周恩來親自打電話向葉群詢問，

現異狀，再加上周知道毛澤東打倒林彪的心意已定，周當然提高警覺，周決定親自打電話給葉群一探虛實。[709]深富政治鬥爭經驗的周恩來與葉群在電話交談中，發覺葉群說謊，他才斷定北戴河確實有問題，林彪可能要跑。[710]於是周順勢而為，對葉群表示，他準備到北戴河來看林彪。[711] 葉群一聽，感到心虛，立即打電話給吳法憲，不料周恩來已在事前交代吳法憲，調動飛機必須經由他的同意。吳法憲在與葉群通完電話，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之後，立即出發至西郊機場，進一步調查飛機調動的問題，此時是9月13日凌晨零點左右，不料就在吳法憲抵達西郊機場後，隨即接到周恩來的來電，周告訴吳，林彪等人已經乘車離開北戴河，車正往山海關機場方向開去，臨走時還開槍打傷了警衛人員，吳法憲估計林等人到機場還需個把小時，於是交代秘書打電話給三叉戟飛行員潘景寅，吳對潘曉以大義，告訴潘要忠於毛澤東，不管任何人的命令，飛機都不能起飛，潘景寅對此也是滿口答應，但是，就在吳法憲向周恩來回報此事時，周卻告訴吳，林彪等人已經上了飛機，飛機並已經起飛，這時是9月13日凌晨32分。[712]據吳法憲回憶指出，256號專機強行起飛後，周恩來交待他注意專機的航向及降落地點，都要及時報告，周恩來準備去和林彪談話。吳法憲在西郊機場的雷達幕前密切注意專機的動向，

並且提出打算到北戴河來見林彪。這時已是深夜二十三時三十分。」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冊，頁 1039；二十三時半，周恩來與葉群通電話，葉群稱林彪要「動一動」，是「天上動」，周恩來以夜航不安全為由加以勸阻。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

[709]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頁 176。

[710]于南，〈驚心動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澤東、周恩來機智處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實〉，《黨的文獻》，頁 90。

[711]空34師師長時念堂回憶，當時吳法憲在西郊機場指示他說：「周總理讓馬上派一架伊爾—18飛機飛往山海關！」時念堂立刻落實，調派機組人員及兩架伊爾—18飛機待命。

時念堂口述、戎志整理，〈專機師師長回憶“9・13”之夜〉，《中華兒女》（國內版），期 6（2001 年），頁 84。

[712]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

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713]這裡有一個疑點，既然周恩來對林彪的行蹤，瞭若指掌，爲何周不直接下令，直接攔阻林彪等人呢？反而放手讓林彪等人出走？而根據周恩來衛士高振普的回憶，也可知道周恩來對林彪等人當晚的行蹤聊若指掌，對於此事高說：「中央警衛團副大隊長于仁堂見到林彪等人關上機艙門，發動飛機的情景，急步跑到調度室，正遇到機場的童副參謀長。于請童阻止飛機起飛，童回答已經接到總裡的電話指示，飛機已滑向跑道，擋不住了，只好採取燈火控制的辦法。於是，于向天空連開三槍，機場聞聲關掉燈光，頓時一片黑暗。飛機在黑暗中，滑到起飛位置，於9月13日零時23分向西北方飛去。」[714]不過周恩來事先卻沒有任何作爲。反之，周恩來只是在林彪座機起飛後，交代吳法憲注意飛機的航向，並隨時向他報告。[715]這其中的疑問頗令人費解。

在這段時間內，不論周恩來或者是汪東興等人，任何一個人只要一通電話打給山海關機場的領導幹部，完全可以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扣住飛機，[716]然而周卻是等到林的256專機起飛後才發布全國禁空令。[717]爲何周不事先就發佈禁空令呢？周恩來只透過無線電呼叫要林彪等人飛回來，不論他們降落在何地：「我周恩來都到機場去接他。」[718]在這過程中周恩來隨時對毛澤東匯報所有的情況，事事請示毛澤東，尤其當吳法憲請示是否要派殲擊機攔截專機時，周恩來表示要請示毛澤東，結果毛澤東並不同意。[719]唯有毛澤東同意周才會執行，關鍵在於毛

---

[713]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3。

[714]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122。

[715]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3。

[716]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8，頁 196。

[717]中共中央文獻室主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

[7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

[719]周恩來到毛澤東處匯報林彪出走的狀況，恰巧吳法憲來電請示是否攔截林彪座機，毛澤東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1；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3-864。

澤東的態度，這整場事件中周恩來是前臺執行者，而毛澤東則是幕後操縱者。[720]再者，周恩來針對他當時沒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機時說：「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軍隊的副統帥，我僅是一個政治局常委，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怎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隊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交待呢？」[721]周恩來這番話似是而非，當時吳法憲僅請示是否要派殲擊機攔截，吳並未主張下令殲擊機或地空導彈擊落專機，並不存在「打下來」的問題。[722]以周恩來謹小慎微，絲毫不敢越俎代庖的一貫作風來看，即使未及時請示毛澤東，也會事後立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不點頭的話，周恩來就不會執行，也唯有周恩來能忠實地落實毛澤東的意圖。[723]可說毛、周二人直接或間接促成了林彪的出走。不久，256號專機飛越中蒙邊界上空，吳法憲隨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透過電話指示吳法憲，絕不准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他們二人都要掉腦袋。[724] 在確定林彪專機出走之後，周恩來隨即要求林彪身邊的幾員大將，包括黃、吳、李、邱等人都留在人民大會堂，不許他們任何人離開。[725]周恩來並親自打電話給十一大軍區和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告訴他們林彪出走的情形，並要求各地聽從黨中央、毛澤東得指揮，[726]周恩來此舉，明顯為安定軍心。後來，256號專機緊急迫降失敗，並發生劇烈的爆炸，機上9人包括林彪在內無一倖免。林彪墜機的消息馬上傳回北京，已經數十小時未闔眼

---

[72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43。

[721]轉引自于南，〈關於林彪事件若干歷史問題的考察〉，收錄於熊華源、安建設編，《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193。

[722]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8，頁 199。

[723]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8，頁 181。

[724]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64。

[725] 根據 9 月 12 日到 9 月 13 日在周恩來身邊執勤的衛士喬金旺的回憶，周恩來確定林彪出走後，隨即隨即要求說中央隨時準備開會，要林彪身邊的幾員大將，包括黃、吳、李、邱等人都留在人民大會堂，不許他們任何人離開。鄒研主編，《周恩來和他的衛士們》，頁 334-335。

[7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2。

的周恩來聽到這個消息頓時睡意全消，長長吁了一口氣說：「你看，摔死了，摔死了。」[727]林彪的死似乎令周恩來鬆了一口氣。[728]不僅如此，周恩來在確定林彪確定墜機死亡以後，周又說：「這樣的下場很好，解決了大問題。」[729]隨後，周恩來疾步趕往毛澤東得住處，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周恩來還握著毛澤東的手說：「請主席放心，您回去休息吧。」[730]周恩來握住毛的手彷彿在安慰毛，也同時在安慰自己，最大的危機已解除。

雖然周恩來此時已超過五十小時沒有闔眼休息了，周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隨即展開「九一三事件」的緊急情況的妥善安排。[731]9月16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宣布林彪叛逃的官方說法，周並指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按照正確路線和政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犯了路綫錯誤的好人，絕大多數是可以回到正確路線方面來的」、「跟著林彪走絕路得只是極個別的」、「中央號召全黨同志首先是高級幹部，同林彪畫清界線。中央對於堅決同林彪畫清界線的同志，不論他過去是否受林彪影響，是否犯過錯誤，都是同樣愛護而不輕易懷疑的。」[732]以上的談話都是經周恩來修改並補充過，[733]顯而易見周對此談話的重要性。爲何周恩來這麼重視此談話，根據李志綏的回憶或許可以找到答案，因爲，在李志綏的眼中：「周恩來其實和林彪關係也很密切。」[734]李志綏還透露，汪東興曾告訴他，汪事後在搜查林彪住宅時，搜到許多

[727]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6月），頁96。

[728]「九一三事件」之後，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神采奕奕，笑容滿面。」。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24。

[729]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516 。

[730]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頁 97。

[731]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頁 99。

[7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3。

[73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4。

[734]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516 。

鄧穎超、周恩來和林彪與葉群的合照，汪親自將照片拿給鄧穎超，鄧還一再向汪表示感謝。[735]因此，周恩來此番與林彪畫清界線的談話，自保的成分居多。9月21日，周恩來隨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設一林彪案的專案工作小組，周負責掌管和整理有關林彪案的全部案件材料。[736]周恩來並親自寫信要求李德生與紀登奎協助調查涉及林彪事件相關人等的罪刑。[737] 周恩來似乎急著處理林彪事件。另外，還一件事值得一提，根據周恩來專機機長張瑞靄的回憶，林彪事件之後，周變得「格外小心謹慎」[738]，10月時，專機送衣索匹亞皇帝飛廣州時，周恩來在飛機上，反覆問機組人員：「飛機檢查了嗎？試飛了嗎？」[739]飛過長江時，周又不信機長報告，說那不像長江，直到機長拿著的地圖親自指給周恩來看，周總算才放下心。[740]這裡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為何周恩來變得「格外小心謹慎」？由於時間點恰巧發生在林彪事件之後，不知這其中是否跟林彪墜機有關？由於目前尚無文獻可證明，針對這點還需存疑待證。

「林彪事件」後不到一個月，十月三日中共中央下令撤銷軍委辦事組，並外成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741]「二月逆流」後，葉劍英在周恩來力保下度過難關。林彪墜機身亡後，在

---

[73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517 。

[73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484。

[737] 周恩來在信中寫道：「德生、登魁同志，王維國、陳勵耘兩人已從上海解往南京。我以告知許世友同志，將從軍委總政治部調兩位熟悉空軍情形的人去南京協助軍區審查王、陳兩人錯誤和罪刑。」王維國，陳勵耘兩人當時都被中共官方認定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許世友為當時解放軍南京軍區司令員。〈派人協助審查他們的罪行-致李德生、紀登魁〉（1971 年 9 月 21），《周恩來書信選集》，頁 610-611。

[738]張瑞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11 月），頁 261。

[739]張瑞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頁 261。

[740]張瑞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頁 261-262。

[741]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紀（1927-1987）》（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8 年 12 月），頁 649。

周恩來的安排下，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742]周恩來進一步掌握了軍隊。此後，葉劍英、徐向前、劉伯成、聶榮臻這些元帥重新得勢，這幾位元帥正是解放軍中實力將領的代表人物，也是擁護周恩來的基本力量。[743]1973 年 8 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開得十大上所產生的中央委員，軍方所佔的席次明顯下降，職業軍人在中央委員會所佔比例是 45%左右[744]。與九大比較起來，職業軍人在中央委員中下降了 13%左右。未能再度蟬聯者大部分係因「林彪事件」之故而被逐出中央委員會。[745]然而，這批重新得勢的老帥們不僅是毛澤東的擁護者，也是周恩來的支持者。[746]在「林彪事件」中文革勢力元氣大傷，江青集團孤立無援，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指示下趁機解放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其中包括鄧小平。於此同時，毛澤東重施故技，玩弄兩手策略，縱容江青集團再批林批孔運動的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然而是得其反，反而助長周恩來的政治聲勢，周恩來無疑已經成爲實質的魅力領袖。而毛澤東這位標準的魅力領袖，在「林彪事件」之後，崇拜毛這股宗教式的狂熱情緒，已然退潮，毛澤東在黨內外的聲望一落千丈，大多數的黨員幹部對於毛澤東是畏懼多於敬仰，反知周恩來卻成爲大陸民心可望撥亂返治的偶像，這是毛澤東史料未及的轉變。[747]因此「林彪事件」後最大的贏家應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748]

[7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 356。

[743]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頁 275。

[744] Harry Harding,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05.

[745]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頁 275。

[746]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頁 276。

[747]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頁 277-278。

[748]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與衝突 1954-1971》，頁 278。

第五章 結論

周恩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周密細緻、扎實穩妥」爲人稱道，周恩來日理萬機，而且他對瑣事異常的注意，但是他窮其一生只能爲「宰相」，而無法成爲「帥才」，[749]早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蘇聯的總理史達林就曾經對著中共代表團說過：「**你們將來一建國，現成就有一個總理，周恩來**」[750]，似乎註定周恩來天生當大管家的命。周恩來自己似乎也知道，自己無法成爲「帥才」，他就曾經說過自己不能成爲帥才這種話，[751]然而也是因爲周恩來凡事「舉輕若重」，無法「舉重若輕」，才有辦法擔任中國七億人的大管家，[752]毛澤東就曾經說過周恩來「**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753]然而也有人批評周恩來「明哲保身，勇氣不足」[754]，才選擇待在毛澤東身邊，而成爲毛最得力的政治助手。不過這跟周恩來本身的性格或許有關。一直以來周恩來對開國帝王秦始皇、漢高祖毫無欣羨之情，只鍾情於協助漢高祖打下天下，運籌帷幄的大軍師一張良，[755]周恩來曾經在參觀張良廟時說道，張良是個明辨是非，通曉事理的人，張明白，在功勳與名利之間，爲人臣子是難以長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勞最大的三個人韓信被殺，蕭何被拘，只有張良把榮譽利祿拋於腦後做了「神仙」。張採取這種明哲保身的態度，是客觀情境、環境等各種原因決定的。[756]周並在屬下面前大力稱讚張良這樣做正是他的聰明智慧所在，[757]也或許因爲周恩來欣賞張良，才會甘心成爲毛澤

---

[749]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6-7。

[750]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12。

[751]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

[752]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6-7。

[753]〈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紀要〉（1973 年 7 月 4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54]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

[755]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16-17。

[756]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頁 17。

[757]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17。

東的左右手，協助他打天下，並以明哲保身爲他一貫的政治哲學。

不過周恩來的個性中充滿矛盾性與雙重性，對於周恩來不當一把手—「帥」，不當第二把手—「接班人」，甘願當第三把手—「宰相」，有人議論他是「偉大的謙虛」[758]，同樣也有人道他是「明哲保身、處世精明」[759]。雖然幾十年清一色的爲尊者諱的宣傳中，周恩來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一塵不染、高風亮節的。[760]許多論述也有意無意掩飾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主導地位，而將江青、林彪、四人幫等人打成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毛澤東反倒成爲糾正極左思潮的人物，這就根本顛倒了事情的本來面目。[761]而周恩來、陶鑄（1908-1969）、陳毅（1901-1972）、葉劍英（1897-1986）、譚震林（1902-1983）等人在文革中曾有過多次對文革的批評，努力糾正一些具體的錯誤，但在文革的進程中，他們在很多時候也是看不清形勢，他們都曾努力緊跟毛澤東，也說過許多錯話，幹過許多錯事，整過許多好人，對文革造成的民族災難，他們也應負有一定的歷史責任。[762]而中共的許多冤案都與周恩來有關，周恩來知情卻不敢阻攔。[763]

如果離開了周恩來，毛澤東在準備發動文革時和在開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難說能夠貫徹下去。而周恩來能夠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764]

---

[758]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759]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760]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6(2009 年 3 月)，頁 4。

[761]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 月），794。

[762]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頁 794。

[763]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72。

[764]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另一原因在於，周恩來自我檢討的功力。[765]當「五一六分子」被打成「反周分子」，也是因爲毛澤東體認到，要在內戰中繼續保持國家運轉，周恩來是不可或缺的人物。[766]就連外國評論家也這麼說道：「在毛澤東的理想主義與國民經濟的實際需要之間，能搞出一個行之有效的折衷方案。周恩來這種能力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767]如果說毛澤東是海洋，那麼周恩來便是海岸，周不時抵禦著海洋上升起的巨浪，但又一刻也不離開海洋。[768]毛澤東也深深了解周恩來在政治上「謙虛有餘，直言不足」的弱點。[769]另外，周恩來善於辭令，不輕易露口說真話，英國的蒙哥馬利將軍（**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曾經說，他和周恩來相晤，周恩來講話明明是假的，但是聽來非常入耳。[770]相比之下，江青的沖衝殺殺更多是在輿論方面，周恩來則是把毛的思想落實在行動上。例如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份的「楊、余、傅」事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於天下，但是從已經披露的部分事實仍然可以看出周恩來在落實毛澤東部署時起了重要的作用。[771]

青年時代的周恩來曾經發表過幾篇與列寧相關的文章，周說道：「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772]周恩來又寫道：「列寧真可愛，他是無孔不鑽，只要於共產主義將來的發展有力，一切全可

[765]中共歷史上所謂的路線鬥爭，從五大之後都與周恩來有關，周恩來無論理不理解，總是衝鋒在前，犯了錯誤，周總是搶先一步檢討自己，在許多次權力鬥爭中，無數的中共黨員做了冤鬼，而周恩來屹立不倒，原因就是如此。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68。

[766]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246。

[767]方矩成，《西方人看周恩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9 年），頁 144；346。

[768] 韓素音著、 張連康譯，《周恩來與現代中國：1898-1976》，頁442。

[769]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3。

[770]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67。

[771]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

[772]周恩來，《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62。

犧牲，一切輿論就可不顧。」[773]周恩來又爲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解釋說：「列寧此舉，可謂通權達變。」[774]因此司馬璐認爲周恩來對列寧的個人崇拜有三：一是列寧的暴力革命；二是列寧的不擇手段奪權；三是列寧的「通權達變」，換言之，就是策略。這是周恩來年輕時候的心理跡象，但是從後來的歷程，亦可知其影響不可忽視。[775]而歷史真相是掩蓋不了的，周恩來在文革時擔任中央專案審查組的總負責人，同時他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做爲中共中央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歷史的情況，因此文革中不少大小冤案錯案周恩來都脫不了干係，周更應負起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周都直接或間接分管過，並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甚至擬定結論，周恩來不僅掛名分管其中的一些專案，還多次批示，例如在彭德懷專案與賀龍專案中，周就寫下許多口氣嚴厲的批語，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因此周恩來對這些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776]不僅如此，在文革期間周恩來大小事都管，周還跨足新聞界，周不僅爲新聞工作指明方向、講清原則，並且親自爲記者改稿，可說是新華社的總編輯。[777]「九大」之後周恩來成爲名副其實的中共黨和國家日常工作的領導者，在毛澤東確定的路線內，周恩來又是執行中的決策人，因此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說是操之在毛，成之在周。

鄧小平也曾針對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的作用這方面的討論發表他的看法，一方面鄧認爲如果沒有周恩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糕，但是另一方面鄧也認爲如果不是周恩來的緣故，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那麼久，[778]鄧小平的一席話可

---

[773]周恩來，《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頁 73。

[774]周恩來，《周恩來同志旅歐文集續編》，頁 81。

[775]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63。

[77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184。

[777]江山，〈在晚年周恩來身邊採訪〉，《百年朝》，期 3（2009 年 3 月），頁 28。

[778]高文謙訪問紀登奎談話紀錄，轉引至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8-209。

謂一針見血，點出了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一方面減輕災難，但另一方面又延伸了災難。而許多時候，周恩來的所作所爲是爲了自保，周有些行動或許是違背他自己的心意，例如，周原本並不喜歡劉少奇，只是因爲劉當時是國家主席，周必須給他應有的尊重。[779]後來情勢轉變，周便加入批判劉少奇的行動，有人認爲周不這麼做，二十四小時之內他或許就會被擰下台，[780]但是追根究柢，周恩來所有的作爲都是爲了保護自己，免於被轟下台的命運。後來林彪集團與江青領軍的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奪權之戰，周恩來也是「跨在中間，兩面調合」[781]。對於「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是贊成和擁護的，因爲周恩來認爲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自然發展的結果，換句話說，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在內容上與周恩來一貫強調的思想改造有某種相通性。文革前，周恩來也提到對群眾運動的支持。種種證據顯示，周恩來最終沒能從根本上糾正「文革」的錯誤，而周恩來對「文革」的態度既是被動接受的，也是擁護和贊成的。[782]周恩來從來不曾根本上反對文革，周的緩和作用只能減輕局部的、暫時的痛苦，周支持毛造成的傷害遠大於他減少的損失。[783]

根據邱會作的回憶，「九大」前後是周恩來權力轉換的分水嶺，周集權一身，文化大革命可說「謀事在毛，成是在周」。而周恩來「成事」不能泛指文革十年，應當是他「九大」之後真實的寫照。[784]根據邱會作回憶「九大」前後周恩來對江

[779]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 133。

[780]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頁 135。

[781]根據李志綏的回憶：「中共九大之後，中央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親信，周恩來則跨在中間，兩面調合。」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89-490 。

[782]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頁 51。

[783]金鍾，〈忠君思想與天下大亂—敬覆有關評周的幾個問題〉，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78。

[784]程光，〈1970 年廬山會議背景研究〉，收錄於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頁 614。

青的態度，約略可以看出周恩的行事作風，「九大」之後，對於江青周不再事事退讓。關於周恩來的一貫作風，司馬璐更清楚的指出：「他是最忠誠的共產黨員，也是最會看風使舵的共產黨員。他是最有人情味的共產黨員，也是最殘忍的共產黨員。在中共歷次殘酷的黨內鬥爭中，他都是主要角色。他會放火，也會救火；他放火時別人看不到他，他救火時別人覺得他做了好事。他的觀音和如來佛的外貌，與心狠手辣的鐵石心腸是常人所不能具備的。」、「周恩來永遠對人溫文有禮，他的政敵很難從他的講話中抓到口實。他是黨內任何一個路線最狂熱的追隨者，也是最快的自我檢討者，他能上能下，左右逢源，八面玲瓏。」[785]

在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周恩來常常是走在別人前面的。[786]周恩來在1966 年 5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曾宣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787]而根據王力的回憶也可以推斷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那篇「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788]公報是周恩來主持搞的，[789]同年 8 月，周恩來又推波助瀾，周在清華大學萬人大會上講：「毛澤東思想是從群眾中來的，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來，發

---

[785]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324。

[786]小夏，〈周恩來在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記憶》電子版，期 12（2009 年 1 月），頁 13。

[787]〈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 年 5 月 21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年）。

[788] 〈公報〉中明確宣佈：「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1966 年 8 月 1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8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41。

揮起來，成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790]接續這樣的態勢，於同年 9 月 26 日，周恩來說道：「林彪同志說的很對，毛主席是列寧以後的二十世紀最偉大天才」，[791]到 11 月份，在周恩來的眼裡，毛澤東的地位更遠勝史達林，周指出：「世界上只有列寧，毛主席這樣的天才。這樣的領袖不多見，史達林問題不少，當然功大於過，三七開」[792]此類吹捧毛澤東的語言，在周恩來的文革講話中可說是不勝枚舉。尼克森（Richard Nixon）就講過這麼一句話：「周恩來總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個人。」[793]不僅如此，周恩來也非常了解毛澤東，在周同毛數十年共事數十載的經驗中總結出，凡事毛澤東只畫圈的文件都要小心處理，毛只畫圈並不等同於他同意，只有批示「很好」或類似的字眼的詞句，才是真心贊同某事；雖然表示贊同，卻不那麼情願，毛只會批示「照發」；如果毛只是在文稿附件上印有自己名子的地方畫個圈，那只是意味他讀過了，並不準備否決它。[794]

周恩來在政治上對毛澤東的隱忍屈從和幫襯迎合一直是最爲人詬病之處，周恩來對毛澤東處處小心謹慎，唯恐不合毛的意見，[795]周恩來交代秘書只要毛澤東找他時無論他在做什麼事，都要第一個向他報告。[796]因此在林彪眼中，周恩來充

---

[790]〈周恩來在清華萬人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8 月 2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91]〈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大會上的講話〉(1966 年 9 月 26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92] 〈周恩來接見中國科學院串聯隊時的講話〉(1966 年 11 月 12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

[793]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黨的文獻》，期 12（1993 年），頁 29。

[794]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1051-1052；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48。。

[79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90 。

[796]程華主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頁 225。

其量也不過是個「老當差」[797]。也因周恩來對毛澤東事事屈從退讓，逢君之惡，毛才會更加一意孤行，爲所欲爲，故周恩來實乃毛澤東禍國殃民的元兇。[798]無論是在文革發動時的羅瑞卿事件，還是文革中的「楊、余、傅」事件，還是後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來都堅決地貫徹了毛澤東的決策，可謂忠心耿耿，日月可鑒。[799]1958 年之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人都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做出巨大貢獻，其中，林彪已經被批倒，劉少奇在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論及，爲有周恩來還被描繪成事一直對個人崇拜風氣進行批評、抵制、修正，但是透過歷史的審視，周恩來在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方面是不亞於劉、林等人的。[800]

九一三事件之後，根據吳法憲的回憶：「周恩來神采奕奕，笑容滿面。」[801]周恩來對林彪事件鬆了一口氣，也顯示周恩來一如往常，總是堅定不移的站在毛澤東這邊，正如《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所言：「周恩來在審時度勢後，非常清楚雙方的實力懸殊，林彪顯然不是對手。在這種情況下，從來不站在失敗者一邊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澤東一邊。周選擇跟毛走，而不幫助在治國方針上和他政見相同的林彪，當然是和他一貫"西瓜傍大邊"的為人有關，同時也是他內心深處為臣侍君之道的心態作祟，想為主分憂，在政治上經受這一考驗，保住自己的晚節。」[802]而對周恩來說，雖然他的治國理念常常與毛澤東相左，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數次鬥爭之中，周恩來也數度與毛有不同的意見，不過周恩來均會選擇遵照毛澤東的旨意辦事，成爲毛澤東旨意最忠實的執行者、爲毛意見最忠實的傳達者，就如同《毛澤東最後革命》的作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談到周恩

[797]根據李志綏的回憶，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恩來：「像個老當差的，不管是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為命是從。」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 490 。

[79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208。

[799]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下）〉，《記憶》電子版，期 16，頁 5。

[800]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頁 819-820。

[801]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頁 824。

[80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38。

來的作用中所說道：「直到今天，周總理仍然在中國飽受讚揚，因為他減少了文革對於個人和國家的衝擊。但是，從林彪事件後緩慢的平反過程來看，顯然是毛主動提出、周負責執行的。在少數人們能知道細節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終裁定。沒有證據表明周在這一領域獨力扮演過重要的角色。」[803]王力被釋放之後針對此事說道：「打倒人的罪狀都歸毛澤東，保人的功勞都歸周總理，這不符合事實。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不能把毛澤東與周恩來分開，一個壞人、一個好人;一個頭腦不清醒、一個頭腦清醒;一個錯誤、一個正確。」[804]

一直以來，毛澤東感懷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周恩來則不看秦、漢、唐歷代盛朝的皇帝，他只看張良、蕭何、諸葛亮，誰也無法真正理解其中真正的含意，也無人能夠真正說清闡明。[805]而金沖及認爲：「毛澤東是不是光拿大主意而對具體工作就不過問？不是的。毛澤東對他認為在全域中有決定意義的一些具體環節通常也抓得非常緊、非常細。他不是說“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嗎？在他的前期尤其是如此。反過來，周恩來也決不是一個只能起執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個戰略家、一個有著重大決策能力的人。……說毛澤東是決策者，周恩來是執行者，一般說可以，但不能說死，只是相對而論的。」[806]依照金沖及的說法，周恩來並非只是一位侷限於「執行」的人。司馬璐則爲毛、周二人的關係作一註解：「毛澤東的江洋大盜作風往往面臨絕處，周恩來的白面書生偽善，又往往能使毛絕處逢生。毛周之間，一個武生，一個花旦，互相搭配而又互相纏鬥，他們關係是中

[803]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 350。

[804]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頁 922。

[805]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頁 20。

[806]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黨的文獻》，期 12，頁 29。

共黨史上最大的禁區。」、「毛善用蠻狠，一語定局；周功於心計；毛敢無法無天，周善用兩手策略；毛的虎氣勝於猴氣，周的猴氣勝於虎氣；毛周互相爭鬥，互相依存，互相利用，變成互相不能離開對方；他們永遠是最親密的戰友，又是最強勁的敵人，毛周兩人一直纏鬥到死，這場鬥爭還沒有完結。」[807]毛、周二人可以說是共生關係，這也是因爲毛澤東不論怎麼敲打周恩來，但是另一方面毛的人生卻又片刻無法離開周恩來的原因。而周恩來在中共歷史上是一個放火的人，又是一個救火的人，他這一生是好是壞，恐怕自己也說不清楚。[808]周恩來幾十年擁毛保毛之功，今天中共當局僅以「違心」二字，一筆勾銷，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809]而收拾文革亂局，也並非周恩來個人之功。[810]只能說，在整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與毛澤東是不可分的，周恩來一直是毛澤東一生中鬥爭政敵最得力的助手。

---

[807]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68-69、72。

[808]司馬璐，〈周恩來的歷史功過—我見，我聞，我知〉，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74。

[809]金鍾，〈忠君思想與天下大亂—敬覆有關評周的幾個問題〉，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80。

[810]金鍾，〈忠君思想與天下大亂—敬覆有關評周的幾個問題〉，收錄於金鍾主編，《紅朝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頁 84。

徵引書目

壹、　中文參考資料

一、　檔案暨史料彙編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輯部，《中國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臺北：上海印刷廠，1973）。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中共機密文件彙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8 年）。

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02 年）。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1 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周恩來年譜 1898-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 5 月）。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主編，《周恩來自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 年 7 月）。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編，《周恩來選集》，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編，《周恩來選集》，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

二、　專書

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年）。

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年）。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8 年 1 月)。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王年一，《1949—1989 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 7 月)。
方矩成，《西方人看周恩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9 年)。
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4 月)。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11 月)。
李烈主編，《賀龍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 月)。
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真相與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2008 年 2 月)。
李文合、李義凡，《走近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金沖及主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 2 月)。
金鍾主編，《紅潮宰相—周恩來的人格解剖》(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年 5 月)。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年 9 月)。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 年 5 月）。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上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9 月)。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年 9 月)。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 年 3 月)。
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 7 月)。
徐向前，《徐向前元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

逄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逄先知、金沖及編，《毛澤東傳 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郭思敏、天羽編，《我眼中的周恩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月）。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 1 月）。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年）。
張瑞靄，《周恩來專機機長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 11 月）。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 年 6 月）。
張寧，《塵劫》，（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 年 6 月）。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
陳曉農，《陳伯達遺稿》（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 年）。
陳曉農編，《陳伯達最後口數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06 年 3 月）。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注，《陳伯達—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年）。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 ： 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6 月）。
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 年 1 月）。
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爲、心理分析》（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年）。
程華主編，《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年 3 月）。
楊建利主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出版，1997 年）。
熊華源、安建設編，《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紀實》（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6月）。
齊茂吉，《毛澤東和彭德懷、林彪的合作衝突（1954-1971）》（臺北：新新聞出版社，1997 年）。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5 年 1 月)。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出

版社，2008 年 6 月）。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 2 月）。

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下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2 年 2 月）。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 年 1 月）。

權延赤，《餐桌上的中共領袖》（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6 月）。

三、　期刊論文

丁丑，〈毛家灣服務員彼露林彪家庭生活內慕〉，《炎黃春秋》，期 2（2003 年），頁 65-68。

小夏，〈周恩來在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中的責任與特色〉，《記憶》電子版，期 12（2009 年 1 月），頁 13-17。

于南，〈驚心動魄的“九・一二”之夜——毛澤東、周恩來機智處置林彪叛逃事件述實〉，《黨的文獻》期4（1994年），頁90-94。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期 2（1994 年），頁 88-91。

司馬清揚，〈《“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讀後（上）〉，《記憶》電子版，期 16(2009 年 3 月)，頁 2-9。

司馬清揚，〈周恩來與中央專案組〉，《記憶》電子版，期 29(2009 年 7 月)，頁 48-52。

江山，〈在晚年周恩來身邊採訪〉，《百年潮》，期 3（2009 年），頁 26-30。

宋德金，〈我在林彪辦公室的前前後後〉，《百年潮》，期 9（2002 年），頁 58-57。

安建設，〈周恩來領導的 1972 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黨的文獻》，期 1（1993 年），頁 22-29。

吳慶彤，〈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解放幹部的努力與貢獻〉，《黨的文獻》，期 2（2000 年），頁 81-83。

周家鼎，〈周恩來忍辱負重的歲月〉，《黨的文獻》，期 4（1993 年），頁 60-62。

胡長明，〈毛澤東與周恩來政治風格之比較〉，《長沙電力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期 4（2000 年 11 月），頁 25-27。

時念堂口述、戎志整理，〈專機師師長回憶“9・13”之夜〉，《中華兒女》（國內版），期6（2001年），頁84-89。

高德明，〈吳法憲在秦城監獄內外〉，《中華兒女》（國內版），期 9（1999 年），頁 74、75、77。

孫萬國，〈古有竇娥，今有林彪〉，《明報月刊》，期 7（1996 年），頁 108-111。

彌尙義、楊大勇，〈誣陷劉少奇的三頂「帽子」是如何製造的〉，《百年潮》，

期 6，(1998 年)。
陳浩，〈韓丁回憶周恩來〉，《文獻和研究》，期 1（1987 年），頁 42-44。
陳揚勇，〈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態度〉，《黨的文獻》，期 3（1998 年），頁 51-57。
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黨的文獻》，期 12，頁 29-32。
琴九鳳，〈嘔心瀝血披肝膽 大樹參天護英華-周恩來“文革”期間對政協等人員的保護〉，《黨史文天地》，期 10（2009 年），頁 33-36。
曾自，〈周恩來文物保護思想與西部大開發〉，《黨的文獻》，期 1（2002 年），頁 54-57。
湯聿文，〈周恩來保護老幹部得一著棋〉，《百年朝》，期 2（1998 年），頁 51-53。
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關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對話—訪金沖及〉，《黨的文獻》，期 12（1993 年），頁 29-35。
楊曾和，〈評《論周恩來的人性思想及其踐履》〉，《文獻和研究》，期 3（1984 年），頁 26-28。
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縱橫》，期 1(2000 年)，頁 18-28。
齊茂吉，〈毛澤東欽定林彪爲接班人之探討〉， 《兩岸發展史研究》(2003 年 12 月)，期 2，頁 199-227。
齊茂吉，〈林彪與江青交惡之始末〉，《兩岸發展史研究》(2007 年 6 月)，期 3，頁 134-140。
齊茂吉，〈毛澤東整肅林彪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2008 年 6 月)，期 5，頁 198-205。
齊茂吉，〈「九一三」事件新探〉，《兩岸發展史研究》(2009 年 12 月)，期 8，頁 169-199。
閻長貴，〈1967：江青和周恩來的關係〉，《記憶》電子版（2008 年 9 月)，期 3，頁 35-40。
遲澤厚，〈中共“九大”內幕瑣憶〉，《炎黃春秋》，期3（2003 年），頁 48-50。
點點，〈點點記憶（上)〉，《當代)， (1998 年）期 4，頁 55-57。

四、　報紙、其他資料

《人民日報》，1966 年 9 月 7 日。
《大紀元評論報》，電子版，2005 年 4 月 27 日。

貳、　英文資料

Domes Jürgen, “Party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ger Frank N., & Henderson William eds., *Communism China, 1949-1969: A Twenty-year Appraisa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nd printing,1972).

Domes Jürgen,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3).

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Cultur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